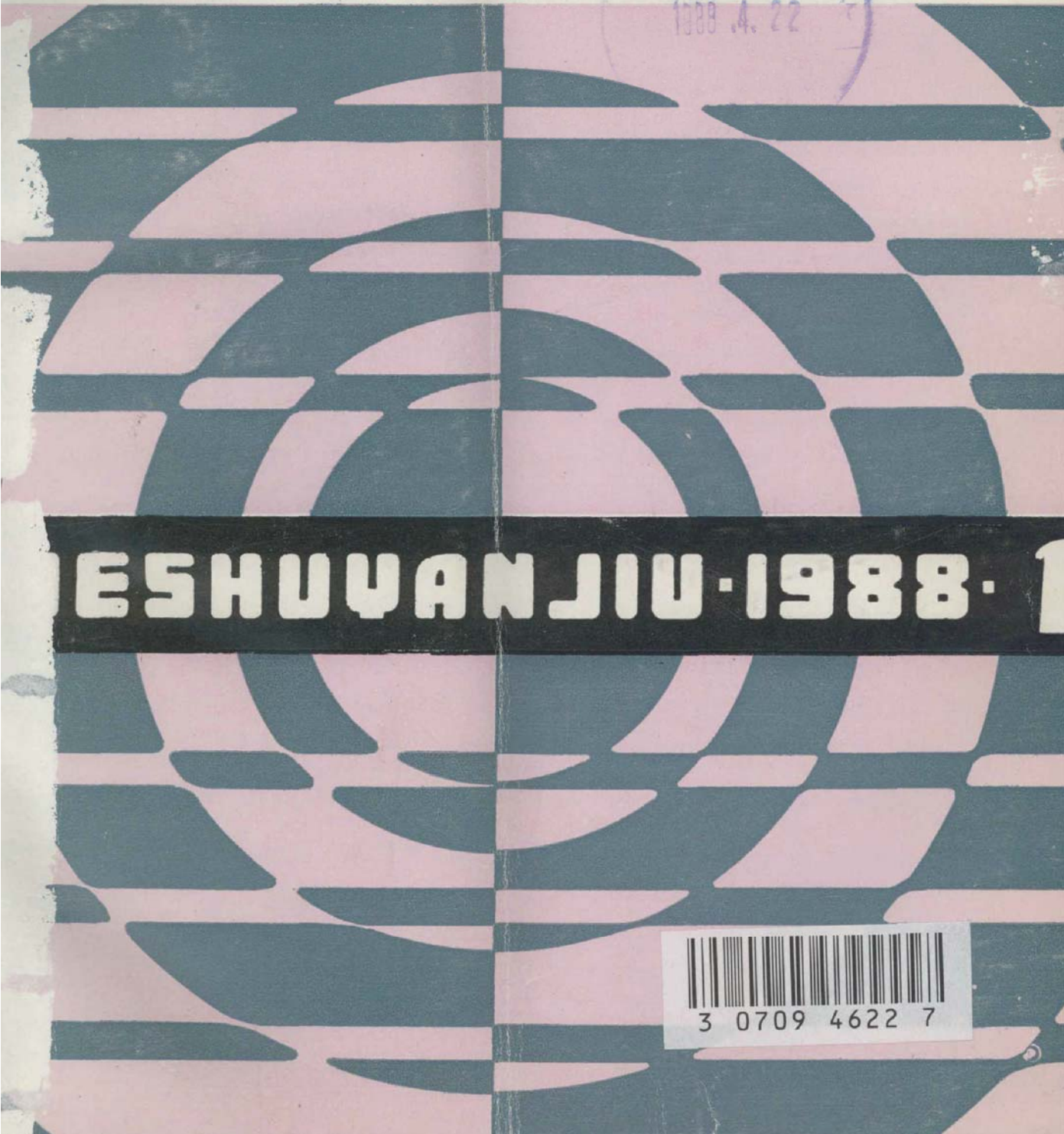


学术研究



ESHUQIANJIU-1988-1



3 0709 4622 7

韶关市厂长经理研究会

祝贺学术研究创刊30周年

目 录

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 理 论	5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包心鉴
	14	略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六个主要特征	梁 钊
	17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的发展与道德价值观念 的进步	黄春生
精神文明 建 设	21	对外开放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理论问题 ——深圳经济特区的启示	刘文韶
	28	广东青年观念变化的考察	陈镇宏
改革开放 理论研究	31	粮食：广东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张 井
	37	广东外商投资法律环境的现状与对策	周 华
	43	重建我国宏观经济的货币调控模型	欧小威
社会主义 辩证法	50	“新三论”与对外开放	孔幼真
哲 学	55	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哲学的特点	吴熙钊
港 澳 台 学者之窗	62	戊戌后的康有为 ——思想的研究大纲(摘要转载)	(台湾)徐高阮遗著
文化史 研 究	70	论梁启超对我国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贡献	周行易
	76	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学分析	乐 正
	82	刘传大师与石湾陶艺	于 逢
历 史	87	明清江南市镇的实态分析	樊树志
文 学	92	寻找中国纯艺术精神的根	刘绍瑾
	99	诗与苦闷	陶东风
	108	艺术地掌握历史 ——《白门柳》在历史文学意识上的创新	吴观瀾

来 稿 摘 编	113	中国武侠小说在印尼	许友年
	115	新时期岭南文学的“城市化”趋向	柯 可
新 书 评 介	116	宏观经济调节理论的新建构 ——读王琢《宏观经济调节论》	袁耀文
	118	老牛拓荒喜新获，近代文学终有史 ——读陈则光《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册）	吴定宇
广 东 专家动态	120	新种葱茏竹万竿 ——王季思教授近况	林 建 叶献高
	122	我国人类学的现状与未来 ——梁钊韬教授临终前的采访	张 超
社 科 联 作 工	124	华东、中南、西南地区省（区）、市社科联第三次协作会议纪要	
书 海 酌 蠡	69	新发现的梁启超致犬养毅函	陈占标
	16	《严复集》外佚文二篇	官桂铨
	107	《中国历代年号考》补考	官大梁
	81	“时时”解诂	董志翘
	54	《辞源》疏漏一例	欧阳世昌
学术会议	126	广东比较文学研究会首届年会侧记	
论点综述	128	全国第三届青年工作理论研讨会简述	
封面设计			王造星

CONTENTS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Bao Xinjian (5)

A Cursory Discussion on the Six Basic Features of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in Our Country.....Liang Zhao (14)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Moral Concept of Value
..... Huang Chunsheng (17)

A Few Theoretical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n the Economic Zones
Open to the Outside World
—Some enlightenment gained from the prospects of the Special Zone of
Shenzhen Liu Wenshao (21)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hange of Conceptions in the Minds of
Guangdong's Young People..... Chen Zhenhong (28)

Food Grain; the Problem that Confronts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
Way to Tackle ItZhang Jing (31)

The *Status Quo* of and the Tactics for the Legal Circumstances Favou-
rable to the Investment by Foreign Businessmen in Guangdong
..... Zhou Hua (37)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gulating-and-Controlling Model of Currency"
in the Macro-economy of Our CountryOu Xiaowei (43)

The "Three New Theori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 "three new theories" refer to the theory of 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
theory of coordination, and the theory of sudden change
..... Kong Youzhen (50)

-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urgeois Philosophy in Modern China
 Wu Xizhao (55)
- Kang Youwei after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Extracted from a posthumous
work by Xu Gaoyuan (of Taiwan) (62)
- Liang Qichao's Contributions to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China..... Zhou Xingyi (70)
-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proposed Argument "On the Similari-
 ties between Ancient Chinese Tradition and That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as Advanced by Some Chinese Schola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Le Zheng (76)
- Master Liu Chuan and the Ceramic Art of Shiwan..... Yu Feng (82)
- An Analysis of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the Small Towns South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an Shuzhi (87)
- Searching after the Origin of the Spirit of Chinese Pure Art
 Liu Shaojin (92)
- Poetry and Misery..... Tao Dongfeng (99)
- An Artistic Grasp of History..... Wu Guanlan (108)
- China's Heroic and Chivalrous Novels in Indonesia.....Xu Younian (113)
- The "Urbanization" Tendency of Ling Nan Literature in the New Age
 Ke Ke (115)
- A New Theoretical System of Macro-economic Adjustment
 —A comment on Wang Zhuo's book, "On the Adjustment of Macro-economy"
 Yuan Yaowen (116)
- Comments on Chen Zeguang's Book,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Volume I) Wu Dingyu (118)
- Scholarly Research as Now Being Conducted by Professor Wang Jisi
Lin Jian and Ye Xiangao (120)
- The *Status Quo* and Prospects of the Researches on Anthropology in
 China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Liang Zhaotao sometime before his death
Zhang Chao (12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包心鉴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发展商品经济，是一个历史性的大题目。商品经济和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什么样的必然联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有哪些特殊的特点？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哪些内在的促进作用？如此等等，都是我们在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时所要着力搞清楚的。

一、从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看商品经济的不可逾越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深刻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是对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的必然联系所作的高度科学的概括。

由于商品经济本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人类社会演进的规律上对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必然性作透彻的说明。

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标准，可以作出不同的划分。其中最基本的划分是以社会生产方式尤其是所有制性质作为基本标准，这就是把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从其经济形态的本质上说属于共产主义社会）五大社会形态。然而马克思还有一种社会形态划分的标准和方法，这就是对五大社会经济形态作进一步抽象，从人对人、人对物的依赖关系或社会关系上进行划分，把人类社会归结为三大社会形态：人直接依赖于人的社会形态；人直接依赖于物的社会形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曾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此作过细致阐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①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三大形态的划分，首先是建立在社会经济的基础上的。在第一大社会形态中，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生产力极其低下，人还受自然界的奴役。受这种原始的自然经济决定，人们只有相互依赖，结成某种共同体形式，才能生存下去，才能更好地同自然作斗争。共同体的存在，表明了人

们之间的直接依赖关系。这种共同体最初表现为以血缘为基础的原始共同体（原始群、氏族、部落等）；随着分工与产品交换的出现，则逐渐表现为地域共同体（如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农业公社和城市公社）。在所有这些共同体内部，“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②总之，第一大社会形态表现为两大特征：（1）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2）人对人的直接依赖关系。

第二大社会形态，是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自然分工发展为社会分工，自然经济逐渐为商品经济所代替。商品经济所以能成为取代自然经济的巨大社会力量，根本原因在于商品经济的巨大社会功能，这就是商品经济从根本上满足了人们的某种需要，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和交往，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商品交换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大大超出了单纯买卖的范畴。正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那样，商品经济不仅使交换当事人都能够得到利益，双方都放弃了那当作使用价值对自己没有用处的商品，而取得了他们使用上需要的商品，而且这种利益也许还不是唯一的利益。卖葡萄酒、买谷物的A，比种植谷物的农民B，也许可以在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葡萄酒；种植谷物的农民B，比葡萄酒酿造者A，也许可以在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谷物。所以，和没有交换而必须各自为自己生产葡萄酒和谷物的时候比较，A将会为相同的交换价值，得到更多的谷物；B将会为相同的交换价值，得到更多的葡萄酒。总之，从经济类型上讲，商品经济是比自然经济更高的经济类型，它创造着比自然经济更高的社会生产力。资本主义正是依靠着商品经济而发展起来的。

第三大社会形态，是产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③这是比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它的基本特征，是个人全面发展，自由的个性得到充分发挥，人既成为自然的主人，又成为社会的主人。显然，这一高级社会形态的完全实现，必须建立在商品经济完全为产品经济所代替的基础之上。这种代替，绝不是人为地、简单地限制、取消商品经济，恰恰相反，是必须依靠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因为商品经济作为一种历史形态，是不可避免和不可超越的。人类社会是一个有序的渐进过程，人们绝不可能从局部范围的、能力有限的自然经济一步跨入世界范围的、充分发展的产品经济。自然经济向产品经济过渡，必须以商品经济为中介，依靠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没有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就不可能造成充分发达的生产力，造成人们普遍的世界联系、多方面的需求和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从而也就不可能形成完全的产品经济所需要的条件。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这是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三大依次递进的经济类型。在这种历史发展中，商品经济作为一种独特的经济类型，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既是第二大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同时又是自然经济向产品经济过渡的中间环节。相对于自然经济，

商品经济是一种批判的、革命的力量，是自然经济发展中的内在本质和必然结果；而相对于更高类型的完全的产品经济，商品经济既是一种程度较低的经济类型，又是完全实现产品经济必不可少的前提，产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本质和必然结果。总之，作为自然经济的结果和产品经济的前提，商品经济形态在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独特的历史作用，它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总体上说属于商品经济类型下的生产方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要使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有力证明了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正确性。商品经济，作为一种历史的社会经济形态，它不仅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存在于后资本主义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只要第三大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得以建立的前提——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还没有形成，商品经济就有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这个第三大社会形态，从本质意义上说，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因此，从经济形态来说，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属于商品经济类型下依次递进的不同生产方式。这也就是说，在同一经济形态下，可以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在自然经济形态下，存在着原始制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依次递进的不同的生产方式；在商品经济形态下，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依次递进的不同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商品经济发展到了顶峰——商品经济统治社会一切方面，一切都商品化了；但是，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并不是等同的概念，资本主义制度的瓦解和商品经济的消亡更不是一回事。从总体上说，商品经济贯穿于两种依次递进的大的社会形态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否实行商品经济，而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而言，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这种落后性的根本表现，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构成其基础的大部分人的利益是相冲突的，包含着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尖锐的矛盾。劳动者是社会生产力系统中的主体部分，然而这种主体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是受压抑和摧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刀阔斧地开发、利用客体生产力（生产工具、自然资源），而在主体生产力（劳动者）的开发方面却存在着不可超越的根本局限。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代替的根本原因。只有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改变劳动者受奴役、受剥削的地位，从根本上为这种主体生产力的培养、开发创造条件。因此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体生产力创造历史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商品经济消亡的结果。在资本主义消亡之后，商品经济要在随之出现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长期存在，并且要充分发展，为实现商品经济向产品经济过渡创造条件。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改变的规律。

以上所说的是理论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又依赖于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化大生产作为自己的基础的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典型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从人类社会三大形态来说，也难以逾越商品经济阶段而直接实现全社会的产品经济。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则要比这种理论上的社会主义要复杂得多。我国的社会主义，不是脱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而是脱胎于相当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就产生了我国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一系列特殊的特点，决定着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形态方面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极不平衡，自然经济还在比较广泛的领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例如，10亿人口，有8亿农民基本上是在依靠手工工艺甚至是原始耕作的方法搞饭吃，从而严重障碍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步伐，使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然处于世界后列；大量的工业生产还处于落后水平；不少贫困地区的生产还处于封闭状态，有些地区连温饱问题都还未解决；少量科学技术水平在世界上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但不少地区文盲半文盲的状态还普遍存在，在一些“老、少、边、穷”地区，还严重存在着重农轻商、重农抑商的愚昧观念。如此等等，都是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结果，都是社会生产力落后的直接制约因素。由于商品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相当大的比重，不仅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和全社会精神文明的加强。所以，改变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状态，使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展，不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的所不可逾越的，而且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能否向发达阶段发展的全局性问题。这就是在我国现阶段发展商品经济的特殊意义。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道路：

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中：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就在于在科学和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立新型的社会关系，实现人的自由、和谐、全面发展。然而，现实的社会主义和这种理论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相距甚远。由于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在比较落后的农业国度里建立起来的，这就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这样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如何建成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争论已久，影响至今。有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落后国家根本不能搞成社会主义，而只能搞官僚主义的集中制，或者是先补资本主义的课，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造成社会化大生产，再在此基础上重搞社会主义。一种观点是社会主义“速成论”和“易成论”，认为落后国家将比发达国家更容易建成社会主义，因为落后国家没有力量雄厚的资产阶级，因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阻力较小，而农民则又是本能的革命者，甚至到我国50年代后期提出“越穷越好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荒谬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社会主义曲折的发展历程同时说明以上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落后国家取得胜利，这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一

定能够建成社会主义,这不仅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而且是正在实现着的现实。企图回过头来“补资本主义的课”,重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一种逆社会发展潮流的主张。在落后的生产力、落后的经济结构、落后的文化观念、特别是落后的小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又必然决定着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长期的和艰巨的,社会主义将长期在初级阶段的状态上缓慢式地前进,无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哪一个方面,都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急于求纯,这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总趋势。

恩格斯早在1847年所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就把先进的英国和比较落后的德国加以比较,提出了在不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快慢、难易及其因素问题。他说:“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④社会主义必须有生产的社会化作为基础,而生产的社会化的决定因素则是工业化程度发达,大工业占主导地位。因此,在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国家,对社会主义进程影响最大的因素则是加速对处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状态的小农的改造,促进农业社会化的形成,并向农业的工业化转移。

在落后的农业国加速实现农业社会化进而实现工业化,必须通过发展商品经济这条道路。列宁开辟了有计划地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新道路。这条道路包括:(1)不是直接采取“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而是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多层次的经济结构,以适应生产力在总体上落后而发展又极不平衡的状况。列宁说,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2)有计划地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给农民一定的贸易自由,在国家的正确调节(指导)下活跃国内商业。(3)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落后俄国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必要桥梁和必要手段,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战胜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必要帮手。要千方百计地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和资金,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资金不足和技术落后的问题。(4)按商业化原则办企业、部门、机关,在国营经济的管理中全面实行经济核算制、责任制和从个人利益上关心的原则。列宁所开拓的这条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蕴含着—个极富于创造性的新思想,这就是改变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直接实行产品经济的论断,确认在一个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走迂回曲折的道路,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个中介,通过这个中介,才能逐步过渡到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

列宁的以上思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相当大的比重,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社会主义要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没有生产的社会化不行;而如果不使商品经济得以充分发展。改变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状态,社会化的大生产就难以形成。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必要提出补商品经济的课的任务。“补商

品经济的课”和“补资本主义的课”，是两种目的和结果都有着本质区别的主张。补资本主义的课，出发点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合理性和优越性，其结果只能是把社会拉向倒退；补商品经济的课，出发点则是为了更快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可以把社会主义大大推向前进。实现社会生产的商品化，是造成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从而实现生产的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发展商品经济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特殊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只有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才能进一步搞活企业，造成工业社会化的基础。社会主义生产社会化的实现，关键在于工业社会化的形成和加强；而工业社会化的实现，关键又在于城市企业充满活力。城市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是社会生产的主要的直接承担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技术进步的主导力量。企业是否具有强大的活力，不仅对于当前我国经济的全局和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是一个关键问题，而且对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社会化的形成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都始终是一个关键问题。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有力说明，要使企业具有强大活力，必须彻底改变国营企业是产品生产单位的传统观念和体制，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过去长期间，我们按照高度集权的体制管理经济，把全民所有制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把整个国民经济当成一个大工厂，把所有企业当成分厂和车间，由国家作为“工厂”的总管理处，对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进行直接的全面管理。这样一种管理体制，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使企业失去了活力，造成了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越吃越穷、越吃越死的局面，从而使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处于封闭和僵化的状态。改革的实践表明，只有彻底打破这种僵化的管理体制，变国家对企业的直接管理为间接控制，建立起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管理体制，使所有企业都成为拥有自主权的商品生产实体，在国家计划的必要指导下按照价值规律经营，才能有效地增强全体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使企业真正充满生机和活力。因此说，发展商品经济是搞活企业的关键。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化，还在于地区与地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横向经济联合的发展，而企业相互之间的联合，则是横向经济联合的基本形式，是造成工业社会化的基础。要发展企业间的横向经济联合，首先就必须把联合的决策权交给企业，使企业按照商品经济的规律来寻求相互间联合的内容、形式和途径。因此说，发展商品经济，又是发展横向联合，从而促进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基础。

第二，只有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才能真正把农民引导上合作化的道路，造成农业社会化的基础，并促进农业社会化向工业社会化过渡。在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毫无疑问，最困难的事情是如何把极其分散的、处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状态的农民引导上农业合作化的道路。这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能否建

成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课题。如同列宁所说：“如果合作社普及到土地社会化和工厂国有化的整个社会，那它就是社会主义了。”^⑥我国农村发展的曲折道路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成功的改革实践表明，农业合作化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必须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我国现阶段的农业，其物质基础中的相当大的成份是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或尚不发达的商品经济，在这种条件下强制性地搞合作制，就必然会造成长期贫困，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只有在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使广大农民学会利用价值规律，面向市场组织生产和流通，才能挖掘农业生产的潜力，充分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沟通农民相互间的联系，促进农民自愿向着合作化的方向迈进。近几年来我国农村改革的实践，也可以说是通过商品经济这条道路引导农民由原先低级的不完全的合作制向高级的完全的合作化过渡的过程。在农村改革中，越来越多的乡镇企业在全国各地崛起，成为农村合作化深入发展的“龙头”。乡镇企业崛起的不可估量的作用，就是促进了我国农村朝着农、工、商一体化的新的经济结构转化，促进了农业工业化的逐步实现，这是在我国现阶段发展生产社会化的重要内容。

第三，只有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有力地推动技术的进步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充分和合理地利用社会资源，提高社会效益，造成生产社会化的基础。社会化大生产必须以技术的高度发达和经营管理水平的现代化作为内在动力。而技术的进步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是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成正比的。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内在要求，就是必须改进技术，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因为商品经济的运动是受价值规律支配的，价值规律要求对各项社会经济活动的效果，用统一的社会尺度——价值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和评价。这就驱使着生产和经营单位必须想方设法节约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产品按必要劳动时间出卖，便可得到较高的经济效益，获取更多的利润。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的特点 及其对生产关系变革的影响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根本的区别在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自由化的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比自由化的商品经济更高类型的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态的顶峰，是人类社会实现更高级的经济形态——产品经济形态的前提。

然而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结构的多元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商品经济也必然是一种多元状态。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由国家计划统一控制和调节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的主体。此外，同时还存在着大量刚刚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状态下解脱出来的处于初级状态的私人性质的商品经济，对于我国目前广大农村来说，这种性质的商品经济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它是广大农民冲破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羁绊，走向社会化生产的阶梯。没有这种初

级形态的商品经济作为桥梁。长期处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状态中的地区就不可能迅速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广大农民就很难尽快地富裕起来，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难以扩大自己的阵地，而充分体现和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处于同一个时代的，而世界性的经济联合和渗透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向发达国家实行经济开放，是经济尚处比较落后状态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战略性措施。随着对外经济开放的进一步扩大，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包括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等等经济成份还将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这些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形态——私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我国现阶段都是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必要补充，它们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约下，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同时发展，形成了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主体、多种性质的商品经济成份同时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格局。

商品经济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它的存在和发展从来都是和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密切相联系的，这种联系一方面表现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一定的生产关系性质相适应，从而形成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性质的商品经济；另一方面，表现在商品经济不可遏制的发展，必然要求生产关系发生相应的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把商品经济推到了鼎盛阶段，与此同时，商品经济的极大发展也使社会化生产和私人占有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将在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中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代替。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有利条件，但是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商品经济总是非常活跃地走在生产关系的前面，并不断地提出变革现存的生产关系以适应自己充分发展的要求，这就决定了我国的生产关系有长期改革的必要。

深化生产关系的改革，重点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长期存在、同时发展的经济结构；二是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原则长期存在、同时发展的产品分配结构。这两方面的改革，从其内在动因来说，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所有制方面的改革，经过几年的实践，现在从宏观方面已经基本解决了问题。当前改革的难点是在微观方面，主要是如何适应企业成为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实体的需要，对原先属于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所有制关系作何调整的问题。企业改革的发展趋势表明，如果不触动原先的公有制，而仅仅限于经营方式的改革，改革则仍然要遇到重重阻力，企业搞活就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事实上，许多企业在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经营中，使传统的公有制形式受到了触动，企业的所有制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租赁制、股份制以及各种形式的企业集团的出现，则表明全民所有制企业在所有制问题上深化改革的趋势不可阻挡。

产品分配体制的改革，是一件牵涉到社会各个方面的事情。这方面改革成功与否，已经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当前分配体制的改革应当坚持两大基本原则：一是

按照商品经济的规律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按劳分配原则是社会主义的主体分配原则，它可以防止人剥削人和贫富差别悬殊的现象发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必须与商品经济挂钩。传统的分配体制，在按劳分配中排斥了商品经济，全民所有制企业实际上是按产品经济的要求来分配，由国家统收统分，职工报酬与企业经营成果不挂钩，企业管理人员按照国家行政人员的级别来领取报酬，这就造成了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吃大锅饭的局面和严重的平均主义弊端。今后我国分配体制改革的主要倾向，仍然是克服由于产品经济观念和体制的影响而造成的平均主义现象。按照商品经济的规律要求实行按劳分配，就要做到变国家是分配的主体为企业是分配的主体，把消费资料的分配权完全交给企业，国家主要通过市场对企业的分配实行间接控制。这样，企业职工劳动所得就与企业能否在商品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发生了直接关系，当企业生产的商品有销路，其价值实现以后，职工分配才有了前提，收入才能提高。对企业管理人员，也应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制，而按照企业经营的好坏决定工资的高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把按劳分配与商品经济结合起来，按照商品经济的规律实行按劳分配，才能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也就大大提高了劳动者的收入。

二是允许多种非劳动收入的长期存在。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的多元性，决定了在分配体制方面，除了按劳分配这个主体而外，还应允许多种非劳动收入的长期存在。这些非劳动收入主要包括：（1）资产收入。包括投入生产的地产、房产、各种生产设备等获得的租金和利润。这类收入无疑是凭所有权带来的非劳动收入。（2）资金收入。包括储蓄、借贷、股票等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等收入。这类收入是资金所有权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的产物，无疑是一种非劳动收入。（3）经营收入。包括通过雇工经营所获得的收入。经营管理是一种复杂的劳动，需要较多的技术、信息、知识和经验，这里就包含着一定的自然因素和随机因素，因而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类收入是一种不完全的劳动收入。以上这些非劳动收入，都是按劳分配的必要的补充。只要这些非劳动收入不违反国家法律，都应当允许长期存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1页。

⑤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97页。

作者单位：山东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

责任编辑：张硕城

略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六个主要特征

梁 钊

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地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是我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伟大的发展。明确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国情、把握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明确这一阶段的主要矛盾、特征和任务，为加快和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武器。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科学的命题，有它特定的内在涵义，即本质的规定性和它主要特征。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有两层含义：从社会性质方面看，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丝毫不能怀疑和动摇的；从发展程度方面看社会主义还处在不成熟、不完善的初级阶段。就是说，我们不是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而是要补发达的商品经济这一课，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改革、开放中，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使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的发展。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在含义即本质的规定性。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

进一步探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和特征，就必须从我国现实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方面及其矛盾，作具体的、冷静的、求实的考察。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过来的，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又特别短，遗留的问题又比较多。建国30多年来又经历了曲折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虽然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主体，但发展程度上是不成熟、不完善的。当前它的主要特征是：

第一、从总体上看，社会生产力还比较落后，而且层次多，发展很不平衡。虽然有现代化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如人造地球卫星、原子弹和氢弹等，是最先进的生产力和传统的落后的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力同时并存。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格局还不是现代化的，认识这一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改革的实践证明：落后的生产力一旦解放出来，潜力很大，速度很快，来势很猛。

第二、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全国广大农村还处在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向发达的商品经济转变的起步阶段。总的来说，自然经济、僵化体制的产品经济格局尚未打破。加快改革，改变僵化体制，发展发达的商品经济，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环节。发达商品经济是富裕的一个标志，是生产社会化、现代化和科学技术、文化发达的一个标志；而自给自足，忽视商品经济则是贫困、愚昧、落后的表现。有计划发展经济的条件虽然已经创立，但在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条件下，计划体制也不可能是成熟的，计划体制必须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

第三、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还要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包括与外资的合作企业、合资企业和独资企业，包括私人企业、个体经济和家庭经济等等，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多种经济成份的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体制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体制都在改革之中，它们之间、它们同多种经济成份之间通过横向联系，必将互相渗透，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所有制结构优化，使各类型企业充满生机活力。

第四、存在不完全的多种形式的按劳分配。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要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承认差别和开展竞争，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克服小农经济的平均主义思想，使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得到贯彻，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发挥。普遍实行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是一种特定条件下的分配形式，它把责、权、利结合起来，使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相统一，使劳动所得与劳动成果相联系。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的条件下，要允许正当的、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高工资、高消费”，“超前消费”，“消费过热”和“消费早熟”都不符合现阶段中国的国情。

第五、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已经建立，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对抗性的阶级矛盾，但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长期存在，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也仍将长期存在。对搞破坏、搞动乱、搞分裂的分子必须坚决地予以法律制裁，以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安全。建设高度民主，克服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要充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这仍然是十分艰巨的长期的任务。

第六、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缺少的重要特征。我们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高度文明的目标和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指导思想，是十分必要的。只重视物质文明建设，而忽视精神文明建设，是十分有害的。先进阶级的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发挥出无穷无尽的改造世界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这是我们党的最大优势，我们必须充分运用这个优势。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决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腐蚀侵袭，又要使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无神论者和宗教信仰者，国内同胞和国外侨胞、一切爱国者都紧密团结起来，凝聚起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对照以上特征，我们必须确立以下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第一、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第二、必须坚持全面改革；第三、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第四、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五、必须以安定团结为前提，努力建设民主政治；第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建设精神文明。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黄振荣



《严复集》外佚文二篇

官桂铨

王枋先生主编《严复集》1986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收入严复的文章96篇，还把存疑的15篇印为附录，颇为完备。但严复的文章不止这些。我在《近人笔记大观》卷4《杂闻类》发现严复两则笔记，为《严复集》所未收。现抄录如下：

“《龚照琦》（严复）：前清甲午之役，龚照琦弃旅顺而逃，其罪与卫达三等，后卫被诛。龚运动得法。得久羁狱中。庚子，‘拳匪’乱，遂自出狱。和议成，复大加运动，脱身南归。其年六月六日，为其六十寿期，乃预定宴客三日。其邑人张六先生者，素与龚有隙。第一日，忽肃衣冠而入，长揖曰：‘六哥今日乐矣，容弟一言乎？’龚曰：‘请见教，实愿闻之。’张曰：‘弟近看新书数本，始知国民乃国家主体。弟一国民也，则中国土地之存亡，应负一分之责任。请问六哥：‘前年将弟之旅顺送向何处去，今日能见还乎？’龚君大窘，狂呼：‘逐客’。二日晨，其门首复有联云：‘称六太爷，上六旬寿，欣占六月六日良辰，六数适相逢，曾听得张六先生，大踏步闯进门来，口叫六哥还旅顺。坐三年监，陪三次斩，赚得三代三品封典，三生愿已足，最可怜达三故友，小钱头不如咱洒，冤沉三字赴黄泉。’龚愤甚，弋索数日，不得其人。（‘小钱头不如咱洒’者，合肥土语，言卫用钱之法不及龚，故卒得祸也。）”

“《红胡子》（严复）：红胡子者，东省马贼之通称也。其名所自来，末由考据。首领不一，各自为股。股或数人，或数十人，多亦不过二三百人。无纪律，而剽悍特甚，不相统一，故时有互斗。其抢掠之道有二：有掳人勒赎，曰帮票，被虏之家，须探明为何路何股之所为，寻走门路，磋磨赎价。然亦有由贼定价，勒限以通知者。价之高下，视乎被虏者之身家及其关系。倘逾限不赎，则被虏者必无幸。掠夺牲口，曰出贩，意盖谓夺于此而贩于彼也。遇官兵则权衡势力，以定抗否，非必拒捕也。倘势不敌，则四散走。遇追急，则沿途夺马以易其疲。马术极娴，故捕之者，每无如之何。惟为害闾阎，而掠不及官。盖此中首领，除陶什喀陶就抚于俄国外，均有张作霖冯麟阁之希望也。”

严复所作的笔记仅见此两则。清末天津《国闻报》发表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是“阐明小说的第一篇文字。”阿英等认为它的作者是严复与夏曾佑。《严复集》编者“认为不是严复的文字。”此二文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近人笔记大观》共4卷4册，铅印本，编辑者为“广益书局编辑部”，发行者、印刷者均为上海广益书局，书出版于民国11年1月。我只见到最后一册，其余未见，也许其中还有严复的佚文。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的发展与道德价值观念的进步

黄春生

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为此，必须实行改革和开放。报告还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巨大的促进，同时也对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努力形成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舆论力量、价值观念……。”本文仅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的发展如何引起人们道德价值观念的更新以及道德价值观念怎样与之相适应的问题，试作一些论述。

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义利观

我国在封建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重义轻利”的观念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义和利完全割裂开来。这种“重义轻利”的观念，是和重农抑商观念联系在一起的。轻利和抑商，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相对立的反映。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自然经济必然起瓦解的作用，从而危及封建的社会制度。可见，重义轻利和重农抑商观念的产生，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当然，事实上，封建统治阶级并不是不讲利。“重义”的“义”，作为封建社会的道德准则的整体，就是封建阶级的利益的反映。他们所说的“轻利”，只是否定了被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已。剥削阶级的特性总是贪得无厌的。正象我国著名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所揭露的，他们“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其实心里想的还是沉甸甸的银子。不过，从道德原则上来说，特别是从对被统治阶级的要求来说，封建阶级的道德价值观念仍然是“重义轻利”。

“义利”之辩始终是存在的。比方说，是要平等和谐还是要经济效益？“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是“患贫”、“患寡”还是“患不均”？这里就有价值选择。“安贫乐道”、“重道轻食”，一直是儒家的道德观念。过去，由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缺乏阶段科学的认识，对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超越的生产发展阶段缺乏理论上和思想上的清醒估计，因此，往往认为，所有制越公越好，分配差别越小越好，流通领域统得越死越好，社会主义越穷越好。这实质上还是以抽象的道德原则作为评价的标准，根本无视经济效益。从思想源流来说，恐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受儒家的“重义轻利”思想的影响。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既然是一种商品经济，当然要奉行等价交换原则，要讲物质利益。这种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的。它讲的利，首先是公利，即为了国家的富强，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同时，它并不排斥私利，而是和正当的个人利益相一致的，如果忽视了正当的个人利益，压抑了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那么，集体的事业也就不可能得到顺利的发展。十三大报告在谈到分配政策时指出：“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这说明，新的价值观应该讲究实效，重视经济效益，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衡量一切的根本标准。当然，这并不是说，可以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主张重利轻义，甚至见利忘义。而是说，既讲义，又讲利；既讲道德高尚，又讲物质利益。利的是否正当，受义（道德）的规范；而义的真正实现，又要通过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增进。如果违背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目前来说，如果妨碍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的贯彻，这种“义”也就不是无产阶级

和人民所需要的。

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导致公平观念的更新

上面说过，旧的公平观念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便产生吃“大锅饭”和“捆在一起受穷”的局面。这种观念，实际上是小农经济的反映。小生产者害怕冒尖，对待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总以平均主义的眼光，横挑鼻子竖挑眼，甚至加以刁难、压制、打击。有些人把这种心理称为“东方式的嫉妒”，也许认为，这是和东方落后的小农经济相联系的。

商品经济是与平均主义不相容的。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存在着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差别。因生产条件、劳动熟练程度和强度的不同，各个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所包含的社会劳动也不相同。就是说，各人创造同样价值所耗费的私人劳动是不一样的。因而，这里必然有竞争和不断革新，不能搞平均主义。这种价值规律的作用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仍然是有效的。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重申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并且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下，全民范围的道德建设，就应当肯定由此而来的人们在分配方面的合理差别，同时鼓励人们发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发扬顾全大局、诚实守信、互助友爱和扶贫济困的精神。

社会主义社会要保证社会成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但共同富裕不等于完全平均和同步富裕。这样错误理解的“共同富裕”不但是空想，而且势必导致共同贫穷。只有象十三大报告所说的，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才能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由于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劳动者的劳动收入是存在着差别的。除此以外，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由于生产者的管理水平、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等的不同，因而劳动生产率不同，同一劳动量会表现为不同的劳动成果和劳动收入。目前，比较明显的是，在土地肥沃、交通方便的沿海地区的农民的收入和在土地贫瘠、交通不便的

边远山区的农民的收入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而占有资金较多和生产资料较多较好的同时善于经营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收入比之一般劳动者的收入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这些差别，主要是由于经营管理水平和生产条件的不同所造成的，但是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致富，就应当受到鼓励。不如此，就不能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 助于培养竞求上进的美德

在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比较严重的时候，曾有“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错误说法。这种依靠特权，捞取好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歪风的存在，说明封建思想影响的严重。同时，这种特权思想是和自然经济相联系的。列宁曾经指出：“在自然经济下，社会是由许多单一的经济单位（宗法式的农民家庭、原始村社、封建领地）组成的”。（《列宁全集》第3卷，第17页）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基层的经济组织都是和宗法等级制、家长制有关的。封建领地和宗法式的农民家庭固不待言，就是原始村社也是这样，因为它从被称为“家长制大家庭”的父权制家庭公社发展起来的。在我国，在漫长的历史行程中，自然经济的基层的经济组织，是地主经济和宗法式的农民家庭。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封建的宗法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是毫不足怪的。并且，由于我国过去自然经济的长期存在，这些思想是根深蒂固的。

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必然有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竞争，从本质上来说，不但不以任何特权为转移，并且是排斥任何特权的。它只受价值规律支配。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规律，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参加竞争的生产者必须不断改进技术和生产方法，提高生产效率，以取得商品的个别价值和它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可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讲究效率，重视科学技术，从而激励劳动者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在这样的条件下，不靠邪门歪道，靠集体的力量和自己的勤奋与本事蔚然成风。

从靠邪门歪道到靠正道，从以靠特权为荣到以靠集体和个人的勤奋和本事为荣，这从一个侧

面反映了社会上道德价值观念的进步。

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有利于发扬社会主义人道 主义精神

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最初是在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的过程中兴起的。作为当时人道主义思潮的基本内容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在人们之间仅仅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身份平等的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自由贸易、自由买卖和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当时的上述观念才有可能产生。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有根本的区别，但二者也有共同之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在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曾经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等级特权和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原则。这些合理的东西理所当然地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所吸收并加以发展。

社会主义下的尊重人、关心人首先和封建专制主义的轻视人、蔑视人相对立，也和资本主义下的情况有根本的区别。

在封建专制主义条件下，臣民百姓，诚惶诚恐，根本没有独立的人格，更谈不上个性的发展。这些情况，正如上面所说的，和自然经济、宗法制度是密切相关的。

资本主义是在和封建的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否定了封建特权，但却代之以金钱的特权。它否定了以权力和等级地位为标准的价值观，但却代之以金钱为标准的价值观。谁有钱，谁就“值得尊敬”，就属于“上等人”，就有势力。而作为雇佣劳动者，则始终是战战兢兢，提心吊胆的。特别是对于一个失业工人来说，很难说他能够得到资本家的尊重和关心。

我国目前封建的宗法制的残余和自然经济的色彩仍然严重地存在着。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彻底瓦解自然经济，肃清封建的宗法制的残余，才能更好地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和人的个性。同时，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中，人们才能更好地树立为他人服务的思想。尤其要指出的是，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提倡竞争，不断创新，才懂得人才的重

要，才能做到尊重人、关心人、讲文明礼貌。凡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这些方面都做得比较好，就是很好的证明。

在青年择偶方式的变化方面，也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制约作用。在家长制的条件下，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青年男女只能服从。人们的婚姻，既不自由，也不自主。解放以后，这种情况已起了很大的变化，但在某些地区，包办婚姻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特别是由于商品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开展，为城乡男女青年提供更多的自由交往的机会，促使青年择偶观念和方式发生明显变化。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社会主义的自由、平等的观念和个性的发展，说明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的进步。

五、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使人们更热爱社会主义

我国在全面正确地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的过程中，生产迅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提高，日益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86年同1978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由3480亿元增加到938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02%；国民收入由3010亿元增加到779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94.9%；全国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由175元增加到450元，扣除物价上升因素增长86.9%。关于广州的情况，普遍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7年，胜过以往时期的28年。”又说：“7年当中，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是最近3年。”事实是，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翻一番：社会总产值，1985年比1978年增长1倍多；工农业总产值，由80亿元增长到185亿元；对外贸易，由1.98亿美元上升到4.7亿美元；社会商品零售额，由21.75亿元上升到83.6亿元。与此同时，引进外资14.8亿美元，用于广州建设的为4.35亿美元。此外，收入来料加工的工缴费9.6亿美元，用于建设的1.9亿美元。外资、工缴费，加上广州的自有外汇，买得各种设备13000多台套，生产线216条。7年前，广州职工的平均工资为710元，现在是1596元。银行存款1978年为5.96亿元，1986年达52亿元。这些变化，说明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已取得了巨大进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已初步显示出来了。广大群众越来越深刻认识到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好，更加信赖党和政府，对通过辛勤劳动创造幸

福的新生活充满信心，对日益繁荣的祖国感到自豪。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作为商品经济，也存在着自己的消极方面。

正如《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所指出的，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它的广泛发展也会产生某种盲目性，必须有计划的指导、调节和行政的管理，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能够做到的。

应该怎样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广泛发展会产生的某种盲目性？马克思曾经以劳动交换方式作为划分标准，把社会主义发展过程分为三大形态。“最初的社会形态”是自然经济；“第二大形态”是商品经济；第三大形态是产品经济。我国目前仍处于商品经济阶段，尽管这种商品经济，已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当时有关商品经济阶段的论述，是针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而做的。尽管这样，也不能说这些论述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完全无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既然是一种商品经济，我国目前既然仍处于商品经济阶段，马克思有关商品经济阶段的概括，就应该加以考虑。比方说，马克思认为从自然经济阶段向商品经济阶段的过渡，是从“人的依赖关系”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过渡。人们在商品经济阶段既然还“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那么，他们依赖的是么什物？显然是“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111页）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但作为商品经济，是否也属于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阶段的概括的范围？就是说，处于商品经济阶段的社会主义商品

经济，是否也存在着对物（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的依赖性？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当然，这种依赖性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依赖性根本不同，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会产生某种盲目性和自发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过，由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由于商品的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二重性，因而必须通过交换，使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既然如此，生产者就不可避免地受盲目的市场的支配。这是商品拜物教产生的根源。

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种商品经济，已根本不同于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总的来说，是受计划的指导和调节的。因而，商品拜物教已大大削弱。可是，又要看到，社会主义的商品，仍然存在着劳动和商品的二重性，仍然需要通过交换，以实现商品的价值。这种商品经济，仍然会产生某种盲目性。可见，在存在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情况下，商品拜物教还不可能完全肃清。

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拜金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作为商品经济，可能成为诱发拜金主义等思想的一个因素。因此，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同时，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对于这一点，十三大报告是加以强调的。只要在加强宏观控制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商品经济的消极作用，是能够被克服的。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范英



对外开放区加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理论问题

——深圳经济特区的启示

刘文韶

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最早、处于对外开放第一线的地区，建立 8 年多来，在物质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人们的精神获得了新的解放，出现了许多新的思想观念，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从实践来看，实行改革和开放以后，精神文明建设也出现了许多与封闭时期不同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研究，从而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把精神文明建设推向前进，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

深圳特区的社会存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成分中引进了大量外资。8 年多来，“三资”企业（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已占特区企业的 10%，占工业产值的 60% 多。特区建设的特征之一是以引进外资为主，因此，外资会愈来愈多。特区的这种社会存在，是不是决定了特区必然要产生资本主义意识，或以资本主义意识为主呢？这个理论问题在特区已经提了出来。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主要是从一种社会形态、社会制度、一个国家的整体来说的。特区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一个很小的部分。它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的。它不是独立于全国之外，而是与全国有着极为密切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联系，是全国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因此，不能孤立地来看特区，应该看整个国家的社会存在和对特区的制约作用。即使是“三资”企业，包括独资企业，因为它处于社会主义特区这个环境中，也要受社会主义法律的约束。因此，从总体上说，特区的社会存在，和全国大陆一样，其性质是社会主义的，所以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区。由此决定的，特区在意识形态上，仍然是我们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当然，有它自身的特点和特殊性，但从基本性质上看，不能脱离和违反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属性。因此，特区的意识形态仍然是也必须是属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以社会主义思想意识为主体和主导，不会是

以资本主义意识为主。当然，由于特区有“三资”企业存在，也必然会带来和出现资本主义腐朽的思想意识，如果我们不注意做工作，它就可能发展扩大，起腐蚀作用。对这种危险也不能忽视。除了客观上的整个国家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制约外，这里关键在于特区要自觉地能动地进行工作，克服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

在特区，提倡社会主义思想，反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8年多的实践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在特区“三资”企业的职工队伍中，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占主导地位，这是谁都看得见的事实。当然，有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就会有资本主义的意识。在“三资”企业中工作，有可能受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但并不等于必然要受其腐蚀和影响，关键是看自身的抵抗力如何。在同一社会存在的条件下，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立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意识。马克思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这就说明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里却能够产生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我们许多同志在“三资”企业中工作，天天同资本家打交道，但只要坚持党和人民的立场，不断提高鉴别力和免疫力，就会对“三资”企业的客观存在作出正确的分析，趋利避害，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吸取有益的东西来充实自己，在比较中加强和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现在，绝大多数同志正是这样做的。

总之，对特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要防止两种片面性。一是认为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会占主导地位，而忽视了社会主义思想意识作为主体的存在和它的强大力量；二是忽视、放松以至放弃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斗争，视而不见或软弱无力。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既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又重视克服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

前一时期，在深圳有一种说法：培养和铸造特区人的“特区意识”，建立一种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与特区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意识。如果说，“特区意识”是一种地区性的概念，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在某一地区、某一行业、某一群体的特色，是在特区这个特殊的社会存在的基础上出现的一种为特区服务和特有的群体意识，它是社会主义意识在特区的一种表现、一种形态，那么，探讨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特区意识”，实际上就是特区这个环境中形成的对特区的一种认识、看法和精神状态。这种特区意识所包含的内容是什么，如果进行探讨，是否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对特区的性质、任务、功能、作用的认识和理解；二、对特区开放后实行的特殊政策，对特区的复杂社会环境的承受力和洞察力；三、对特区作为改革试验场的责任感和冲破旧的模式勇于进行各项改革的开拓创新精神；四、对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的筛选、消化、吸收、融合、创新的那种鉴别力和创造力；五、与建设特区，发展商品经济、外向型经济相适应的新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六、与特区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相协调的社会风气和价值观、道德观，等等。如上所述，这种特区意识在特区出现，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的。这种特区意识将会对特区这个社会存在，起一定的促进作用，对特区的建设和发展是有利的。

二、树立新观念克服旧观念的问题

深圳特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大力提倡和促使产生、发展这种新思想，新观念。对于在深圳要提倡什么新观念，需要深入进行研究。例如，在坚持改革、开放上提什么，在发展商品经济上提什么，在职业道德上提什么，在社会风气上提什么，在对外交往上提什么，特别是对特区建设有重大意义的新的思想观念是什么，都需要进行慎重的细致的研究。目前看来，在深圳需要大力提倡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观念，勇敢打入国际市场的观念，按国际规则和惯例办事的观念，建立和完善市场调节机制的观念，以及时效、质量、信息、信誉观念，竞争观念，人才观念，开拓创新观念，等等。树立新观念，一方面是党组织和政府提倡，一方面是加强宣传，发挥报刊、电台和电视的力量，造成舆论，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在人们实际的生产生活中总结和推广。

克服旧观念，仍然是特区建设中一个艰苦而细致的工作任务。旧观念，在相当程度上对特区建设起妨碍的作用，绝不可忽视。总的来说，深圳的干部和群众对改革、开放的承受能力是比较强的，但仍然不能忽视陈旧的、停滞的、僵化的观点的影响。必须不断克服僵化的观点，这样，才能提高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激发开拓创新的精神。必须破除小生产的自然经济的传统观念、封建的宗法观念、平均主义、本位主义和特权思想、专制作风，等等。深圳特区虽然受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影响首当其冲，但封建主义思想和“左”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由于深圳原来是个边境小镇，是在农民包围的条件下建设特区的。现在的许多城镇居民、工人以及干部，原来都是农民，小农的观念很深，至今对干部和群众还有影响。深圳特区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了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定要重视破除小生产观念和宗法思想，这是我国封建主义思想影响比较突出之点。小生产观念表现为安于现状，不求革新，信息闭塞，孤陋寡闻，慢节奏，低效率；宗法观念则搞家长制、一言堂、等级思想、人身依附关系和血缘关系、门第观念、讲人治不讲法制，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与现代化观念格格不入的，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的，必须认真地加以克服。

转变思想观念，倡导新观念，破除旧观念，是一项非常严肃、细致和科学的工作，要讲求科学性，不要搞片面性，切不可把我们原来好的东西当作旧观念破掉，把国外不好的东西当作新观念搬来。在观念的变革中，尤其要注意，不能借口观念更新，丢掉我们民族的美德和党的优良传统，如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艰苦奋斗的精神，勤俭节约的美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等等。不能因为要树立商品经济观念、按劳分配观念、竞争观念而予以排斥，说什么那是“傻气”、“孤寒”。与此同时，也不能把目前做不到的事情、不宜于那样去做的事情，不适当地加以提倡。如高消费、“拼命干活拼命玩”、“用光花光”，等等。总之，对于什么是新观念，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什么样的新观念，既要大胆探索，又要科学分析，弄清哪些真正是新观念，应该提倡，

哪些是以新观念面目出现实际上是错误的或不科学的东西，哪些的确是旧观念需要克服，哪些本来是好的东西却被当作旧观念来加以排斥的。这是思想战线上一项非常细致的工作，要谨慎地实事求是地加以研讨，使转变观念真正取得成效。

三、精神文明建设适应经济建设和发展商品经济要求的问题

深圳特区是经济特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里基本的大量的活动是经济活动，主要又是商品经济活动。这就必然对精神文明建设，如对人们的思想、道德、精神状态、科学文化素质、劳动态度、生活方式等，提出符合商品经济规律的要求。从精神文明建设本身来说，它有独立性，又有依附性，它有自己的体系，又有与经济建设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关系。六中全会决议中说得非常清楚：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的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可见，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来讲，从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本身来讲，都要研究如何适应经济建设要求的问题。

精神文明建设适应经济建设的要求，重要的就是要使人们增强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和承受能力，提高执行正确的建设方针、切实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自觉性，提倡和树立与发展商品经济相适应的观念，培养提高干部群众适应这种需要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业务能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提高工作效率，等等。目前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不尽一致，在经济领域提倡的和在思想道德领域提倡的不尽相同。如发展商品经济提倡讲效益、讲利、讲钱，而在思想道德方面则强调义、强调精神；在经济生活中承认、照顾、体现个人物质利益，而在思想道德方面则提倡大公无私和牺牲精神；在经济生活中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在思想道德方面则提倡不要斤斤计较报酬，要多贡献少索取；在经济生活中鼓励个人冒尖，允许竞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在思想道德方面则提倡先人后己、助人为乐；在经济领域提倡改善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在思想道德方面提倡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等等。经济的尺度和思想道德的尺度不一样，现行政策和思想教育的要求不一样，应当怎样认识和对待这种情况呢？

本来，经济的尺度和道德的尺度应该是一致的，一定的思想道德应该适应和服务于经济的要求。之所以出现两者不一致，可能是因为：一、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一时还跟不上，党的思想工作也还跟不上，因而出现了不适应甚至发生矛盾的状况。二、过去思想道德教育脱离实际，尤其是不符合商品经济的实际，没有把先进性与普遍性区别开来，例如过多地宣传不计报酬等。三、有些则并不是不一致或相互背反，而是相互需要。例如，上面列举的那种情况，两方面是同时需要相辅相成的。我们既要关心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又要提倡大公无私的精神；既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提倡共同富裕；既要讲竞争，又要讲团结互助；既要讲改善生活，又要讲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等等，这两方面并不相背反，而是搞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同时需要的，不能强调这一面而排斥另一面，要掌握两个方面的统一。

综上所述，根据特区的实际情况，一定要强调思想道德教育与经济建设相结合，为经济建设服务，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要保持思想道德教育与执行现行政策的一致性，保证和促进政策的落实；同时，又要不断地旗帜鲜明地宣传先进思想，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引导人们向先进学习。为此，要注意下列几点：1. 大胆地提倡符合商品经济需要的，符合党的现行政策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应该是为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所需要的，与现行经济政策相协调的，能为大多数群众接受和实行的，一种普遍的通行的观念。如敢于讲按劳分配，敢于讲责、权、利相结合，敢于讲竞争，讲冒尖，敢于先富起来，敢于开拓创新，等等。思想工作要更好地为执行党的现行政策服务。

2. 把思想道德观念与经济行为统一起来。经济领域的行为，不要违反和破坏思想道德观念所提倡所规范的东西，如讲利不要忘义，不要去损害义，要用正当的手段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去讲利；在讲钱的时候，要有原则，不要“一切向钱看”，钱就是一切。反过来，思想道德观念也不要脱离经济的实际，要为发展经济服务，要有利于保护和发展正当的经济行为，在进行思想教育、提出对思想道德方面的要求时，不要脱离大多数人的水平，不要提得过高，要多宣传思想道德观念与经济领域行为的统一，要善于抓两者的统一点。

3. 要区分先进性和普遍性的不同要求，把两者结合起来，既照顾多数，又鼓励先进。必须实事求是地考虑多数人的觉悟水平、承受能力和当前的现实情况，提出相应的符合实际的要求。对不同对象的不同要求，可以并存，以便把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人都团结、凝聚在一起，为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奋斗。但是，一定要注意，先进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总要走在社会发展的前面，作为向导，社会上总有一大批先进分子，站在时代的前列。因此，一定要提倡先进的思想和道德，并且不断地加以扩大，使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具备，不断地提高广大群众、提高全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

4. 必须认真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不能脱离经济建设的实际，不要凌驾于经济生活之上，而要结合、渗透到经济建设中去，真正为经济建设服务，认真解决经济生活中的思想认识问题和生产者的实际问题。

精神文明建设适应经济建设的要求，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商品经济的两重性。搞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实现我国经济的现代化；也有利于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打破平均主义，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激发人们的进取和创新精神。但是，商品经济又有另一面，可能对精神文明建设产生不良影响。例如，一些人为了追求企业和个人利益而损害整体的国家的利益，抵制国家的监督和宏观管理，损害国家的总体平衡，或者为了经济效益而不顾社会效益，自私自利、个人主义思想可能滋长；采用非法的或不道德的手段，以假作真，以次充好，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货币在生产 and 流通中的作用，容易诱发一些人产生“金钱至上”、“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分配拉开档次，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也会在各种人员之间产生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出现思想上、生活

追求上的不良倾向，影响社会意识、伦理道德、人际关系；由于商品经济的扩大和发展，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的商品化程度愈来愈高，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有可能滋长蔓延，侵蚀干部队伍，社会上某种丑恶的东西，也会借机沉渣泛起，如此等等。深圳特区实行以市场调节为主，这方面的问题就更加值得注意。

如何对待商品经济的两重性？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 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正确分析利弊，趋利避害，坚定地发展商品经济，大力发扬商品经济的积极因素，同时谨慎地稳妥地克服商品经济的消极影响。对消极影响，既不能等闲视之，又不要大惊小怪，因噎废食。商品经济是一个大海，要学会在这大海中游泳。商品经济是一个学校，要在这个学校中学习，学会发展和管理商品经济，学会在商品经济中培养人、教育人，引导社会思想向好的方面发展，克服各种不良倾向。

2. 必须加强思想教育，特别是理想和道德教育。要提倡和树立共同的理想，提倡人要有精神，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特区的共同理想，把大家统一起来，团结起来，以共同理想作为精神支柱。要切实搞好道德教育，尤其是职业道德教育，要讲信誉、信用、信义，反对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反对言而无信、弄虚作假、欺骗他人等错误行为。

3. 必须加强管理和法纪。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必须加强国家的宏观管理，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执行各项法规、规定，履行经济合同，要用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教育的手段，限制、克服商品经济的消极因素。特区尤其要建立和完善宏观管理体系，加强和完备法制。任何企业和个人，都不能随便乱来，要有全局观念、政策观念、法纪观念，服从管理，执行政策，遵守纪律，依法办事。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四、文化发展问题

随着特区经济的发展，特区文化要相应的发展，发展特区文化，目前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一是与香港和国外的文化交流问题；二是特区文化市场的搞活和管理问题。

关于对外文化交流，有这样几点看法：

1. 要主动地有领导、有引导地进行交流。对外开放之后，大门一开，国外的文化自然地通过各种渠道进来了，有人把这叫作“自流”。不能只是“自流”，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有选择有引导地进行交流。这里关键在于要选择对我有益的东西，而不是照搬、抄袭，更不是在文化上“全盘西化”。

2. 官方与民间并举，要扩大民间的交往。过去，我们的对外文化交流，多是官方的，有些虽然名义上是群众性的，实质还是官方的。今后要加强民办这一方面，使两者都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3. 公务性与商业性并举，要扩大商业性的交往。过去，我们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

公务性的多，商业性的少。特区要发展商品经济，以市场调节为主，文化方面的商业性交往，占有重要的地位。除了以政府名义派出和邀请艺术团体、学者访问之外，商业性的活动应愈来愈多。

特区已经建立了一个文化市场，已经摸索了一些经验，进一步搞活和加强管理，关键是政策问题。

1. 在发展文化事业上也可以引进外资，可以国营、集体、个体一起上。各种文化事业，可以由国家办、集体办，也可以个人办，可以大、中、小型并举。为了满足群众需要，小型分散的也不可忽视。

2. 文化市场的经营管理，要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以社会效益为最高标准。当然，在具体掌握上，对社会效益要有分析，区别不同的要求。要坚持“提倡有益的，允许无害的，反对有害的”这个方针。

3. 发展文化市场，要尊重价值规律。经济市场要尊重价值规律，文化市场同样要尊重价值规律。尊重价值规律，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才有利于文化市场的繁荣。

4. 文化事业的管理体制要改革。文化管理体制要有利于发展文化的生产力，要能吸收和培养大批的人才。经济部门实行的合同制、聘任制，在文化机构中亦可实行。

5. 要制定和完善文化方面的法律、法规。文化市场如同经济市场一样，也要用法来管理，法是一个很有效的管理武器。许多属于政策的思想道德的要求也可用法固定下来。

作者单位：《红旗》杂志社驻深圳记者站

责任编辑：范英



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会成立

1987年8月，在新疆召开的全国第四次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学术研讨会上，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同意，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批准，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会”，该研究会挂靠在广州省社科联，并聘请了肖前、赵凤岐任顾问；张江明当选为会长；副会长是吕英寰；秘书长是梁渭雄。

（译）

广东青年观念变化的考察

陈镇宏

一、现状与条件

这几年，广东青年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中，产生着新需要，形成着新观念，锻炼着新品质，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充实个体以提高整体的价值观念。改革为个体发挥潜能创造了条件。青年根据社会的需要发奋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充实自己，完善自我。据统计，1986年全省有150万职工参加了读书活动和各类文化技术学习。青年随着知识和才能的增长，更加希望把自身潜在的价值发挥出来，变为现实的价值。通过发展个体的价值来提高整体的价值，这是逐步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要求的必然趋势。

(二) 勇于开拓进取的处世观念。开拓进取的品格，是人类和个体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要求自身所应具有的能力。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观念为青年所抛弃。而“人生难得几回搏”等格言，已逐步成为广东青年的口头禅。据广东省青少年研究所最近的有关调查，回答敢于打破铁饭碗，自强生活的青年，比例高达66.5%。

(三) 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平等的政治观念。我国现在的政治体制所存在的一些弊端，曾经使某种人身依附的现象得不到彻底的改变。这几年则允许人才合理流动，青年摆脱人身依附、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便逐步地多起来。许多青年人认为，职务虽有高低，但人格应该平等。等级观念正在淡化，“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正在深入人心。

(四) 多向度重契约的人际观念。人际交往的向度、方式和内容，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广东青年周旋于

业缘的时间多了、范围广了，业缘观念不断地强化。这就是重视合同的作用，在相互业务来往中，抛弃血缘关系的“君子协定”，在订立合同时先讲明“利”，一切计算得清清楚楚，按合同办事。

(五) 现实化的幸福观念。中国的传统观念有重义轻利的倾向，“正其义不谋其利”，体现了只求精神满足、不讲物质利益的幸福观念。现在的广东青年，在追求“共同理想”和“最高理想”的过程中，通过劳动致富，奋起撞开现实的幸福之门。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也是创造幸福的源泉。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搞活的艰苦劳动中，为国家创造着巨大的精神和物质财富，也使自己得到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幸福。

(六) 快节奏的时间观念与开放性的空间观念。现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不仅是口号，而且支配了广东青年的行动。对外开放以后，广东青年把视野扩展到全世界，改变了对比参照系。以世界先进水平为参照系，可以找到差距，瞄准目标奋起直追。在同省内外、国内外广泛的经济联系中，产品要远销千里之外，就必须把空间位置、运输速度、时间长短等联系起来考虑，从而逐步形成时空一体化观念。

广东青年思想观念发生比较深刻的变化，有些方面走在全国青年的前面，这同广东的改革、开放、搞活走前一步是紧密相联的。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8年多来，广东利用这个特殊条件，加快了改革的步伐，推动了经济文化的对外开放。这就为新观念的萌芽、生长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一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新观念的形成提供了丰腴的土壤。现在，广州、珠江三角洲已成为全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商品经济是瓦解小农经济的“催化弹”，促进了人们心理结构和观念结构的更新。商品作为“天生

的平等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必然推动劳动者形成自立、平等和民主的意识；而价值规律则冲击了以权谋私的不等价交换，小生产者的固步自封、因循守旧等陈腐观念，促使生产者形成效益观念、信誉观念、创新观念、知识观念等。二是开明的政治环境为新观念的生长提供广阔的心理场。广东改革开放进展比较快，是因为这里有适应改革和开放的“大气候”。广东各级领导坚持改革、支持改革，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勇于忍住“阵痛”，通过深入改革来逐步解决。随着改革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多的利益，就增强了广大群众对改革的心理承受力，并转化为开展改革和各种创新活动的广阔心理场。这样，青年的新观念、新思潮、新的生活方式，就有了一个发生、完善的环境。三是广泛的中外文化交流为新观念的发展提供丰富的养料。近代以来，广东就是“西学东渐”的前沿阵地，成为中外文化的融合点。这个历史条件使广东人形成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心理素质。对外开放以来，广东不仅“先走一步”，而且在范围上、规模上都为全国之最。这就使广东青年能够在现代化实践中融合中外文化的合理因素，形成一系列的新观念。

二、特点与规律

从青年色彩缤纷的各种新观点、新思潮中找出其变化的特点与规律，是新时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这些特点和规律主要有：

（一）超前性与落差性的相互交织显示观念变化的不平衡性。从地域上看，观念变化的超前性与落差性的不平衡性，是地区之间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的体现；从观念变化与社会变革的关系看，观念变化的超前性与落差性的不平衡性，是观念形态的受动性与能动性的体现。观念形态总是现实的反映，这是它的受动性。观念形态的能动性，就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动性。实践水平的高低，同个人的精神状态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观念与理论的关系看，观念变化的超前性与落差性是社会意识各部分之间发展不平衡的体现。观念是理论与社会存在之间的中间环节。一方面，由于观念更接近实际生活，更敏锐地感到社会变革的雷声闪电，因而能够更早地反映新的社会因素。另一方面，观念反映现实又是粗糙的、不成熟的，而观念经过理论的加工则

更深刻、更正确地反映现实的变革，因此理论能够影响并指导社会思潮。理论要自觉地汲取、加工观念，而观念也要趋向理论并上升为理论。

（二）新异性与务实性的联结显示观念变化与现实利益的内在联系，即利益是观念变化的直接动力。首先，利益决定了新观念的突破点。观念变化的新异性，实质上是对陈旧观念结构的突破与超越。这种突破与超越出现在这个方面而不是那个方面，是根源于现实的利益，因此表现为明显的务实性。新观念是改革中产生的新的需要和新的利益的反映。而旧观念对改革的抵制，实际上是同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相联系的，决不仅仅是意识的相对独立性问题。其次，利益决定了对传统观念的取舍与改造。新观念对旧的观念结构的突破，必然引起旧的心理定势的分化和瓦解。组成旧的观念结构的那些因素，在新的条件下经过扬弃而重新组合，形成新的心理定势。清除什么，继承什么，只能是以现实的需要为基点。同时，继承也并不是简单地照搬下来，而是把优良传统现实化，使传统在新的实践中得到升华。再次，利益决定了新观念的巩固和完善。青年对自己所形成或接受的新观念，也在实践中不断地选择、淘汰、发展。只有真正符合社会主义需要和利益观念，才会被巩固、完善起来。在改革过程中，青年对自己需要的认识，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从不大正确到比较正确的发展，因而新观念也经历了从片面到全面、从粗糙到完善的发展过程。人们活动的动机、愿望、意志，归根结底是以物质利益为根源的。因此需要从利益关系上考察观念的演变。

（三）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融合显示观念变化的主旋律，即观念不断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由落后到先进的上升过程。改革中青年对个体价值的确认，使得他们敢于显露个性、表现个性。从衣着、发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限丰富的个性化观念，构成了青年观念的多样性。个体意识是为了适应个体参加社会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又是为维持个体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青年投身于改革、开放的实践，就需要个性化的观念来维持自身的活动和发展。然而，个体意识的产生，又总是社会的产物。各个人不管实践条件如何不同，经历如何特殊，毕竟是从从事着共同的社会变革。个体观念总是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深度反映着改革和开放的要求，即反映共同

的实践所产生的共同需要和共同利益，以及共同的理想所引导的共同动机和共同愿望。因此，个体观念又具有普遍性的品格。也就是说，青年观念的多样性包含着统一性。由个体所产生的观念一旦为群体所接受，就转化为群体观念，成为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这正是新观念能够广泛传播的依据。青年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共同理想的奋斗中，随着物质和文化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在道德上、精神上、政治上也不断成长起来，因而对实现远大理想也就逐步有了明确的认识。理想是以现实所能提供的条件为前提的，是现实发展的必然前途。从现实出发，通过实现共同理想而向远大理想迈进，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青年观念变化的总趋势，跟随着这个运动前进，是不断由落后向先进、由愚昧向文明、

由贫乏向丰富的上升过程。

综上所述，观念变化是根源于现实社会变革的客观过程。从总的发展趋势看，广东青年观念变化是积极的、健康的，但在观念变化的各个阶段上，在发生变化的各个个体上，则呈现复杂的状况。因此，观念变化又不是自发的，自然而然的。这里有一个观念引导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使青年正确地从事现实变革和商品经济发展中汲取新观念，正确地继承传统观念和吸收外来观念，从而形成科学的价值观、道德观、社会观，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并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作者单位：南方日报理论部

责任编辑：范英



粮食：广东面临的问题 及解决办法

张 井

一、贯彻贸工农方针对广东粮食问题的影响

广东省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粮食总产经过了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的波动。对这种情况应如何认识？

第一阶段，是1979年至1984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但总产增加。这个阶段的特点是：（1）农村开始并逐步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力得到了初步解放。（2）粮食集市贸易逐步开放，但长途买卖尚未普遍开展，所以粮食贸易的自由度仍然比较低。（3）专业户开始出现，但由于受粮食贸易自由度的限制，所以他们不敢离开粮食生产搞专业，仍然靠自种粮食解决口粮、公购粮和部分饲料。（4）各种经济作物虽然逐步开放，但价格提高不多，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的收益差还不很悬殊。（5）开始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粮田逐年有所减少，但粮食单产提高的幅度大于播种面积的减少幅度。

第二阶段的转折点是1984年11、12月，赵紫阳总理考察珠江三角洲时，明确提出贸工农方针。从1985年开始，粮食播种面积进一步缩减，粮食总产也减少了。而从省外购进粮食则大量增加。这个阶段的特点是：（1）粮食贸易自由度大大放宽，普遍推行了“以钱代粮”。（2）除粮食等6种农副产品外，其他农副产品因放开而大幅度涨价。全省粮食改为合同订购后，实际价格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平均每担减少0.12元。粮食与其他经济作物，特别是与水果的收益差十分悬殊。（3）农村产业结构大调整，特别是乡镇企业崛起，粮田面积大量转移。1986年与1978年相比，粮食播种面积减少24.0%。劳动力也大量转移。（4）专业户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不再以粮食自给为基础，粮食生产变成了他们的副业。

由此可见，广东前一时期粮食增产，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胜利的结果，也是初步贯彻贸工农方针的结果；后一时期粮食减产，则是农村第二步改革，更是贯彻贸工农方针的结果，是广东经济走向繁荣的现象。所以从本质看，是好事。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它又是粮食体制改革落后于其他改革所产生的问题。这个问题应以加快粮食体制改革步伐，进一步贯彻贸工农方针来解决。

二、粮食及其在广东的特点

粮食是商品，也应和一般商品一样按照商品流通规律办事，这是共性；粮食又有别于其他商品，有它特殊的流通规律，这是特性。当前的问题是，许多人既不遵循一般商品流通规律，也不遵循粮食自身的特殊流通规律。粮食作为一般商品所应遵循的流通规律，包括：买卖双方自愿、不能强买强卖的自愿让渡规律；价格要依据价值的等价交换规律；价格又要反映供求的供求规律；买卖要允许竞争，价格也要反映竞争，竞买则升价，竞卖则降价，这叫竞争规律；商品的经营要有利，而且经营的品种随利润而转移，这叫利润规律或经济效益规律。我国粮食在1984年以前实行统购统销制，在1985年以后实行指令式的定购统销制，都只有买卖的形式，而没有按照商品流通规律办事。

粮食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要按照它的特殊规律组织流通：（1）粮食是一切商品之首，古称“万民之命，国之重宝”。（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杂说》）毛泽东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所以要十分重视抓好粮食的产、供、销。（2）粮食生产有波动性，所以必须搞好储备和调剂。（3）几乎凡有人群的地方，都可以种粮食。所以无论什么地方如有必要都可做到某种程度的自给。（4）口粮的需求弹性小，生活水平越高，需求量越少；但饲料粮的需求弹性大，生活水平越高，需求量越多。（5）粮食远运的制约性比较大。粮食是值低量重商品，古代有“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粳”（《史记·货殖列传》）的谚语；现代运输进步，虽可远途贩粳（粮），但受运输力制约，且运费较高。故粮食调剂要考虑运输力和成本。（6）粮价过贵过贱均有害。“粳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汉书·食货志上》）

广东在粮食问题上也有显著特点：

第一、广东既宜种粮食，又宜种经济作物，因此，两者争土地、争劳力的矛盾特别突出。

第二、广东既能成为余粮省，又会成为缺粮省。宋、元两代，广州是重要米市，从清朝后期开始，殖民主义国家经济侵略，广州作为重要的通商口岸，国际市场对广东提出工业原料大量需求，同时输入大量洋米，改变了农村产业结构。广东才变成了缺粮省。建国后1952年起，实行地方粮食自给方针，广东又变成了余粮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再度变成缺粮省。

第三、广东多产粮食则穷，多种经济作物则富。这是由于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由于生产经济作物的收入历来高于粮食。二是广东农业的优势在经济作物而不在粮食。广东许多经济作物的自然条件和价格都居全国之冠。而广东种粮食的自然条件只居全国之中下。1979年至1981年统计，广东在全国13个水稻主产省中居倒数第三，比全国平均亩产低67斤。广东粮食生产所受的自然灾害很多，建国后平均5年二歉。自近代以来，广东曾出现过两个“富甲天下（中国）”的时期。一是30年代前期的“陈济棠时代”，大种甘蔗，大建糖厂，大产茧丝，赚钱买米。另一时期，就是现在。总结这两个时期的经验，

集中到一点，就是实行贸工农方针，利用广东特点，发挥广东经济作物，特别是创汇农业优势，避开了粮食劣势，获得更大的收益。

第四、广东虽有购进粮食的条件，但受运输力和外汇的制约。广东邻近湘、赣、皖三个主要产粮省；还有虽然遥远，但海路可通的东北，那里盛产的玉米可作饲料。虽然它们现能输出的粮食不很多，但生产潜力很大，现在它们的粮食生产也受到粮食定购价格偏低和粮食买卖不够自由的抑制。只要这两个问题解决了，这些省的商品粮将有大幅度增加，可以满足广东对粮源的需求。同时随着京广复线建成，茂三线通车和南方江海联运的发展，运输力将有较大提高。

购进粮食的另一途径是进口，当前美国等25个国家粮食生产稳定而过剩，政府补贴出口，粮价不贵，还有降价趋势。而且广东地处沿海，外轮运输力充足。但要大量进口却受留成外汇制约。

三、转变两个观念，采取两条对策

根据粮食及其在广东的特点，解决广东的粮食问题，应当转变两个观念，相应采取两条对策，归根到底就是贯彻贸工农方针。

第一，由小流通观念转变到大流通观念，大胆利用国内外的粮食市场。

广东应当少种些粮食，多种些经济作物和多办些二、三产业。这不但是广东先富起来，而且是粤、湘、赣、皖四省共同富裕的道路。现在妨碍自觉地实行这个战略的是小流通观念。他们只相信在本省、本市范围内组织流通，认为只有本省、本市自给才保险，靠省际、国际输入会受制于人。这是扩大了自给自足观念。

一个国家要求粮食自给是必要的，但一省一市更应注意粮食的商品化和专业化。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依靠自给是不保险的，自给的地区越窄越危险，粮食尤其如此。因为粮食生产不稳定，即使是粮产区，遇到灾害歉收也会缺粮。相反，依靠贸易才立于不败之地，而且贸易范围越宽广越有保障。因为在商品经济社会，只要有了货币这种一般等价物，就不愁没有饭吃。所以要确保广东粮食供应无虞，必须依靠全国社会主义统一市场，辅之以国际市场。我们一定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把视野从省内范围扩展到全国范围以至国际范围。不但要调动省内一切积极因素，而且要放手利用省外国外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因素，以全国和世界之长补一省之短。这是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大流通观念。

广东要多种经济作物少种粮食，而且，比例必须适度。这个“度”是动态的，有四个影响因素：一是广东的消费量；二是省内各地区经济作物与粮食生产的收入差；三是湘、赣、皖等省的粮源和通往广东的运输力；四是进口粮食所需的外汇和世界市场的粮价。分析一下1986年的情况，全省6846万人口，粮食总消费量480亿斤，加上从省外购进的猪、禽、蛋折合成饲料粮11亿斤，实际总消费量441亿斤，平均人平消费量695斤。其中口粮占总消费量80%弱，饲料粮占20%强。本省粮食总产量841亿斤，占总消费量的

77.8%，接近口粮的数量和比例；从省外国外购进100亿斤（含猪、禽、蛋转化粮），占总消费量的22.7%，亦接近饲料粮的数量和比例。这一年，全省粮食供求基本平衡，物价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国民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这一事实证明，1986年广东多种经济作物和少种粮食的比例没有超过合理的限度。据此设想，该年所形成的人的口粮量靠省内生产，饲料量靠从省外国外购进的格局是适度的。

随着广东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和人均口粮减少成了双向相反比例。到本世纪末，总口粮需量将增加不多，预测为880亿斤。要达到这个产量，只要保持现有6500万亩播种面积而且提高单产即可。而饲料粮需量却将增加很多，预测为200亿斤多。这部分粮食，少数靠进口，多数靠从外省购进。它包括购进粮食和猪、禽、蛋。后者多进前者可少进，后者少进前者需多进。除了大力增加创汇农业和输往省外的高值高效益经济作物外，还应主动积极地与三省开展粮食和畜牧业生产联合，把双方优势结合起来，建立有计划的稳固的粮食供应和服务关系。

第二，由统制分配观念转变到商品经济观念，按照有计划的商品流通规律改革粮食体制。

改革前，我国实行粮食统制分配政策，其弊端已为历史证实和人所共知。现在取消统购改行合同定购本来是一大进步，但实际实行的是指令性的合同定购，没有按商品经济原则办事。合同定购成了强制收购，没有贯彻协商一致原则，违反了自愿让渡规律。合同定购价格过低，违反了等价交换规律。定购价全国差别极微，而且全年固定，违反了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购销价格倒挂，而且全国统一统销价，违反了经济效益规律。这种体制必然抑制了生产，打击了营销，助长了浪费，扩大了供求矛盾，并形成了恶性循环。

上述矛盾的根源在于定购和统销价格过低。矛盾的现象是人人看得见的，但对如何解决矛盾却有两种完全相反的思路。

一种思路认为，因为粮食是最重要商品，所以不能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如果按照价值规律办事，粮价就暴涨，而且影响到各种商品轮番涨价。如果政府补贴，财政承受不了，如果政府不补贴，人民承受不了，天下就大乱。这些同志在粮食统制的漩涡中团团转，无法解脱出来。他们的思想显然是一种自然经济思想。

我的思路相反：认为正因为粮食是特殊重要的商品，才更要按照商品流通规律，特别是依据价值规律办事，把粮食价格提高到合理水平，以奖励生产，鼓励经营，合理消费，促使供求平衡，上述矛盾才能解决。

我不但不反对粮食合同定购，而且主张真正贯彻合同定购的原则。“合同”和“定购”都是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的产物。“合同”的原则是《经济合同法》所规定的“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等价有偿”；“定购”是期货交易，是信用的一种形式，它有利于衔接产销计划，按照“合同”的原则定购，合同定购的数量，应是指导性计划，而不是指令性计划；合同定购价格，应依据价值和反映供求，与其他农产品的比价应是合理的。实行真正的

合同定购，取消统购，也应同时取消统销。

怎样的定购价才是合理的呢？我认为这个价格应当接近而略低于当地集市粮价，种粮的收益接近而略低于当地各种经济作物的平均收益，接近而又略高于产粮省的各种经济作物的平均收益。这样，对本省略低、对外省略高，加上做好行政、教育和组织工作，广东农民就比较愿意种植一部分粮食，保持现有6500多万亩粮食播种面积，并愿意签订和履行定购合同；产粮省农民，也愿意多种些粮食，少种些经济作物，为广东提供更多的粮食。我所说的粮食合同定购制不仅适用于本省，而且适用于邻省，我们也应与邻省的生产或经营部门签订粮食定购合同。现行的“以工补农”不是真正的商品经济原则，是在统制政策基础上的一点临时性、辅助性的修补，只起杯水车薪的作用。“三挂钩”则是奖售形式的恢复。

合同定购不但依据价值规律，也要依据供求规律和体现市场调节。合同定购的数量和价格，应随年成丰歉、供求盈缺、市价高低和其他农作物情况而浮动。合同虽在每年春播之前签订，但到收购时，可视上述情况而与农民协商调整。例如丰收粮多，供过于求，市价下降，可调低一点价而多购一点粮；反之，歉收粮少，求过于供，市价上涨，可调高一点价而少购一点粮。除此以外，定购价还要实行地区差、季节差、质量差等。这种浮动法和差价法，对本省、邻省都适用可行。

取消了统销以后，粮食敞开供应（如遇非常情况，可实行临时性凭证限量供应），销售价应由国家物价部门随行情而下达合理的最高限价。按照保本有利原则，保持合理的购销顺差。为了实行多家经营、多渠道流通，购销差价率虽然要有所限制，但也不宜太小，应略低于商业平均利润水平。

有些同志认为这样做，要给群众大量补贴，国家财政承受不了。这种担心主要因为拘泥于现行的粮差、肉差按人头补贴的办法。如果按照这种老办法补贴，补贴款集中由省以上财政支出，金额确实巨大。我主张采用调高工资（包括退休金）的办法，这样可以分散承受，分散消化。企业职工由企业负担和消化，个体劳动者由自己负担和消化。留下来由国家财政负担的，仅是由国家负责发工资的机关事业单位的在职和退休职工。这部分劳动者连同赡养人口为数不很多。由于改革粮价每个人口每年约多支出60元（假设把定购价提高80%），全省财政全年此项增支数额不会很大。另外，各企业由于调高工资，消化不了部分，会减少利润，因而影响少量国家所得税收入，这些增支，财政是可以承受的。同时，还可用增征高利高效益农业税，特别是乡镇企业税来弥补。所以，这不是财政增支，而是调整再分配的问题。

还有些同志担心，调高粮价会引起物价全面暴涨。我认为某种商品较大幅度涨价不会引起物价全面暴涨，物价全面暴涨是由于总供给和总需求严重不平衡所造成。禽、畜饲料和部分工业用粮早已实行市价供应。影响这些商品价格的是粮食的市价。调高粮食定购价和销售价，只会因工资提高使工业品的工资成本略为提高而影响物价指数的微小提高。其指数是可以约莫测算出来的，公式是以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除以统销粮提高价格总

額。如按1986年数据计算应为2.8%。由于粮价调整而提高工人工资和增加农民出售定购粮收入，完全可以抵消由此而提高物价指数对群众生活的影响。

总而言之，广东的粮食问题，只有深化粮食体制改革和实行贸工农方针才能解决；而深化粮食体制改革和实行贸工农方针的关键，又在于依据价值规律，选择在整个物价比较稳定的时机，把粮食的定购价和销售价提高到合理的水平。

作者单位：广东省财贸管理干部学院

责任编辑：周 华



广东外商投资法律环境的现状与对策

周 华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改革开放8年多来，广东在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已实际利用外资42亿多美元，占全国直接利用外资的六成以上；全省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4000多个，占全国总数的七成。^①引进外资工作新的进展与涉外法规的保障作用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法律对保障和促进经济发展起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开放后涉外经济的发展又对我们的立法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如何冷静地分析我省外商投资的法律环境的现状，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引导我省外商投资活动达到更高的层次，提高外资使用的综合经济效益，是我们面临的新的课题。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主权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我国的立法权（包括宪法及基本法律的制定、修改、颁布的职权）集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宪法》第100条）。这种既能体现一个主权国家立法权的统一，又能因地制宜地保证法律有效实施的中央和地方两级立法体制，就是广东可以根据本省的需要制订地方性经济法规的法律依据，它能够紧跟着国家经济立法的主动脉一起搏动。1979年7月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颁布了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税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商标法、专利法、外资企业法、海关法以及国务院发布的外汇管理、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和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等一系列涉外经济法规。它们构成了我国调整外商投资经济活动的框架，也为各省市建立、完善外商投资法律环境定下了基调。我省近几年来地方性涉外经济法规的立法实践，主要有两个特点：

1. 从法规的布局看，体现了突出特区、兼顾全省的立法思想。

我省要更好地发挥经济开放区的“四个窗口”、“两个扇面”的辐射枢纽作用，就必须以特殊的措施更有效地吸收外资，引进技术设备。而这就有赖于包括政治、经济、地理、法律、人口素质等多种因素最佳组合的投资环境。在此之中的法律因素是投资者考虑的关键性因素，这不仅仅基于投资者对投资风险的规避心理，更由于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性能使投资者的经济利益得到实际的保障。因此要吸收外资，就必须通过立法（特别是经济特区的立法）来确保投资者的利益。根据全国人大批准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

例》和我省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省人大常委会陆续颁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企业登记管理暂行规定》、《广东省经济特区企业劳动工资暂行规定》、《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深圳经济特区商品房产管理规定》、《深圳经济特区涉外经济合同规定》、《深圳经济特区技术引进暂行规定》、《深圳经济特区抵押贷款管理规定》、《广东省经济特区涉外公司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涉外公司破产条例》。此外，还有在全省或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适用的《广东省鼓励外商投资实施办法》和《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这样，无论是从地方立法的数量上看还是从涉及到的经济关系方面看，一个在立法的指导思想上突出特区、兼顾全省的，有利于外商到我省、特别到经济特区投资兴业的法律环境已逐渐形成。

2. 从法规的内容看，具有由粗到精，逐渐深化的趋势。

不少经济界人士曾以1985年为分界，把经济特区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1年至1985年，为特区的初创奠基阶段；第二阶段是从1986年开始，是特区的调整发展阶段。我认为，这个分期也是符合我省外商投资法律环境的发展趋势的。1981年，经济特区建立伊始，百业待举，为了尽快地把特区建设纳入正轨，各特区人民政府以“七通一平”为主要内容，着力在吸引外商投资的物质环境上下功夫，经过几年的努力，这方面的建设已大见成效。然而，在投资环境的诸因素中，国泰民安、法制昌明等无形的人际环境也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在经济特区起了催化剂的作用，激发了外商的投资热情，但是，光有原则性的规定而无落实的具体措施的法律客观上仍会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比如外商投资举办经济实体，毫无疑问要碰到注册登记的问题，该条例第七条的规定是“客商在特区投资设厂，举办各项经济事业，应向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请，经审核批准后，发给注册证书和土地使用证书”。但是需要具备哪些条件，经过哪些程序呢？《条例》没有规定。又如，随着越来越多的特区企业的建立，势必要雇佣大量的中国职工，对他们的经济地位、劳动福利仅囿于《条例》的简单规定，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基于此，省人大常委会于1981年12月24日颁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企业登记管理暂行规定》和《广东省经济特区企业劳动工资管理暂行规定》，以后，又颁布了以调整经济特区（主要是深圳特区）的商品房产、土地使用费、涉外经济合同、技术引进等方面的法规，外商投资的法律环境呈现了粗线条的格局。1985年下半年开始，我省外商投资的主要区域，如深圳经济特区，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现象比较严重，针对这一情况，深圳经济特区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把铺摊子、打基础的工作转到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的方向上。与此相联，这一时期我省涉外经济法规的立法动态主要体现在加强对已有的外商投资企业管理，并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特别是鼓励外商向山区县、经济开发区投资，鼓励设立《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的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从1985年12月25日开始，又陆续颁布了抵押贷款管理规定、涉外企业会计管理规定、涉外公司条例、涉外公司破产条例、广州市经济开发区条例、省鼓励外商投资的实施办法，由此，我省外商投资的法律环境出现了“精耕细作”的端倪。

总的来说，广东外商投资法律环境的现状是门类初立、由粗到精。但缺乏特色，优点不突出，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深化。

二

外商投资法规体系的建立，必须以国家对外资需要的整体利益为前提，根据本地的特长和特殊需要，突出能够刺激投资者利益动机的经济机制的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下几个因素制约了现有法规的效能的发挥：

第一，缺乏鼓励性的条款引导外资投向。

投资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其动机是赚钱，作为投资者来说，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就得着眼于风险小、利润高、回本快的行业，但我国吸收外资的方针是基于我国家大底薄、资金缺、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较低的实际情况提出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主要目的就是拓展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能源、交通等国民经济薄弱部门，改善我国目前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增强经济活力。这种表现在外资投向上的投资者投资的效益动机与受资国融资的需求动机的矛盾，应该由法律调整使之呈现协调状态。但除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中明确鼓励设立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给予这两类企业以特别优惠外，对法定允许外商投资的广泛领域内，没有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法规确定鼓励性和优惠性措施，吸引外商踊跃向我们急需发展的行业投资。据统计，从1979年开始至今，外商到中国投资在各行业中所占的比例，以酒店所占最高，为所有投资项目的50%左右。^②这就造成外商投资的非生产性项目多，生产性项目少；内向型项目多，外向型项目少；劳力密集型多，高技术项目少的情况，因而在总体结构造成一种外汇难以平衡，技术改造率低的格局，严重影响了我省利用外资的规模和宏观效益。

当然，投资者的成份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外资投向。广东的外资结构以港澳资居多。从1985年全省吸收外资的情况看，是年全省与外商签订协议共13896宗，实际利用外资92091万美元，其中与港澳（台）商签订协议13753宗，实际利用的港澳（台）资达84888万美元。^③由于港澳地区产业结构以纺织、轻工、电子装配、房地产组成，而港澳商回内地投资的主要目的是赚取近期利润或为转口贸易建立稳定的供货来源，急于获利，主观和客观两方面都决定了技术水平一般。因此，如果法规不明确鼓励外商投资我省急需的行业，并给予相应的优惠，在我省外商投资者的成份没有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外商投资企业的总的技术水平是难以提高的，这就必然影响我省吸收外资的总体效益。

第二，优惠措施的不足之处。

优惠措施是争取外商投资的关键性因素，投资法律环境的完善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法定优惠的程度。根据现行法规，我们给予外商投资的优惠是广泛的，涉及经营管理，劳动管理，外汇管理，出入境的便利、土地使用费、产品销售、税收优惠等几个方面。其中税收优惠作为能够给投资者带来实惠的重要渠道，直接影响着外资的投入和投向。我

国的涉外税收制度，体现了维护国家主权、贯彻税负从轻、优惠从宽、手续从简的精神。总的来说这是适合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的。但根本上说，税收优惠作为国家吸引外资和引进技术的重要经济杠杆作用尚未完全发挥出来。主要是未在法规上确立一种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具有倾向性的鼓励措施，客观上造成了对外商实行不分技术良莠的平均主义的优惠，这样的结果，又导致外商有意投资的是劳动密集、投资额少，见利快的行业。1986年省有关部门对全省的技术引进与设备进口进行了一次普查，发现从1979年到1985年底，全省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总用汇额共约40亿美元，在引进的项目中，具有国际水平的项目占总数的25.72%，其中属于国际上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技术和设备，生产的产品能外销，在国际上有竞争能力的只占18%左右。^④而在深圳经济特区，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据统计，6年内通过外商投资共引进3万多台（套）技术设备，其中先进设备不到13%，适用型设备约9.8%，而劳动力密集型与落后型技术设备则占75%以上，有许多设备是50、60年代的水平，不少在国外已属报废的设备。^⑤很显然，这样的技术结构与经济特区“产品销售以外销为主”的要求是大相径庭的。

第三，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弊端。

一个外商投资企业，要取得预期的经济效益，内部必须有一整套完善的运行机制，外部还得有一系列完备的监督管理措施。在外商投资较为密集的区域，更需如此。在深圳经济特区，截至1987年上半年，全市区已建成外商投资工业企业322家，其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的60%以上。可见，对这些企业实行有效的管理，关系到经济特区的整个产业结构的平衡与发展。根据我国现有的涉外经济法规，外商投资企业经注册登记后，即取得中国法人资格，享有包括财产所有权、投资选择、优惠收益权、经营管理权、诉讼请求权在内的广泛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如必须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接受有关主管部门或政府部门的检查监督，依照法律规定按时纳税等等。但是由于无论是全国统一性的法规还是我省地方性法规，均缺乏具体落实的条款，在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资料，我们一直鼓励原材料、零部件的国产化，几年来也一直致力在这方面给外商提供便利，但是法规在这方面没有设立具有约束力的规定，加上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正在进行，各种价格关系尚未理顺，故普遍存在内外资企业在税收、价格方面的双轨制的对峙的局面。在我省，不少外商反映，在国内购买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与国营企业是两种价格，几乎拿不到国家牌价的原材料，而且高价低质，选择面极窄；又如，外商投资企业普遍为乱收费、乱摊派、乱提价的“三乱”现象所困扰，在深圳经济特区，一些外商意见最大的就是电力公司修变电站要企业出钱，派出所履行职责亦要企业负担每个月数百元的保安费；再如，外商投资企业身为中国法人，往往“名不符实”，最突出的表现在对外商投资企业收缴费用中，违反了《对侨资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汇管理施行细则》的规定，与内资企业采用两种币别（人民币、外币）收费，扩大了用汇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外汇的不平衡。另外，外商投资企业在投产、达产后也难以受到管理机构的指导，往往造成在正常的业务活动中发生了纠纷的外商投资

企业“投诉无门”。刚刚投产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广东浮法玻璃有限公司行政管理兼财务总监道格拉斯·艾林先生曾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到中国投资，也想做个好市民，但我们得不到政府部门的文件、通知、材料等，这就很难做，有很多的信息只能依靠香港的报纸，我们希望能加强同政府部门的联系，也希望政府部门能定期给我们传递各种信息。”^⑥这些实际问题，随着《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和《广东省鼓励外商投资实施办法》的颁布与实施，有所缓解，但由于缺乏明确规定，弹性较大，在实际中往往难以兑现。此外，在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监督、管理的各个环节上，有些工作人员素质较差，客观上也导致监督管理工作流于形式。

第四，审批程序的繁琐。

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广东省经济特区企业登记管理暂行规定》、《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等规定，在我省，一个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一般得经过这样的几个程序：一是向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呈报申请书及初步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二是凭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向有管辖权的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册登记，领取营业执照，三是持主管部门的批文和营业执照等文件副本或影印件分别向当地税务局、外汇管理局、银行、海关等办理有关手续。这一系列“渐进式”程序，凡事亲躬，费时费力，令不少拟来我省投资兴业的外商望而生畏，裹足不前。据深圳市外资服务中心的调查，外商来深圳办企业，从立项至建成投产，至少需经过32个机构（单位）约64个审批环节，在此期间，外资企业最少需向上述机构上报37类共80份文件、资料，各审查机关发的批文、批件、证书至少18类46份。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在研究亚洲出口加工区的经验教训的著作中有一条重要的结论，“彻底简化行政管理的手续和措施，在吸收外资上其魅力每每超过经济上的优惠措施。”这一观点值得我们深思。的确，审批程序过于繁琐，其结果必然是办事效率低，这就严重抑制了外商的投资热情。

三

经济法作为国家为管理国民经济和调节各种经济关系而确立的强制性社会规范，较之其他种类的法律独具指导性功能。即一方面鼓励和倡导经济活动向着预定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限制或处罚有碍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倾向和行为。透视广东外商投资的法律环境的现状，存在的几个制约因素都可以归结到法规的指导性功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当然，有关投资基本原则等问题必须由中央立法来解决，这就要求尽快建立一个以《投资法》为主体的、成龙配套的外商投资法律体系。不过在目前来说，由于双重体制的抗拒影响，统一立法的难度大，一时半刻尚难以出台，但广东有着自己的优势，完全可以依据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运用现有的地方性法规立法权来深化完善我省的外商投资法律环境。

首先，通过对我省现有的外商投资企业的经济效益的普查和研究，依据我省利用外资的规模的远景规划和近期目标，制定出适合我省省情的、能体现诱导外资投向具体措

施的《广东省鼓励外商投资实施办法补充规定》，对于投资或引进我省急需产业、技术（这里并不强调皆为“先进”），按其规模、期限、区分不同序列的技术水平给予不同等级的优惠，特别是对那些能充分利用我省资源搞农副产品加工出口业、养殖业，或是我省急需的能源，交通行业的投资项目，在财政税收、银行贷款、原材料供应及价格、产品销售等方面实行“普惠”基础上的“特惠”，即扩大现有仅对两类企业实行“特惠”的范围，以有助于我省外资投向的优化，并以点带面，在整体上提高我们对外资的消化、吸收、管理能力，减少和避免重复投资和低效投资。

其次，法规应明确给予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同等待遇，确保外商投资企业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放宽外汇管制。对已投资达产的企业，加强管理，及时为它们排忧解难，尽可能地提供“仿真”环境，使外商能采用国际惯例，放手生产与经营。

再次，建议成立省外商投资管理中心，在省政府的领导下，集结有关外商投资行政管理的几个政府部门联合办公，专司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监督管理工作，统一进行项目的立项、审查、批准、管理工作，为外商提供“一次作业”的服务，使外商投资需要批复和解决的事宜，在这一中心就可以很快办齐。

目前，有大量的国际游资在寻找投资场所。同时，当前国际投资的结构和流向上出现的新特点，就是外国直接投资95%以上来自发达国家，而有8/4又投向发达国家。因此在引进外资方面，我们的竞争对手因其投资环境精良而比我们更具吸引力，故当务之急是要考虑怎样完善投资环境，给予外商投资更多的优惠待遇，增强我国对外资的吸引力。我省在全国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在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方面起步较早，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亦碰到了不少亟待通过法律手段去解决的问题，而这几年地方性涉外经济法规的立法工作成绩不菲。谷牧同志在1987年11月8日的“全国外商投资企业经验交流会的闭幕式”上透露：国务院准备给广东省在对外开放、利用外资方面以更多的自主权，并在广东率先进行外商投资体制改革的试点。为此，我们应更加努力，使我省的引进外资工作在逐步完善的法律环境中得到新的腾飞。

① 《人民日报》1987年8月14日。

② 《外商在中国投资失衡》（《参考消息》1987年6月21日）。

③ 《1986年广东省统计年鉴》。

④ 高国桢《广东省技术引进与设备进口情况调查》（《广东对外经贸》1987年第2期）。

⑤ 王珺《对深圳利用外资引进技术问题的重新思考》（《国际金融导刊》1987年第2期）。

⑥ 《完善二十二条，重在具体化》（《特区经济》1987年第二期）。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联
责任编辑：高伟梧

重建我国宏观经济的货币调控模型

欧小威

货币政策的实施，就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对根据一定的货币供求理论建立起来的货币均衡模型的操作过程。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货币供求理论，建构了我国宏观经济的货币均衡的理论模型和货币调控的操作模型，以及货币调控的有效性模型。

一、短期静态条件下的货币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的理论模型

货币供给量等于货币需求量就是货币均衡。货币均衡是经济均衡的反映，也是经济均衡的条件。我们必须使货币的供应量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或实际的货币需要量）。否则，不利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稳定和提高。所以，我们必须建立我国的货币均衡的理论模型。这个模型由货币的供给模型和需求模型相向构成。

1. 我国的货币供给模型

货币供应理论虽有不同的分析方法，但总可以概括成为以下模型：

$$M = K \cdot B$$

式中，M——货币供给量。

B——基础货币。

从中央银行来说，这个部分是可以控制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可以把中央银行向专业银行的贷款，看作是整个金融体系的原始资金来源。所以中央银行控制原始存款的能力，实际上就是它控制基础货币的能力。

K——货币乘数，表示单位基础货币B的变化所引起的货币总量M增减的幅度。

上述的货币供给模式称为稳定乘数模式，它从短期静态分析出发，假设各行为参数在短期内为一常数。这一假设与我国目前的经济条件大体相符，这一模式可作为计算我国货币乘数的参考。根据这个模式对我国所具有的适用性，我们可以建构我国的货币供给模型：

$$M_s = M_0 + \Delta M, \text{ 其中 } \Delta M = K \cdot \Delta B$$

此式表明，计划期货币供应总量 M_s 等于前期货币供应量 M_0 加上一定时期货币供应增量 ΔM 。而 ΔM 等于该期中央银行向专业银行的贷款量 ΔB 乘货币创造乘数K。由此可见，要有计划地控制货币供应，就不仅要有计划地控制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的贷款量，而且要使货币创造乘数也处于中央银行的控制之下。目前的难点是控制货币创造乘数。

西方货币理论认为，货币量的层次 M_1 的乘

$$\text{数值 } K_1 = \frac{1+c}{r+r_t \cdot t+c+e}, \text{ } M_2 \text{ 的乘数值 } K_2 = \frac{1+t+c}{1+r_t \cdot t+c+e}$$

式中：r——活期存款准备率；

r_t ——定期存款准备率；

$t = \frac{D_t}{D_d}$ ——定期存款比率， D_t 为定期

存款总额， D_d 为活期存款总额；

$e = \frac{ER}{D_d}$ ——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比

率，ER为超额准备金；

$c = \frac{C}{D_d}$ ——现金漏损率。

在西方，货币创造乘数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非银行经济部门等三种经济主体的行为共同决定。

(1) 中央银行决定r和 r_t 似乎应不成问题，但是在对各种存款实行差别准备率的条件下，中央银行并不能有效地控制总存款准备率r

($r = \frac{rD_d + r_t t}{c + D_d}$)，即不能决定有多少基础货币被

商业银行用作法定准备金。对此，在我国中央银行尚没有成熟有力的经济手段控制货币创造乘数，而货币供应量又偏多的条件下，可以考虑谨慎地使用“双轨控制”的方法，即一方面是采用以

经济手段为主的货币总量调节,另一方面是采用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贷款限额管理。这两者虽然是矛盾的,但在一定时期内急刹车却是很有必要的。

(2) 商业银行决定 e ,在市场经济中,商业银行保存多少超额准备,取决于各种复杂的关系情况。我国各专业银行规模巨大,如资金调拨灵活,可将ER压至最低限度,横向拆借也有利于ER的压缩。

(3) 社会大众决定 c 和 t ,影响 c 、 t 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收入水平,二是各种金融资产的收益率。我国由于金融资产单一,所以 c 和 t 的变动幅度一般不会太大。

因此,在我国的货币供给模型中,中央银行不但能够直接控制对专业银行的贷款量,而且也能够有效地控制货币创造乘数,从而控制货币供给总量。

2. 我国的货币需求模型

货币的供给量取决于货币的需求量。流通中货币需求量与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与货币流通速度成反比。

设 M 代表货币量, PQ 代表商品价格总额, V 代表货币流通速度。得:

$$M = \frac{PQ}{V}$$

我们多年来关于货币需求量的研究、计算正是建立在这个公式的基础上。

这个公式的三个数中有两个是未知数,因此,如果用上述公式计算货币需求量,就必须有以下假设:(1)商品价格总额 PQ 为已知的决定因素。(2)货币流通速度 V 为已知。

上述两点假设能否成立?

先看商品数量 Q 。由于货币的投放具有能动作用,因此,货币数量 M 并不是消极的被决定因素,把 Q 视为与 M 无关的变量,正是货币数量论的缺陷之一。如果承认 M 的变化同时影响 P 和 Q ,那么分清 M 变化的影响在 P 、 Q 间的分布,就成为计算货币必要量的一大困难。

以上述公式计算货币必要量的最大困难,还在于 V 难以确定。如果把 V 作为计算货币需要量的依据,则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

如果以货币流通速度是否变化为划分标志的话,我国多年来对货币需求量预测的方法主要可以分为两种模型。

一种模型可称之为经验数据论。它是假定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即以我国货币流通最具代表意

义的正常年份的经验数字为依据确定货币流通速度,然后用当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或用计划期的商品计划销售总额)去除,“货币需求量”就出来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是明显的,但也不可否认,它在70年代末期以前“三个不变”的经济条件下是预测货币需要量的有效方法。目前经验数据法已不再适应于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客观情况。

另一种模型是80年代初期开始探讨的经济计量学中的回归分析法。其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是林继肯同志的一元回归模型:(《经济研究》《货币需要量预测方法的若干问题》1985年第8期)

$$\hat{V} = 9.418 - 0.088t \quad R^2 = 0.4358$$

(0.33)(0.01)

此模型表明,货币流通速度每年必须递减0.088次。根据这个数据,凡是每年货币流通速度递减小于0.088次,视为合理界限内,可作正常的 V ,用来测算当年货币需要量。根据这个模型推算,如果以1986年为基期的话,再过63.66年后我国的 V 将等于“1”。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这种模式的结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因为货币流通正常化的标志并不是 V 越来越慢。货币投入流通,它的神圣天职就是加速和扩大商品的流通。而商品流通的加速与扩大必然表现为货币流通量对商品价格总额的比例倒数缩小,亦即 V 加快,这就是本义上的货币流通正常化。

我国货币流通速度较大幅度的下降,是货币流通不正常的表现,是典型的“受压制型的通货膨胀”。其原因在于我国实行了物价控制的措施。在物价被控制的条件下,偏多的货币未能为物价上涨所吸收和容纳,而由货币流通速度的减慢所吸收了。

如果以这种货币流通极不正常的状况而得出的统计数据来规定今后的货币流通量,只不过是错上加错,其结果必然是错上加错。

那么,究竟应采取什么样的模型来解决这个导致众多的货币理论家们陷入困境的难题呢?

如前所述, $M = \frac{PQ}{V}$ 公式求解的前提为:

(1) 货币流通速度 V 为已知,若以过去的 V 作为计算的依据,则必须假定 V 不变。(2) 商品价格总额 PQ 为已知,如果是纸币流通的话,还要分清 M 变化的影响在 P 、 Q 间的分布。

首先,我们假定 $V = V_0$ 。即以基期的商品价格总额与基期的货币流通量之比作为方程式的

分母。

既然我们的货币供给模型是短期静态模型，那么，在相应的需求模型中也必须是短期静态，所以假定 V 不变是完全具有可能性的。这种假定，不但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因为影响 V 变化的因素非常复杂，同时这些因素是互相绞在一起发生作用，它们相互牵制、相互驱动，发生一种系统因果的效应，因此，要在短期内计算出动态的 V 是根本不可能的。

既然短期中对 V 的动态求解既不可能又无必要，那么我们只能在短期中假定 V 不变才是合理的。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 V 不变与前面所批判过的第一种货币需求模型中所说的 V 不变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他们的模型中的 V 是等于理想年份的经验数据，如 1:8, 1:8.5 等等。由于这是以某一固定的数值作各年的 V 值，所以这种模型是长期静态的。而我们的模型中的 V 等于 V_0 ，即在一个短周期中，以 V 的初始速度 V_0 作为货币需求模型的输入值，在紧接着的下一个短周期中又以前个周期中 V 的输出值作为输入值，由此不断递进。由于 V 由输入到输出会产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是由影响 V 变动的各种因素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所以从长期来看， V 是处于不断变化、不断作自组织调节的动态过程中，是一个过程的连续体。因此，我们的需求模式虽然是以短期静态为前提，但却是以长期动态为结果，所以 V 具有符合货币流通正常化所需要的自适应性。

以上我们首先假定了 $V = V_0$ ，现在我们进一步假定了 $P = P_0$ ，以 P_0 作为 P 的输入值，其证明方法基本与前述相同。

在作了上述假定以后，我们对公式 $M = \frac{PQ}{V}$ 作如下转形：

已知 $V = V_0$, $P = P_0$, 又 $V_0 = \frac{P_0 Q_0}{M_0}$ 得，

$$M_d = \frac{P_0 Q_1}{V_0} = \frac{P_0 Q_1}{\frac{P_0 Q_0}{M_0}} = M_0 \cdot \frac{P_0 Q_1}{P_0 Q_0}$$

在转形公式中，令人不可捉摸的 V 转化为可以直接计量的因素，这是前人未尝试过的工作，但它却正是问题得到根本解决的关节点。

转形公式中的 $\frac{P_0 Q_1}{P_0 Q_0}$ 是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经济增长意味着商品和劳务供应增长，这必然要求相应货币数量作为交易媒介投入流通。但是，货币流通量适应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的过程，在不同的货币制度下有不同的途径。在金本位制度下，有贮藏手段这个蓄水池来调节货币需要量；在纸币本位制度下，由于缺乏这个蓄水池来调节，就需要人为地调节管理，这时货币的供给变化具有了能动的作用。

这种能动作用就表现在 M 的变化，同时影响 P 和 Q 。货币供应适度时能够加速商品流通，从而加速经济增长，反之则束缚了经济的增长或导致通货膨胀。所以，还必须进一步确定 M 变化的影响在 P 和 Q 之间的分布，而不能仅仅抽象地按照经济的增长率来定货币供给的增长率。这就是要使方程 $M = \frac{PQ}{V}$ 可解的另一重要前提。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 1950 年至 1975 年的货币、国民生产总值、通货膨胀增长情况来研究货币变动的影响在 P 和 Q 之间的分布函数关系。

项 目		美 国	日 本	西 德	英 国	法 国
国民总产值	① 指 数	202	910	440	195	320
	② 年均速度	3 %	9.7 %	6.4 %	2.8 %	5.4 %
货 币 量	③ 指 数	429	6270	996	420	1130
	④ 年均速度	6.2 %	19 %	10.3 %	6 %	10.6 %
两者增长之比	⑤ 指 数	1 : 2.12	1 : 6.9	1 : 2.26	1 : 2.15	1 : 3.53
	⑥ 年均速度	1 : 2.06	1 : 1.96	1 : 1.61	1 : 2.14	1 : 2.1
通 货 膨 胀	⑦ 指 数	204	452	211	410	400
	⑧ 年均速度	3 %	6.4 %	3 %	6 %	5.9 %

从上表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 货币超速增长与通货膨胀是有密切关系的。货币超速越多, 贬值越甚; 物价与货币超越程度成正比。

第二, 尽管货币超越经济的比值基本上接近通货膨胀指数(⑤与⑦), 但两者又不完全相等, 这说明各国货币供给量与经济增长之间有个函数关系。那么, 如何计算一国货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函数值呢? 根据统计学的基本原理, 其函数值计算公式可以表述如下:

$$F = \frac{\text{第几年货币指数/第几年国民总产值指数}}{\text{第几年通货膨胀指数/100}}$$

函数值F就是M与Q两者增长之间的函数关系。所以, 货币需求模型应进一步表述为:

$$M_d = F \cdot M_0 \frac{P_0 Q_1}{P_0 Q_0}$$

这个模型与前述的抽象模型(即 $M_d = M_0 \cdot \frac{P_0 Q_1}{P_0 Q_0}$) 在数学意义上的区别在于它表征了货币需求量是个区间, 而不是一个数点。此模型表明, 货币需求量是个弹性容量, 纸币增长具有自身的规律性。它表明货币的超前投放对经济的增长具有一定的刺激和推动作用, 货币适度超前投放能使M变动的影响在Q方向上分布最大, 在P的方向上分布最小。

由上述分析可知, 把方程 $M = \frac{PQ}{V}$ 经过转化以后, 完全可以作为我国的货币需求模型。

3. 我国的货币均衡模型

货币均衡是指货币供给量与国民经济对货币需要量基本相等。根据前述结论, 我们所建构的短期静态的货币总供给和总需求均衡的理论模型为: $M_s = M_d$, 具体展开为:

$$M_0 + K \cdot \Delta B = F \cdot M_0 \cdot \frac{P_0 Q_1}{P_0 Q_0}$$

人们常以自愿储蓄等于自愿投资, 或货币供给量与商品流通对货币需要量来说明货币均衡, 这种表述容易造成误解, 似乎只要生产出来的商品与购买力相等即可视为货币均衡。

现实的商品供应量, 可能是资源已被充分利用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 也可能是在资源仍未充分利用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在后一种情况下, 商品价值即使已全部实现, 并不等于货币的供求是均衡的。因此, 我们所说的货币均衡不仅要看价格水平有无不正常的涨落和商品能否顺利地销售, 还要看在现有经济技术条件可以使用的资源

是否已得到充分的利用。

根据货币均衡的定义, 可能有两种货币失衡, 一种是货币不足, 一种是货币过多。

根据短期静态的货币均衡理论模型, 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整高能货币或贷款量和货币乘数或准备金率来达到控制货币失衡的目的。其调控机制为:

$$K \cdot \Delta B = M_0 \left(F \cdot \frac{P_0 Q_1}{P_0 Q_0} - 1 \right)$$

二、建立长期动态的货币调控 随动跟踪系统的操作模型

前述的短期静态的货币均衡理论模型揭示了在现代纸币本位制度下的货币流通规律、货币流通正常化的标志和实现货币流通正常化的条件与机制。但是, 由于这个模型仅仅是从短期静态上抽象地表述货币均衡的规律本身, 因此还不能直接运用到宏观经济的调控中去。所以, 还要把这个模型进一步长期化、动态化和可操作化, 即建立以中央银行为主体的货币调控体系。

货币的调控系统可以分为不同的模式。若一个控制系统的目的是使其输出保持为常值, 称为恒值调节系统。若要求输出按一定的时间程序变化, 称为程序控制系统。若输出随输入按一未知的时间函数变化, 称为随动跟踪系统。前两种控制类型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按照预定的程序来执行控制功能, 因此都缺乏一种稳定的适应性。而与此正好相反的是随动跟踪控制具有对环境干扰和受控对象特性发生变化的适应能力。

随动跟踪定义为按一个未知的信息变量 $X_0(t)$ 来改变受控量 $X(t)$ (或称系统状态) 的控制。在随动跟踪的控制过程中, 要运用反馈机制R, 它的任务是不断复制外来信号 $X_0(t)$ 所产生的变化规律, 以确保受控量 $X(t)$ 对它的逼近。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类型的货币调控系统呢?

费里德曼所极力主张的单一规准(rule)的货币调控模式从经济控制论来看属于恒值调节系统。因为费里德曼认为要控制货币数量就必须按一固定的货币增加率行事。这种控制模式必须以经济状况的基本稳定为必要前提, 以经济状况可控程度不高为可能前提。这些条件目前在我国并不充分, 所以这种调控模式不足为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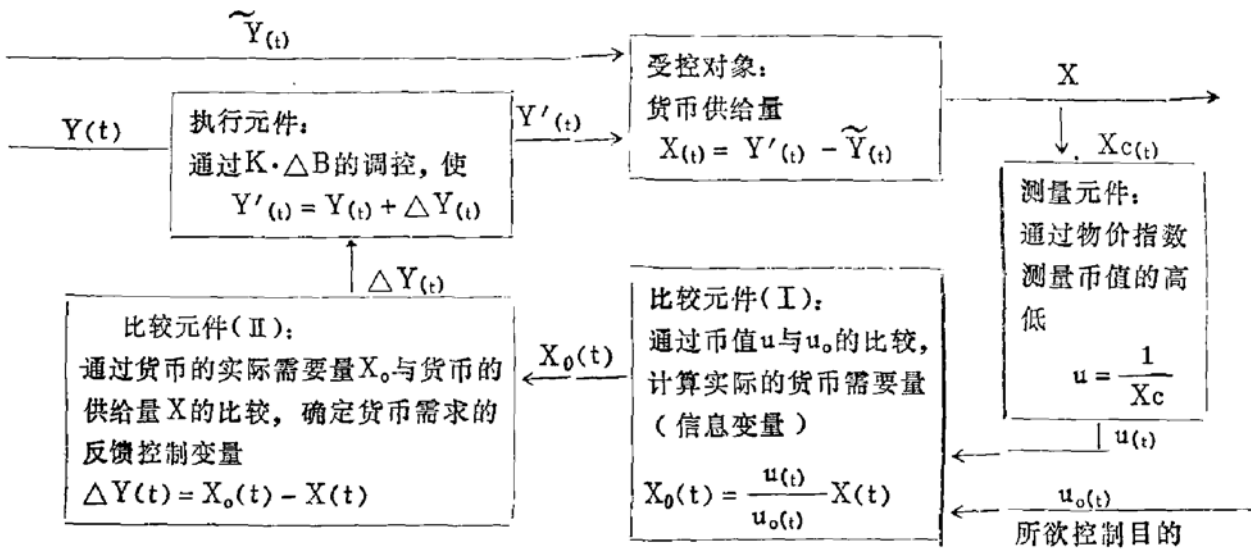
我国目前的货币调控体系基本上属于程序控制系统。因为我国长期以来都是以综合信贷计划为金融控制手段, 在正常的情况下, 人民银行只

要成功地利用了它对专业银行贷款的这一计划指标，便可以基本上控制住社会总的信用规模，并从而控制住货币供给量。但是，计划终究是事先的预期，而且我国的综合信贷计划的准确性不高，单按计划控制又常与搞活经济、搞活金融的历史趋势相矛盾。偏离客观过程的计划指标往往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尤其是我国现行的资金管理体制同最大效益地使用资金的要求还有相当距离的条件下，综合信贷计划本身还很难达到科学而合理的境界。同时由于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导致决策的时滞变大，这使现有的货币调控系统产生振荡的可能性增大，系统的稳定性下降，所以我国的货币供给量呈较大的波动幅度，经常性的急刹车会破坏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性。所以，这种程序控制的模式必须改革。

根据国情与调控系统自身的科学性，我们认为，我国应该采取随动跟踪的货币调控系统。这

种全新的货币调控系统建构如下：

我们执行货币政策的目的是在一定的政策目标（稳定通货）约束下，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控制货币总量，达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如果把货币供给总量当成货币调控系统的状态 $X(t)$ 的话，货币政策的执行过程就可以看作是以币值稳定 ($\Delta^{\circ}u(t) \rightarrow 0$) 作为控制目标。以货币供给总量 $X(t)$ 作为控制对象，以综合物价指数作为观察变量 $X_c(t)$ ，以经反馈 R 后所得出的货币实际需要量为信息变量 $X_o(t)$ ，以贷款增量 ΔB 作为控制变量，以货币需求模型 $M_d(t)$ 为预先设计的输入向量 $Y(t)$ ，以经反馈调节后的货币需要量 ($Y(t) + \Delta Y(t)$) 为实际的输入向量 $Y'(t)$ ，又以流通领域对货币的容纳量作为随机干扰性输入向量 \tilde{Y} 等等所构成的货币调控的随动跟踪模型的运转操作。其结构如图所示：



上述的货币调控的随动跟踪系统分为三大子系统：第一个子系统为信息系统，它由测量元件和比较元件（I）（II）两部分组成。第二个子系统为控制系统，由执行元件构成。第三个子系统是受控系统，由受控对象构成。下面我们分别阐述这三个子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及其理论背景。

1. 信息系统

要控制货币系统，首先要获得系统的信息，

其次还要有一个控制目的。如上图所示， $X(t)$ 是系统的输出状态，表示货币系统在 t 时货币的供应总量，测量元件是从系统获得信息的工具，它主要通过综合物价指数 $X_c(t)$ 来检测币值 $u(t)$ 的变化情况。所欲控制目的，即币值的初始状态 $u_0(t)$ 在比较元件（I）中与测得的信息 $u(t)$ 互相比对，然后将差异译成信息变量 $X_o(t)$ ；进而将 $X_o(t)$ 在比较元件（II）中与系统状态 $X(t)$ 互相比对，然

后将其差异译成控制信号 $\Delta Y(t)$ ，然后输入控制系统。这是一个货币信息传输过程，比较元件可以视为一个信息通道，它按照所欲目的对测得的信息过滤、加工和转换等等。

(1) 测量元件 我们以综合物价指数作为测量货币流通量是否正常的标志。

在纸币本位制度下，由于货币本身不具有价值，它是根据国家或金融当局的意志投入流通的，尽管它的数量可以不受经济的约束，但它代表的价值仍然要受客观经济规律的制约。纸币在投入流通伊始，它所代表的价值大小无关紧要，因为它是以历史继承的或国家规定的价格标准所代表的价值进入流通的，它仅仅代表着商品的相对价格。进入流通后，纸币还要代表商品的绝对价格，只有这时，纸币的币值才能被确定。纸币的币值决定于它所能支配的商品价值，决定于社会上的商品交换价值总值与纸币数量之间的对比关系。因此，币值的稳定程度取决于纸币的流通量与商品交换价值总值变化同步的程度。如果两者相适应，币值就稳定，物价水平就不变。否则，币值从而物价都会发生变化。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或已知的条件下，综合物价指数就自然成为检测币值高低的标准了，用公式表示为：

$$\text{币值 } u = \frac{1}{(\text{物价指数}) X_0} = \frac{\sum P_0 Q_1}{\sum P_1 Q_0}$$

(2) 比较元件 通过比较两个时点上的币值 u 和 u_0 ，测算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 X_0 （即信息变量），然后再将 X_0 与流通中已经存在的货币量 X 进行比较，得出流通中需要调节的货币增量 ΔY （即反馈控制信号）。

要达到稳定币值的目的，首先必须有币值稳定的标志，所以必须有一个币值参照点 u_0 。这个参照点所反映的初始币值的绝对水平有多高是无关紧要的。但初始币值一旦确定，就决定了商品的绝对价格水平，纸币就是代表这种价值进入流通的。所以初始币值要保持相对稳定，因此 u_0 就成了控制模型中的所欲控制目的。我们货币调控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币值变化率趋向于零，

$$\text{即：} \frac{u - u_0}{u_0} \rightarrow 0$$

根据币值变化率，可以测算货币发行量的适度水平。假如已知投入流通的货币供给总量 X ，在商品交换价值总值不变的情况下，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 X_0 就可以根据币值变化率求得，公

$$\text{式如下：} X_0 = \frac{u}{u_0} \cdot X$$

在已知 X_0 的情况下，就可以求得 ΔY ，公式如下： $\Delta Y = X_0 - X$

目前在世界许多国家已经广泛地采用物价指数来反映和“矫正”币值，消除通货膨胀带来的不利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采用的“特别提款权”和欧洲共同体所采用的“欧洲货币单位”以及我国解放初期实行的折实单位都属于指数单位。由此可见，通过综合物价指数来反映和矫正币值，从而控制通货贬值，达到稳定通货的最终目标具有现实的可行性。

2. 控制系统与受控系统

货币系统的构成除了信息系统之外，还包括了控制子系统和受控子系统。信息系统通过信息传输通道，将货币需求的反馈控制变量输出给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根据反馈的信息，变动控制变量 ΔB 和调节变量 K ，使受控系统的输出 $X(t)$ 只在货币政策的目标值范围内变化。

(1) 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的功能是根据信息系统所给予的反馈信息，调控货币供给总量，达到稳定币值、稳定物价的目的。

根据前述的货币需求模型可知，在一个短期静态的时段中，受控系统的输入向量为 $Y = M_0$ 。

$(F \cdot \frac{P_0 Q_1}{P_1 Q_0} - 1)$ 。但当系统由短期静态向长期

动态演化时，就产生了系统的反馈控制变量 ΔY ， ΔY 表现为货币需求的增量。所以货币的需求量从一个连续的过程来看，就包括了 $(Y + \Delta Y)$ 。在这种情况下，控制系统的功能就是通过变动中央银行的贷款增量 ΔB 和货币乘数 K ，使货币的供给量 Y' 等于货币需求量 $(Y + \Delta Y)$ 。用公式表示如下：

$$\begin{aligned} Y' &= Y + \Delta Y \quad (\text{其中 } \Delta Y = X_0 - X) \\ &= X \left(\frac{u}{u_0} - 1 \right) = X \left(\frac{u - u_0}{u_0} \right) = M_0 \left(\frac{u - u_0}{u_0} \right) \end{aligned}$$

具体展开为：

$$\begin{aligned} K \cdot \Delta B &= M_0 \left(F \cdot \frac{P_0 Q_1}{P_1 Q_0} - 1 \right) + M_0 \left(\frac{u - u_0}{u_0} \right) \\ &= M_0 \left[\left(F \cdot \frac{P_0 Q_1}{P_1 Q_0} - 1 \right) + \left(\frac{u - u_0}{u_0} \right) \right] \end{aligned}$$

此式表明，控制系统的功能就是通过操作调控机制 $K \cdot \Delta B$ ，使货币的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实际增长 $(F \cdot \frac{P_0 Q_1}{P_1 Q_0} - 1)$ 保持一致，达到币值变

化率($\frac{u-u_0}{u_0}$)为零的目的。

(2) 受控系统 受控系统的功能是把货币供给总量的输入状态 Y' 和 \tilde{Y} 转化为输出状态 X 。它最终决定了流通中实际的货币供给总量。

在受控系统中，货币供给的输入向量除了以上分析的中央银行可以直接调控的 Y' 以外，还有中央银行不可直接调控的流通领域对货币的容纳量 \tilde{Y} 。我们可以将 \tilde{Y} 看作是对货币系统有效调控的一种随机干扰向量，所以系统的输出状态 X 等于 Y' 减 \tilde{Y} ，用公式表示为： $X = Y' - \tilde{Y}$ 。

此式表明，流通中的货币供给总量不仅取决

于流通中货币的实际需要量，而且还要取决于流通中对货币的容纳量。流通中对货币的容纳量的变动主要取决于货币的容纳弹性。

从货币流通的角度来看，货币的容纳弹性具体表现为流通领域对货币流速的某种自动调节功能，即在物价基本稳定的条件下，通过改变货币的流通速度使货币的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保持自发的平衡。因此，在受控系统中，还要通过对流通领域货币容纳弹性大小的测度，适度地掌握货币投放量，及时调节货币流通。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经济系

责任编辑：谭湛明



“新三论”与对外开放

孔幼真

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这是著名科学家巴甫洛夫的一句名言。没有科学方法的发展，就没有现代科学的产生，没有社会的进步。现代科学方法论日新月异，继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之后，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又被人们称作“新三论”。“新三论”给人们增添了一种认识世界的崭新方法，它不仅对自然科学，而且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都起着重大的方法论作用。用它所提供的新的方法来认识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些问题，既有助于加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有助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前提下，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提供必要的参考。

—

比利时科学家普利高津认为宏观物理学能够区分为两种类型的结构：平衡结构和耗散结构。平衡结构是一个封闭性结构，它不进行任何能量或物质的交换就能维持。耗散结构是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性结构。它需要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才能维持。这就是说，一个非平衡系统要维持稳定有序，不是靠封闭，而是靠开放，靠不断地与外界的物质和能量交换。这个观点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是对事物的辩证运动的深刻揭示。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说明，社会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封闭系统向开放系统的变化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种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进步的社会形态，不可能在封闭中发展，它只有开放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吸取人类一切优秀成果，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前进、壮大、巩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它依然是一个开放系统，对外开放，取天下之长补己之短，才能争得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优势地位。

开放是个极其复杂的现象，人们对开放的认识也有一个复杂的、曲折的过程。因此开放所出现的新的矛盾，新的非平衡现象，是值得人们注意的。

首先在观念方面。我国是经历了长期的封闭系统结构的社会。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封建社会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解放后，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特别是由于某些国家对我们实行封锁政策，迫使我们不得不关起门来搞建设，因此，形成了一套适合于封闭系统的制度、体系，以及反映在人们头脑的封闭的观念、封闭的思维方式、

封闭的心理、习惯。那种排他性、狭隘性、僵化模式、绝对平均、平衡的心理随时随地会表现出来，而开放却冲击着这种陈旧的东西。这种冲击与反冲击，包括政治、经济、伦理道德、审美观、价值观以及恋爱、婚姻、家庭等方面，是非、褒贬极不一致，甚至于在某种情况下，还可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无序。

其次，在体制和规章制度方面。对外开放要求内外左右、纵向和横向的运行机制畅通。但是，原有的体制和规章制度有许多已不适应开放后的新情况，严重堵塞了运行机制的畅通。为此，必须改革或打破封闭结构的体制和规章制度。

第三，在知识结构方面。原有的知识结构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开放出现了新的复杂情况，许多原来熟悉的东西已变成历史，不熟悉的、生疏的事情层出不穷，许多不习惯的东西要去习惯它。这样，原有的知识结构、原有的经验和方法已远远不能适应了。在认识和处理新问题时，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失误。

第四，在生产发展规模、速度方面。开放引进科学技术，引进资金，一些企业采用先进技术，更新设备，改革管理制度，使生产规模扩大了，周转速度加快了。而有的企业仍在用老掉牙的设备，管理制度陈旧、混乱，生产上不去。不同企业、不同部门、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之间产生了新的不平衡，竞争更激烈了。

除此之外，开放，还会带进来一些资本主义的弊病、恶习、腐朽没落的思想等东西，成为某些领域内新的不稳定的因素。

开放后出现的观念、制度、知识、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非平衡现象，往往会引起人们对开放政策的重新审视和评价，这就是开放现实提出的新问题，需要作出正确的理论回答。否则，将会影响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而耗散结构理论关于非平衡是有序之源的观点，却给予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

一般说来，封闭结构是一个有序化的结构，但它是死的结构。而开放结构是活的有序化结构，是从无序转化为有序的结构。因此，开放会出现非平衡，从而产生无序。但这只是客观发展前进过程中出现的暂时的不平衡的表现，不是人为的破坏，制造混乱。同时，这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开放本身有力量促使无序通向有序。例如：生物与外界交换的物质和能量，不一定是生物机体所需要的，也不一定恰恰符合生物机体所需要的量。因此，会产生需要和不需要，多和少的矛盾，造成机体内部各器官、组织的不协调、不平衡，削弱机体系统内在的力。而使这种不协调转化为协调，不平衡转化为平衡，不是靠封闭，而是靠开放。通过开放加强机体自组织能力，来调节不协调，不平衡。理论的发展，科学的发展，是在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争论中进展的，不同观点之间争论愈充分，愈有利于科学、理论的发展。意见纷纭，各陈己见，似乎很不统一，但是，有不统一才有统一，有无序才有有序。如果只有一家之见，一言堂，一人说了算，看起来舆论一律，非常一致、有序，实质上却是死水一潭，压抑了不同思想，阻碍真理的发展，有时还会使真理变为谬误。

同样，开放引起人们观念、心理的变化，体制、规章制度的不适应，经济发展的不

平衡等等，这是前进发展道路上出现的非平衡，有非平衡才能暴露出事物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它说明旧的有序结构已经不适应新的情况，需要改造它、破坏它，建立新的有序结构。因此，非平衡和无序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非平衡是有序之源，通过非平衡、无序达到有序，没有非平衡、无序会阻塞通向新的有序之路。非平衡、无序暴露了客观存在的问题，揭示了解决问题的重点、方向，使人们有意识有目的地为新的有序作出探索和努力。

开放会促使非平衡、无序在新的基础上转化为有序。但是，正如一切事物的转化要有一定的条件一样，要实现非平衡、无序转化为有序也要求有一定的条件，即必须达到一定的开放量。只有当系统与外界进行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量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时，新的有序才能出现，也才能构成具有自适应、自组织、自调整的，并具有抗干扰能力的耗散结构，开放政策是靠人去执行和实现的，因此，还需要有主体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开放系统的这种自适应、自组织、自调整的能力，否则，非平衡不会自然而然地通向有序。

二

西德著名物理学家H·哈肯所创立的协同学理论研究了一个母系统中许多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协同论认为：协同性是系统的一个特征。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各个要素之间的协同作用，是非平衡到有序的桥梁，是系统自组织能力的表现。只有依靠不同质的部分、要素之间彼此联合、协同作用，才能从无序态走向有序态，并达到最优的效果。反之，一个大系统内部各个部分、要素都孤立存在，不协同、不联合，那末，这个大系统虽然是开放的，也无法从非平衡走向有序。以人体为例，它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由运动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循环系统等许多子系统构成，子系统又包括各个要素。人的生命就是依靠人体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协同作用，如果有某个环节发生障碍，就会影响或破坏这种协同作用，机体活动就不能正常进行，同时也影响人体与外界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至于社会，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各国的社会性质、社会制度、历史传统、科学技术、经济发展、文化思想观念以及风俗习惯是极不相同的。开放使联系、关系更加复杂化，可能出现更多的矛盾和不协调的因素，这样就必然提高协同的重要战略地位，使协同显得更加令人关注。对外开放要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存异求同，互相了解，互相联合和协调，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协同作用并借此推动和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它具体表现为：

第一，使信息输出和反馈流畅，信息量倍增。因为信息是协同的条件，要实现地区和地区、国与国之间的协同，就必须互相了解，互通信息。开放，缩小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加强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交往。过去由于交通运输不发达，信息传递工具落后，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交往合作很不方便。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消息传到英国国王要相隔半年时间。1865年美国总统一林肯被暗杀，过了3个月英国政府才知道。而1969年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地球表面上平安着落的消息不到2秒钟就传遍了全世界。可见，

信息成了一种财富，一种力量，封闭阻碍了信息的传递，延长了传递的时间，影响了速度。现代化经济离不开信息，信息是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战后，日本的经济速度所以比较快，这与他们实行对外开放，能以惊人的速度获得信息有关。据有关部门资料统计，在日本，50—60秒钟可以获得世界各地金融市场的行情，1—3分钟就可查询日本与世界各地进出口贸易的商品品种、规格等资料。

第二，互相竞争。协同不是绝对同一，而是从差别中求得协同。竞争把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固有的差异暴露出来，显示各个要素的优劣、长短，最后达到优胜劣败，取长补短，在新的基础上调节各个要素，发挥各个要素之间新的协同作用。因此，竞争是一种促协力，通过竞争能增强紧迫感、危机感，找到薄弱环节和突破口，进行自我调节，加强自组织能力。如果关起门来，坐井观天，就没有比较观念，甚至骄傲自满，夜郎自大，只能阻碍事物的发展。

第三，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互相补充、互相结合。科学是生产力，生产速度快慢，质量好坏，管理水平是否先进都离不开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能否善于合理地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速度快慢的关键。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世界性的，没有国界，任何一个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都是以往和当代世界科学技术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说：“某一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页）不开放，不交往，就不可能有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也就没有今天的生产规模。

对外开放，有了联系和交往，就能取各国之长补己之短，互相学习，实现技术、劳动力、资源、资金、市场等方面的互相补充，互相结合，发挥协同作用。协同是一个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科学问题。

三

突变是一种质变形式。法国数学家雷内·托姆创立的突变理论，运用拓扑学、奇点理论和结构稳定性等数学工具，研究自然界各种形态、结构的不连续的突然变化。我们认为，这种不连续的突变在开放问题上也有存在的可能性。因为一方面我们虽然确立了对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要长期地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旧的封闭的传统观念，政治体制上的不健全以及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对开放对策是一个干扰和阻力。因此，从封闭系统到开放系统的转折是一个复杂艰巨的过程，如果不注意，不着手解决存在的干扰和阻力，在某种条件、某些领域内可能会出现从开放到封闭回归的突变。再从开放的具体效益上也存在着由有用向无用、由好向坏、由利向害的突变的现实可能性。例如：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改造国内落后的技术设备，可以少走别人已走过的弯路，达到迅速改变企业面貌，增加生产，发展经济的目的。但是，引进的先进技术设备并不一定都能达到同一个效果。有的设备引进来由于国内技术、物质条件不成熟，无法使用，就只能搁置一边睡大觉，有用变为无用。有的盲目引进，数量过多，结果又

变成排挤国内产品，阻碍国内技术、国内产品的进步和发展。可见，研究开放前进中的突变，防止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前进发展的突变，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课题。

为了控制事物的突变，突变理论还提出了分析控制因子和反应因子的关系问题，并运用数学模型描述了控制因子和反应因子的不同关系，描述了现象如何在控制因子控制下进行突变的过程。突变理论认为，一个现象可能有多种控制因子，而决定事物突变的是其中控制值最大的因子。例如一只狗的突然进攻和突然逃跑是受发怒和恐惧这两个相互矛盾的因素控制的，当恐惧因子的值超过其发怒因子值时，它可以突然中止进攻而逃走。运用突变理论的数学模型对开放中突变的可能性进行一一精确的描述，有助于我们预测开放的发展变化，并制定出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突变理论尤其强调要注意分析临界点附近控制因子的变化，这点对我们控制和防止开放中突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开放中的一系列事物都要分析这些临界点上的控制因子，对象、条件、数量等等都必须科学对待。因为临界点是事物的转化点，在这个点上某个控制因子的微小变化，往往会引起系统的突然跳跃式的质变。在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关系中，为了使这种交换健康地进行下去，就要分析研究这种交换关系能够维持稳定状态的阈值，在什么情况下会超出临界阈使稳定态走向不稳定态。

可见，突变理论对于我们避免和防止开放中的突变，科学预测事物发展变化趋势，促使现象向良好的方向转化，取得开放的最佳效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上海社科院哲学所

责任编辑：冯达才



《辞源》疏漏一例

欧阳世昌

《辞源》第二册第1526页“东牀（床）”条，在引用唐代刘长卿诗句及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中的句子之后云：“参见‘坦腹①’。”但翻开第一册第598页“坦腹”条，其第一词义却无“东床”之语。原来此条在引《世说新语·雅量》时遗漏了几个字：“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坦腹卧如不闻。”后一句应是“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脱漏了“在东床上”四个字，即与“参见‘坦腹①’”之句有隔碍，使人未明所以。

又《辞源》第三册第2225页“矜持”条所引《世说新语·雅量》同一例句，亦脱漏了“在东床上”四个字，且“咸自矜持”的“咸”字，误植为“或”字。

“书海酌蠡”责任编辑 刘斯翰

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哲学的特点

吴熙钊

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特殊的社会形态中，作为资产阶级哲学的特点表现在哪些方面？这是近几年来讨论中国资产阶级哲学所要探索的重大问题。我认为，从中西哲学之比较这一方法论为出发点，中国资产阶级哲学从根本上是“合中外古今”文化而熔成自己的思想体。^①维新运动是这种哲学的起点，它既不是古代经学的继续和推演，也不是外国哲学的抄袭，而是中西文化的交汇，既具有世界资产阶级哲学的一般共同点，又显示了具有中华民族形式而包含着新的内容的特殊性。这就是延续性和突破性的统一。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试作论述。

一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哲学的第一个特点，就在于对传统经学的研究方式迅速扬弃，启开了以西方的实验科学、逻辑推演和经验主义的广泛运用，为社会变革和哲学变革提供了新方法论。

如果说，传统古典哲学的研究，可以就本国的社会历史资料为主要依据，那么，鸦片战争以后，这种研究方法再也不可能继续下去了。先进的中国思想家通过了中西交往和中西文化对比，认识到必须摆脱经学的束缚，采取新的研究方法去探讨自然和社会现象。自汉代经学开创了经学这一特殊学术形式，经学便支配着各类文化领域，“通经”、“明经”则成为读书人的主要研究方法以及攀登科举功名的途径。这样，自然科学被纳入了经学体系，实验科学几乎被窒息，民主思想更无法从经学中产生。所以，经学的研究方法到了近代已成为学术进步的沉重包袱。要求打破“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学术一统思想，^②已成为时代学术解放的呼声。

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西学东渐，资产阶级的代表们，重燃起中断了一百多年的中西文化交汇之火炬，对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技术、哲学历史和民主制度怀着狂热的心情而加以追求，以期从中吸取改造社会的方法。自从19世纪60年以后，西学的传播主要通过了二条渠道。一、通过西方传教士来华宣传宗教时附带介绍一些粗浅的算学、测量、汽机、天文、物理、化学、考古等科技常识。据统计，至1896年，外国传教所译西书已达829种，对近代我国文化思想起过积极影响。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一书的出版，之所以能掀起热潮，正是受上述西学影响而形成自己特色的一部著作。二、通过先进的知识分

子接触西学，直接传播新的科学成就和政治学说，并同我国传统的范畴结合，形成一种创造性的中西文化揉合而熔铸为自己的思想体。这一点，严复作出了新的尝试。严复被派遣到英国留学，本来是学习海军的。但是在民族危亡的历史条件下，他受到当时科学最新成果的影响，如三大发现——生物进化论、细胞学说和能量守恒及转化定律的影响，以及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哲学的经验和逻辑推演的方法及乃至社会的民权学说等，从而使他抛弃了当时所流行的“中体西用”、“变器不变道”的思想方法，提出了“体用一致”的新的研究方法。他说：“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⑤严复这种方法论之所以具有创新之特点，是由于他敏锐地通过了中西文化之比较而作出的，学习“西学”必须“体用一致”，从而宣告了19世纪末期“中体西用”说的破产，这对于近代中国哲学的变革有重大的意义。

严复以实证科学的方法，自觉地介绍和传播《天演论》的进化思想。他颇有创造性地写了结合现实爱国图存的论文，即《原强》、《世变之急》、《辟韩》和《救亡决论》等，克服了实证主义的无视人的作用和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永恒不变的错误观点。严复又以经验论批判传统哲学的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他采纳了英国的经验论者洛克的“白板说”，揭露了宋明最大的唯心主义者陆、王“心学”的实质是“皆洛克、穆勒之说所异”，^④即属于一种“阿普黎阿黎”的先验论。^⑤运用洛克的经验论批判唯心主义先验论，这无疑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哲学之创举。此外，严复还运用逻辑的方法，提出从实际经验出发，通过“内籀”（归纳）方法，考察许多特殊事例而归纳为一般公理；又通过“外籀”（演绎）方法，依据已知与公理推演各种特殊事例，从而有力地批判了唯心主义先验论。严复以新的方法论，对“旧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他指出“旧学”的三个代表——宋学、考据学、辞章之学的方法都是“无实”的；而“无实”必然“无用”，更对于国计民生“无补”。故此只有采取“翔实”之西学，代替“无用”之旧学。^⑥同时对那些死抱“朱注”经义，思想僵化的卫道者作如下的揭露，“以钱财为上帝，以子孙为灵魂，生为能语之马牛，死作后人之僵石。”^⑦可见，严复提倡“西学”的方法论，对当时知识界破除长期经学的束缚起了革新之作用。

维新派的康有为虽然在公开的论述中，仍然采取经学的形式，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以及《论语注》、《中庸注》、《孟子微》、《礼运注》等。但是他的思想方法，同样吸取了西方的“实测”方法，即自然科学的几何推理方法。以“实测”阐发“实理”、“公理”，批判“虚理”、“私理”。他在“万木草堂”讲学期间所写的《实理公法全书》、《康子内外篇》和《南海康先生口说》（或《万木草堂口说》）以及《日本变政考》等，均采取新的方法，以补其经学形式的思想方法之缺陷。

杰出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更是彻底抛弃了经学的论述方法，明确地提出只能采取“观察和实验的方法”来认识自然和社会的问题。^⑧《孙文学说》是孙中山综合了当时自然科学实验的成果，吸收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康德的星云说、拉普拉斯的星气说、微耳和和圭哇里的细胞学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学说，从而形成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并建立

了反映生产斗争、科学实践和政治斗争经验的“真知”学说，把我国唯物主义推进一步。孙中山把反映人类知识成果和进步要求的各种科学知识，用哲学的方法给予综合概括，表明了他已开始突破19世纪就科学的分类而依据单一学科谈物质运动的局限。而这种综合的新的方法论的形成，从根本上突破了古代的知识分类，即刘歆的《七略》——六艺、诸子、兵书、诗赋、术数、方技和置以卷首的学术源流的综述。这就有助于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深化。

可见，每一时代新的方法的形成，是受着社会各种条件的制约的，而它一旦被采纳和应用，就有助于哲学的变革。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哲学的变革与思想方法的改变有密切的联系。这表明科学知识越多及能作为一种方法论而加以运用，又将有助于人们提高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所以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关于实证科学、逻辑、经验等方法广泛被采用，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上述方法，即使认为是形而上学，但在历史上也是一种进步的方法。

二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哲学的第二个特点，就在于把近代自然科学引入哲学本体论，突破了古典哲学的朴素性，形成了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这是近代资产阶级哲学诸特点中的重要一点。

反映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变革的起点的康有为哲学，既吸取了近代自然科学提供的论据，形成包含“以太”——“星云”说的唯物主义思想，但又以“以太”解释“仁”，形成“以太”——“电”——不忍之心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康有为接受了牛顿力学运动学说来解释宇宙运动是由于“吸拒力”的作用。同时又吸取康德的星云说阐述物质运动。他说：“其道以元为体，以阴阳为用，理皆有阴阳，则气有冷热，力之有拒吸，质之有凝流，形之有方圆，光之有白黑，声之有光浊，体之有雌雄，神之有魂魄，以此八统物之理焉。”^⑨但是，这种吸拒力是以康德的星云旋转运动为借鉴，他说：“德之韩图（康德），法之立拉士（拉普拉斯）发星云之说，谓各天体创或之前，是朦之瓦斯体，浮游于宇宙之间，其分子相引集，是谓星云。”^⑩这里，康有为认为宇宙的运动是通了吸拒力的引集，即所谓“磨励”之作而形成的，带着明显的唯物主义观点。这一观点的形成，正是康有为以“星云”释“气”，阐发“积气而成为天”。^⑪可见，康有为虽未形成完整的机械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但包含着若干机械唯物论的思想因素。表明了康氏在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增添了近代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内容，因此我们把这种哲学作为近代中国哲学变革的起点。

然而，康有为由于用自然科学释“仁”，形成了所谓“不忍之心”决定一切的唯心主义思想。故从康有为哲学的体系进行总体的考察，便可以看出，既反映了近代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新因素，也反映了近代中国哲学形态进步的起点，但又保留着传统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这种矛盾体系，正是未成熟的资产阶级的特点在哲学上的反映。然而，无论

其体系的矛盾，唯物主义不占优势，反映近代自然科学成果而注入哲学本体中，则是近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新趋向。

严复的哲学，更能反映近代资产阶级哲学中的唯物主义部分的特点。他接受进化论中牛顿力学、康德——拉普拉斯星云说，提出了著名的“以太”——“一清之气”的宇宙观。他认为，“曰局太始，乃为星气”，^⑧而“最清之气名伊脱。”^⑨这实质是认为世界是物质性和物质运动性。而物质运动的动因是什么？严复既用力学的理论的机械原因来阐述“大字之内，质力相推。”^⑩又以进化论的观点说明“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⑪所以严复的哲学思想，从宇宙观来看，包含着明显的机械唯物论特色，但又不完全等同于18世纪几乎没有辩证法的机械唯物主义，包含着进化发展的观念。

孙中山的哲学指导思想方法，基本上运用了自然科学的知识来论述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发展，代表了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哲学的最新成果，也是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变革的完成形态。这个哲学的特点就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以进化论为线索。孙中山的“以太”——“星云”说，既以“以太”——星云阐述了世界的物质性和物质的运动性；又以进化的观点阐述宇宙的不断运动。他还强调说，进化之规律，不仅是一种“自然力”之进化，也包含着人力的作用。而“人力”又包括了“政治力”和“经济力”。这两种力量关系到民族的兴亡，比天然力还大。^⑫强调在一定条件下社会进化的“政治力”和“经济力”胜过“自然力”，人事可以能胜自然，乃至可以改造社会。表现了孙中山的哲学不完全是象18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形态，而是在这个基础上综合了进化发展的观念，形成中国近代哲学的独特形态，即从物质观来说，基本上是以个别的物质作为哲学的依据，摆脱不了旧唯物主义的机械性；但又强调进化、发展、变化的观念，在克服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迈开了新的步伐。

三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哲学的第三个特点，就在于紧密联系政治和社会的实际，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西欧资产阶级的哲学较为注重自然观，故逻辑和思辩哲学特别发达，而中国近代哲学，由于社会处于急剧变革，加上资本主义发展不成熟，自然科学相对落后，故近代中国哲学较为注重政治与社会实际。所以它一开始形成就缺乏严谨的思辩哲学，自然科学成为政治和社会伦理道德范畴的注解。这固然是一个缺点，但它正反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

中国社会向何处去？这是摆在革命者或社会改革者面前的急切使命。哲学不仅为了说明世界，更主要是为了改造世界。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们，当他们进行暴风骤雨式的斗争时，就意识到必须“将振兴中华之责任，置于自身之肩上。”^⑬自然科学的哲学在他们的心目中不外为了政治变革需要的理论依据。所以他们不大可能走西欧学者从事于专门思辩哲学的探索，而把自己的哲学称之为“人学”。^⑭把“人学”作为哲学，实际上是通过

深索“人”在哲学史上的地位，阐发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运动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通过了“民权”的宣传为资产阶级反封建而呐喊。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期间，虽然向学生灌输有关“声、光化、电等科学著述数十种”科学知识，^⑩但更为主要的是对学生进行“时务”教育，为造就和培养支持变法的一代新人。据他的学生回忆，康有为期望通过“广罗英才而教育之，求广大之思想脱前人之巢臼，开独得之新理，寻一贯之真谛。”^⑪这种重视“人”的作用，决定了康氏在讲学期间，反复通过对中外古今人性问题的评议，阐发新的人性论。他在《长兴学记》、《实理公法全书》和亲自口授的《南海康先生口说》中，提出了平等的人性论。

康有为首先通过对我国历史上人性问题的评议，对宋儒们禁锢人性发展的先验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宋儒所谓“义理之性”，实质上是“以佛释儒书”。^⑫这就针对着宋儒在封建道德之“三纲”作为永恒不变之人性而发的。其次，康有为修正了荀、孟关于人性论的片面性观点。他指出无论荀子的性恶说和孟子的性善说都是有缺点的。在他看来，如果按荀子的性本恶说，那么“天下无善人”；如果按孟子的性本善说，那么“天下无恶人”。因此“两论皆有缺点”。^⑬康有为强调，人性是自然的，善恶是“伪”的，即人为的。他说：“（人性）乃生之质也，本为确确。”^⑭强调人性的可塑性，实质上是启发他的学生们要正确认识自己在改革社会中把自己铸造成“思想脱前人巢臼”之新人新思想，以便在时代激流中发挥作用。再次，康氏的人性论，是建立在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博爱哲学基础上。他采取了几何公理的推演方法，论证了“人有自主之权”是符合公理的。他说：“人生有欲，天之性也。”^⑮这又是对宋儒“存理灭欲”的禁锢人们正当物质要求的批判。所以康氏大谈“民功”，以“人类之美，人类之乐”为民主基本要求。^⑯

康有为上述人性论的特点不是抽象地谈论人性问题，而是通过了阐发人性的平等，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初步民权呐喊。在维新变法期间，康氏一再抒发：“从知天下为公产，应合民权救我疆”^⑰的理想。受过他的思想启蒙的梁启超也作诗自励：“献身合作万矢的，著论肯为万世师；誓起民权移旧移，更研哲理牖新知”。^⑱可见，以人性平等而推论民权平等这是康有为人性论之实质。这里，不仅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人的正当权利而呐喊；更表现在于通过宣扬“民权”而“救我疆”。包含了为维护民族尊严的正当权利的斗争宣言。严复把“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作为维新的奋斗目标，^⑲充分地表现他们把实践“身贵自由，国贵自主”这神圣使命作为自己的天责的气概。^⑳值得注意的是，严复采取了中西政治制度对比的方法，揭示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长期的封建统治，“自由”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最为惧怕的两个字。他说：“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㉑故当严复思想处于进步的阶段时，曾给尊君论无情的谴责。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国“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亲”；而西方则“以公治而贵自由”，^㉒封建专制制度从来是“侵人自由”；而“侵人自由”就是“逆天理，贼人道”。而韩愈却把“窃国大盗”尊之为“天之意，道之原”，^㉓这完全是一种颠倒君民的关系。所以他写了著名的《辟韩》，以民主思想批判尊君思想，

引起整个学术界的震动。

以“天赋人权，平等独立”的人权学说对封建三纲的批判，其主导思想是资产阶级的博爱、自由、平等的人本主义思想。尽管资产阶级从抽象的原则出发，但处于上升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关于人的价值涵义，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抽象原则，但他们处在封建禁锢的历史条件，强调“人权”是为了对“三纲”这一理论而发的，涉及到关于人的价值的内涵应该是为振兴中华，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奉献。孙中山的“民权”思想充分表现了这一点。首先，孙中山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①在民主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孙中山所指的人民，其内容较之古代更为广泛，即他所说的，“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的“多民族统一”的资产阶级祖国。其次，孙中山所指的人，尽管包含着某些“互助”的抽象原则，但他强调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并不是为个人追求物质利益，升官发财，当大小帝王，而应为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而奋斗。他所设想的文明祖国，包含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是指发展近代的生产力，精神文明是指以科学批判宗教，以民主代替专制，以个人的牺牲来维新民族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由此，我们必须善于区分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对于人在社会中的价值的涵义与西方资产阶级当代关于人道主义的界限。前者是处于上升时期的真诚的、战斗的民主主义关于人民的同情；后者是伪虚的说教。实践证明，我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不少人有着为人民利益而献身的精神，正是他们对于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并非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这诚如孙中山所说，以“救国救民为目的”，肩负起“救国救民之责任”，^②“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于自己肩上”。^③“为国效死，死重于泰山”。^④司马迁关于“死有重于泰山”的格言，和革命不为私人谋利益，在孙中山及其一批战友的实践中获得了充分证明。由此可见，近代的中国哲学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特点，是近代人民反帝反封建这一历史使命所决定的。哲学的变革无不表现为政治变革的先导。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和形式。近代中国哲学是在中国这块土地孕育形成的，它当然不可能同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表现同一模式。因此，我们就不能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模式为标准而贬低中国资产阶级在理论思维的创造。

实践证明，中国资产阶级通过了中西文化交汇而形成具有民族形式的上述哲学诸特点，无疑是创造了高于我国古代哲学的形式和内容，从康有为到孙中山的哲学，均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上述特点。

① <南海康先生口说·孔子改制>。

② 朱彝尊：<曝书亭集·道传录序>。

③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

- ④ 严复：《穆勒名学》部丙三篇夹注。
- ⑤ 同上，部乙篇四按语。
- ⑥ 严复：《救亡决论》。
- ⑦ 严复：《道学外传》。
- ⑧ 《国民要以人格救国》，见《总理全集》第二集，第290页。
- ⑨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17页。
- ⑩ 康有为：《诸天讲》卷二。
- ⑪ 《康子内外篇·理气篇》。
- ⑫ 《天演论·广义按语》。
- ⑬ 《天演论·真幻按语》。
- ⑭ 译《天演论》自序。
- ⑮ 《天演论·察变按语》。
- ⑯ 《民族主义》第二讲，《孙中山选集》第630—631页。
- ⑰⑱⑳ 《在东京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83页。
- ㉑ 谭嗣同：《仁学》。
- ㉒ 梁启勋：《万木草堂》回忆，《文史资料》第25期。
- ㉓ 张篁溪：《万木草堂始末记》。
- ㉔⑳ 《南海康先生口说·中庸》。
- ㉕㉖ 《南海康先生口说·荀子》。
- ㉗ 康有为：《民功篇》。
- ㉘ 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第242页。
- ㉙ 梁启超：《自励》。
- ㉚⑳㉛ 《原强》。
- ㉜ 严复：《论世变之亟》。
- ㉝ 严复：《辟韩》。
- ㉞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见《孙中山选集》第90页。
- ㉟ 《军人精神教育》，见《孙中山全集》第六集，第29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冯达才

编者按：本刊从1988年第一期开始，开辟“港澳台学者之窗”专栏。本期摘要转载台湾已故学者徐高阮先生的《戊戌后的康有为》一文（原载台湾《大陆杂志》第四十二卷第七期）。我们希望，随着条件的不断成熟，海峡两岸学者之间能早日架起直接进行学术交流、合作的桥梁。

戊戌后的康有为

——思想的研究大纲

〔台湾〕徐高阮遗著

一 序 说

康有为早期的一个乌托邦社会主义理想，他对于传统儒家经典的一大部分之真实性的大胆怀疑与判断，他对于孔子精神的一种革命性的解释，都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不能省略的题目。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百日维新当然与有为的名字是分不开的。流亡以后的有为成了保皇的领袖，入民国后他还保持他旧有的立孔教的主张，一次失败的复辟中他是主谋一分子，都是明白的历史事实。

但是有为还有他生前和身后大不受人理会的方面。他在戊戌后的长期海外生活里还为中国的再造作了新的建设性的思想，尝试拟定了他在维新运动中还不能设想的成系统的计划。他这些计划是为他心目中的立宪或虚君制的帝国预备的，然而他在辛亥革命后也曾郑重对国人陈说他宿备的种种意见，只在局部上略加变动，作为革固新建的民国的必要方法。他虽然在看到民国的破裂时枉作了一个失败的复辟的主谋一分子，但在这悲剧性的一幕之后他还热心再提出他的建设性的救国理论，那在他看来是民国必须采取的。有为的这一切思考和计划，他的一切说明这些思考和计划的努力，在当时和以后十年来都简直得

不到一般人的理会。这一切事实在当代人的心里仿佛连一点影子也不存在。

有为戊戌后的七年（光绪三十年，1904）已有了一整套的关于中国改造的新意见，这套意见的中心要点就是断言中国改造的真正关键在于“物质”建设——就是一个迅速的、高度的、全面的工业化。但有为的这套意见当时就受了他的亲密的学生和同志梁启超的轻视与怀疑。十几年后（民国8年，1919）有为重提他的“物质救国”的理论，而梁在同时则发表他的对物质文明失望的论调。民国16年（1927）上半年梁先后为他的先生作70岁寿序与公祭文，都只肯定有为领导戊戌维新的地位，绝不提他后期的建设性思考。这正表示梁对有为的后期思想始终完全没有理会，也没有同情，甚至于取了完全抹杀的态度。

梁启超对有为后期思想的这种态度又标示出同时的一般知识分子的态度。与梁同样有历史癖的胡适在有为死后几年替美国“社会科学大辞书”写“康有为”一题，也只写有为的领导戊戌维新，写他的大同学说与新学伪经考，没有一个字说到有为戊戌后的思想。胡适在晚年承认他曾误信有为自己所说28岁以后，即成立大同学说以后，思想没有再进步。但他在替社会科学大辞书写稿时

的态度还可以代表当时一般知识分子对有为后期思想全不理会的态度。

与有为同时而在思想上与后期的有为能够相通的人只有一个。这就是通常说来在政治上站在有为正相反的一端的孙中山。中山与后期的有为关于中国改造的思考的范围几乎相等。他们两个可以说考虑到相同的几个基本问题，而且他们思考的方法也十分相近，只是有些地方中山的思考更有深度，有些问题在有为还不能解决的中山可以说在理论上已经解决。然而也有些地方有为想得更细，作了更多的说明。这两个通常说来政治立场正相反的人在精神上的可以相通也许是够人惊异的。把有为后期的思想与中山的思想对照起来，可以使两人的思想的相通之处以及各自的特色都显现得更清楚。

有为的后期思想包括了一种历史见解，就是关于中国文明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差别的历史解释。有为的这种历史见解与中山的历史见解也是相通的。而作为历史家的胡适，尽管他也曾几乎抹杀了有为的后期思想，却与有为对于中西文明的差别提出了可以说是几乎完全一致的解释。因此有为与孙中山及胡适可以说还有一种共同的历史见解。这是胡适晚年有机会亲自承认的。

二 有为的海外观察与新思考

有为在戊戌时期关于中国改造的主张只是一个“变”字，只是尽量模仿西方国家的“变”，不能说有真正具体的计划。他在戊戌后的思考可以说才深入而具体，有了很大的进展。这就得力于他长期流亡中在许多国家的广泛的观察。但有为不是单纯靠旅行与观察，他还靠他的不平凡思考力。他在所到的国家往往得到特别的启发；他又比较不同的国家而得到启发；他又因启发而能够深深思考。

自戊戌出亡到民国3年（1914）归国，有为在外共16年。他在维新失败后就经香港到日本，第二年（1899，光绪二十五年）到加拿大，由加拿大到英国，又由英重经加拿大回到日本。光绪二十六、七年在加拿大、槟榔屿；二十八、九两年在印度。光绪三十年（1904），他从香港开始一次往西的旅行，经过了阿拉伯、埃及，访问了意大利、法国、瑞士、奥地利、匈牙利、丹麦、瑞典、比利时、荷兰、德国、英国；然后由欧洲重到加拿大。第二年他由加拿大到美国，在落山矶

小住，年内游览全美。

光绪三十二年他又从美洲赴欧洲，在瑞典、法、德等国畅游，然后仍回美。三十一年、三十三年他曾访问中、南美。三十四年，他离美到欧，经北欧及法、德、奥、匈等国，访问了东欧的塞尔维亚、布加利亚、希腊、土耳其，然后回到东方；以后二三年间在槟榔屿、香港、新加坡；辛亥年（1911）到日本，住到民国3年回国。

有为自己十分重视他在各国的视察。光绪三十二年他写欧洲十一国游记序，感谢新世界的交通工具使他能够遍游大地，吸取近百年欧、美的新文明，并且采取许多国家不同的成就，“考其性质色味，别其良楛，察其宜否”，为中国求得再造的“神方大药”。

光绪二十八、九年在印度的长住使有为深思印度灭亡的原因。他觉察到莫兀儿统治末期印度各省独立而个别被英国吞并，最后导致全国被吞并，因而感到国家一统的重要。他又注意到印度人极端崇重宗教的道德而不讲求物质的力量，因而不能抵抗侵略；这是使他开始用力思考物质建设的一个因素。戊戌后散在海外的保皇党人对清廷的态度渐渐趋向于激烈，有为也曾支持唐才常在内地那次失败的起事（光绪二十五年，1899）。后来反满的革命运动抬头，保皇派也有各省自立的主张，梁启超也是其中一人。有为则在光绪二十八年从印度寄信给梁，以印度各省独立而终于灭亡为证，极力驳斥“自立”。这个后来称作“壬寅政见书”或“印度政见书”的文件对当时唱“自立”的保皇分子发生了警戒的作用。但是有为后两年主张用一统国家的全力讲求物质建设，则得不到他的同志们的理会。

光绪三十年四月从香港出发向西，经西欧11个国家，大约在第二年初到达美国西岸的旅行，是有为的十几年海外生活中观察最丰富，思考最有收获的一段。有为的后期思想的纲领可以说是在这八、九个月的游途中形成的。

有为所到的第一个西欧国家是意大利。他的“意大利游记”写他的观察和新思考十分生动详细。他在所到的第一个大城奈波里就看到了贫困。他从当地旅游公司人员的不诚实，从他的译员在旅舍中的被窃，从他自己所见旅舍管事妇人的形色，从一个英国商人与他后来雇用的一个西籍仆人的经验谈，知道了意人“至贫多诈，而盗贼多有”，“行客过此不可不慎，与（中国）内地风俗

略相近而甚。”(意大利游记,下同)他在游大山时又遇到“乞儿数十,追随里许,此与印度无异”。然而这些又不是意国一个城市的现象,而是西方国家都不免的现象。因此他感觉到西方称为新文明的国家并不是完善的、够理想的国家:“……此皆吾所亲见者。苦其褴褛之情,颠连之状,各国所同有,又不止奈波里也。未游欧洲者,想见其地若皆琼楼玉宇,视其人若神仙、才贤,岂知其垢秽不治,诈盗徧野若此哉?故谓百闻不如一见也。吾昔尝游欧、美至伦敦,已觉所见远不若平日读书时之梦想神游,为之失望。今来意甫登岸,而更爽然。”

但有为并不是因此而断然轻视西方的国家。他是在看出西方国家的不完善、不够理想,看出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相似的不良风俗之后,将要进而探察西方国家的真正长处究竟是什么,以及东西文明的差别究竟是什么。

有为是对于艺术有会心的人。他对于西方各国王家的与宗教的名建筑,对于各大城市的博物院的收藏,都特别细心观察记录。他在罗马和巴黎各博物院中的古物、绘画最留心,而对于拉飞尔的画尤其倾倒。他的“意大利游记”中说对罗马几处画院“日览之而心醉”,在几家大书店也“无不心醉”,而“每入画院,辄于拉飞尔画为流连焉,以其生香韵有独绝者……清水照芙蓉,乃天授非人力也。”但有为绝不仅是这样流连赞叹。他在观察和欣赏中注意到了西欧的艺术以及物质制品的精湛是近代突起的事。“徧观各国博物院皆于十二、三世纪后乃有精巧之物”(《法兰西游记》注七)。欧洲绘画的大进步则只在近四、五百年。“拉飞尔与明之文征明、董其昌为同时……若以宋、元名家之画比之欧人拉飞尔未出之前画家,则我中国有过之无不及。”只是有为更承认,近四、五百年来欧洲的画“求真,我则不求真,”“宋、元写真之画反失”,“以此相反,而我遂退化。”

有为在鉴赏中看到了欧洲文明在近代的突起,于是领会了历史书中所说的欧洲因十字军战争输入东方文明才有文艺复兴。这也就是得了文明移植的观念:文明种种因素是由具体的种种历史条件在一定地域造成的;这些因素,单个的或相连的,又可以赖种种具体的历史条件而传入另外的地域,促成新的文明。有为在法兰西游记中“法国创兴沿革”部分叙法王路易第九的三次十字

军,特别总论十字军开启近代欧洲文明的功绩。这也就表示出有为对文明移植的领会。

“阿刺伯自摩河末后文明大启,久与中国、印度交通,收集其华实,天文、地舆、物质、算学皆分设科于学校甚盛。十字军屡起,乃大转输其学术、物巧以入于欧,玻璃亦自是入,筑室法亦得而效法之,画理、词诗皆有感益。索格底、柏拉多、亚里士多图之哲学书亦自是得译本以复还欧,哲学乃渐启”。

“故九次无功,而东方文明皆赖十字军多次以输入,欧土文明曙光实自是启。今徧观欧土各国博物院皆于十二、三世纪后乃有精巧之物,可以观欧人进化之序。而今者欧人以制造物质之精横掩大地,熟知其原因则十字军之屡败启之?天下之得失进退困难言哉?”

文明移植在有为不只是一个历史的题目。这个历史的看法使有为看出一个民族尽有采取外国文明一种或多种因素的具体机会,一个一时或长期落后的文明尽有赖采取外国因素而突起猛进,后来居上的机会。欧洲在十二、三世纪以后才有“精巧之物”,而终于“以制造、物质之精横掩大地”,就是赖文明移植而后来居上的实例。

有为在“意大利游记”中写光绪三十年四月他从埃及渡地中海往西欧,他乘的船曾在希腊岛间穿行,使他领略了那个古国“群岛延回,峰峦秀耸”的地貌和“四面临海,舟船四达”的形势,因而认识古希腊的贵族议政制度的产生乃是具体的地理条件使然。多岛多山使希腊小邦分立而难统一。希腊东、南两方都是文明古国,希腊人有通商游学的便利,因此财富与知识发达。国小而“智民富族”,这就是产生议院的条件。有为在意大利凭吊罗马元老院的遗迹,追想到罗马原来也只是海边一城之地,元老院也只是罗马都中贵族代表组成。因此有为领悟欧洲的“港岛榭榭,山岭错杂”,“易于分国而难于统一”是议会制度的源头起于欧洲的具体条件。

意大利游记的“元老旧址”条下的小题是“附论议院之制必发生于西不发生于中。”有为既看到小国分立是欧洲议院起源的条件,就自然看到中国平地辽阔,早成为广土众民的一统大国,是君权极尊而议院无从产生的条件。但有为并不因此得出中国不能行议会制度的推论。他的中、西议院

之有无受地形使然的想法正要否认中国人智力或思想天然不能行民权的议论，所以他对于中国移植议院制度的可能正有乐观的预期：

“（亚洲）以大国众民，君权久尊而坚定，无从诞生国会。惟欧洲南北两海，山岭丛杂，港汊繁多。罗马昔者仅辟地中海之海边，未启欧北之地，至欧北既启，则无有能统一者。故至今小国林立，而意大利，日耳曼中自由之市若匪尼士、汉堡之类时时存焉。既无英国，此（议院）根不灭，必有大生广生者矣。况有怪英者，延条顿部落军议之旧俗，伏流千年而发于三岛，又以三岛之国会旧俗伏流万里而起于美国，其反动力则刺触于法而大播于欧，遂为地球独一无二之新政体，岂非欧洲凭据南北两海，多岛港而分立国为之耶？故曰地形使然也。非中国人智之不及，而地势实限之也，不能为中国先民责也。……或以为中国先民责，不论时地形势而执一理以责人，妄也！及今移植而用之，人下种而我食之，岂不轻易乎？何必怵他人之我先哉？……中国苟移植之，则亦让欧人先获我百年耳，何伤乎？后起者胜也。”

但有为不是只有乐观的论调。他所说的移植也不是漫然的空谈。他因为注意到小国寡民是议院发生的条件，所以切实考虑到中国民权、宪政的实现必须以地方自治为基础，这是有为后期思想的一个重点。

有为在法国由巴黎到凡尔赛故宫，看到法京近郊人民稀少，茅屋卑陋，想到法国早称霸欧洲而“京邑不过卑陋如此”，因此觉悟欧洲各国繁华都只是“近百年骤长”的现象，是机器发明以来短时期内富力跃进的结果：

“……乃知欧土楼阁崇丽乃近百年骤长之俗，非欧土昔日所能然……则吾中国之卑陋亦不是异也。盖机器未行之世，人民生计之程度有所限，欲为壮丽而不可得也。故新世之生计享用，皆机器为之超擢，今机器过人力者略三十倍，人民生计之程度亦三十倍，可以此推之。甚矣物质关于人世之重要也！”（法兰西游记）

有为看到意大利明显的贫困，又看到法国的物质力不但不及早盛的英国，也大大不及新兴的德国。他在意大利游记中作了意国与英、德、法等国的生产力及生活程度的比较。意国的蒸汽力

只有英国的1/10，德国的1/6，法国的1/4，俄、澳的1/2；运货量是美国的1/20，英、德的1/10，法国的1/6，奥国的1/3；制造业是英国的1/5，德国的1/4，法的1/3，俄、奥的1/2。意国人民每人的入息比英、法都差一半，所以食用比各国减半或减三倍。意国的农产物总值约为法国的一半，人民的谷类消费也减半；肉类之品不足以养生，每人每年仅得肉27磅。人民因营养不足而死者比英国多38%。

他的法兰西游记则有更周详的法国与英、德两国生产力及生活程度的比较，包括了蒸汽力、铁路马力、汽船马力、锯解马力、矿产、铁路货运、汽船货运、牧畜、金工、革工、食品、衣服、棉布、织麻、织绒、铁路里程、汽船吨位、国债额、公债额、出生率、肉类消费、饮品消费、乳品消费、用品消费等。在生产力方面，除了酒类和丝业法国超过英、德，织麻、织绒德、法相等外，法国各项都远不如英国，也不及德国。法国的国债比英、德均多一倍，公债多于英国不到一倍，而比德国多十倍以上。出生率则法国低于英、德。肉类、饮品、乳品用品的消费则法国均低于英、德。

有为的实地考察，加上他从统计资料得到的知识，已使他认识物质——机器——在欧洲新文明中的地位。他已知道蒸汽力大小是一国富贫强弱的标记。他已知道物质力的大小决定一国人民的健康与生命。他可以说已了解什么是工业化。有为在光绪三十年对工业化的了解不但是当时国内一般泛然谈论西方之富强的人所不能有的，甚至于是后20年的中国所谓新知识分子还不能及的。

光绪三十年有为在西欧11国的旅行中使他得到最大感发的一程，是这年八月末（1904.9.24）到荷兰京城阿姆斯特丹附近的海口小镇山泵参观了17世纪俄国沙王彼得为学造船住过的一座旧屋。有为在戊戌年已用彼得“变政”作说动皇帝的种种题目之一，但他自己真正受了彼得的故事的感动还是在亲见了彼得住过的矮小敞陋的板屋，看了彼得的遗物和图像之后。不过他的感动又不仅是因为亲见了动人的历史遗迹，而是因为他西欧旅行中正一步步更注意各国的物质力量，所以彼得当年到西欧学造船和取得其他技艺知识的抱负在这个时候恰好会合他的心意。有为在戊戌时期已知道彼得“微服作隶，学船于荷、

英。”（《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注8）但似乎到了这山泵的小木屋才领略彼得在远游西欧及回国后的改革事业中的精神全凝骤在物质——工艺。意国的穷困使有为深思，法国的不如英、德使他警惕，法国的工商后来居上使他钦佩。而只有彼得以帝王之尊，从本身做起，尽全国力量振兴物质——首先学习一切关于物质的知识、技艺——的榜样使他得到激励。

光绪三十二年（1905）二月有为在美国写“物质救国论”就以在山泵的观感作引端的一章（彼得学船工）。这一章的结语也就是有为在第一次的西欧旅行中最重要的收获：

“彼得盖深知彼己之短长，极校国力之厚薄，乃知强弱之故，不在人民之多寡，土地之大小，而在物质、工艺之兴盛与否也。故徧观各国，有物质学者盛强，无物质学者衰微，是故彼得聚精会神，降志辱身，不憚劳辱，竭国力而为之，而即及身收其效也。俄本野蛮，政法皆无，所乏非独物质也。若中国则数千年之政法本身文明，所乏者独物质耳，若能如彼得之聚精会神，率一国之官民，注全力以师各国之长技，则中国自盛强，遥远过于俄彼得，又可断断也。”

有为凭吊意国的古迹，追溯罗马的历史，承认罗马帝国有两件事为中国所不如。一件是广阔的大道，一件是国家银行。有为因罗马史上的银行而觉悟中国几千年只将金银存在府库而不懂得设立银行，不知道取息和流通。他在罗马博物院见了一幅13世纪的威尼斯都市全景，留意到威尼斯因十字军东征所过而繁荣及开始铸金钱，开银行。他看到欧洲的小国如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城市如威尼斯、佛罗炼士、汉堡、不来梅的岁入，和用费浩大，都靠银行的运用得当。他在意大利留心到他们的公债过多与发钞过多，在法国则留心到现金银多而融通力小。他在巴黎和柏林等地都参观银行，看到规模的宏大。他在美国参观华盛顿的造纸币厂函费城的藏金银库，为所见造纸币及藏金银的数量之大感到震惊，因而领会藏金银不动与大量流通纸币的作用。他到纽约的股票交易所，懂得了资金尽量流通的方法和益处。他在东欧的新国布加利亚（光绪三十四年）也注意到工农和公共建设的兴起靠新开的银行的支持。这些观察的心得使有为深刻地感到理财的重要，更感到稳固的银行与健全的

纸币政策是理财的要点。

有为特别注意欧洲一些小国与小邦的繁盛。这些小国的繁盛使他渐渐推想欧、美许多国家富强的一个因素是行政的细密——做到一种“至纤至悉之治”。有为在辛亥前写“裁行省议”，在民国2年发表“废省论”，都说一个确立小单位的行政区的主张，都鼓吹这个“至纤至悉之治”的观念。几种材料合起来使有为得到这些观念：（一）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这样的小国只当中国的一府，但“政治之密，官吏之多”比中国一个行省不止千百倍；德国的小邦如萨逊、威玛也仿佛如也。（二）一些小国邦和较大的国的地方行政区都分划得细小。如荷兰分16州，比利时分9州，德国的百数十里的小邦也分几个州县。英、法、意等国大小不过当中国一省，高级地方行政区分作几十个。美国联邦的构成单位虽大，但他们的地方自治最发达。（三）富强的国家对殖民地的统治，如英国在南洋和香港，德国在胶州，都在数十里的弹丸之地设大官，设无数官职，设极细密的条理。

有为看出这“至纤至悉之治”的两个主要特色：（一）地方行政区域小，有地小易治的好处；（二）小的行政区域在国家的地位高，行政长官位秩高，设的官职繁多，种种设施的名义和标准也高，使人民的“才气知识”受“发扬蹈厉”而光美富贵。这又正好映照出中国的“疏阔之治”的两个特色：（一）中国的行省区域太大，长官（督抚）权重而无从作到细密的治理；（二）府县长官地位甚卑，属官太简，设施太省，因此人民的“才气知识”受“抑遏掩闭”而“幽苦困穷”。

于是有为主张中国废省、道，只存府、县。府县的长官地位都要提高。府长官的地位要近于巡抚；县长官要从旧时的七品提到四品至三品，属官也提高。这个主张是有为后期改造计划中的一个要点。

有为在美国曾长住并作广泛的旅行，看到最大的富力，他在美国西部看到物质力所造成的最迅速的开。但他认为欧、美各国中只有德国在一个短时期内从一切方面落后的地位进到一切方面在世界领先。他在光绪三十三年写的补德国游记序自称曾“九至柏林，四极其联邦，频贯穿其数十都邑。他赞美德国从三、四十年前的小国杂乱、百政不修骤然进到武备、政治、文学、医术、电学、工艺、商务、官宝、道路乃至音乐和

“邑野”(城市与乡村)都居世界第一,“飚举骤进,绝尘而奔,天下万国进化之骤且神未有若德国者”。

德国这样进步神速,有为推测理由之一是德国在宪政体制中有强大的君权。他又根据德国君权的例与墨西哥及美国总统权的例推论治权的强化是国际的竞争强烈时代的一种新政治的趋势。

“……以宪法之民权为体,而以英绝之君权为用,或亦国竞时一最新政体耶?自吾嘉、道50余年间,彼为君民争政之时也,又50余年,余波荡及全亚,近20余年威廉以英辟专制德、爹士以英辟专制墨,两国遂大治。若法为自由之太祖,败绩不振,乃至英为宪政之先师,亦瞠乎其后,或者自由太甚,则痿而难举耶?甚者美至平等,而近者麦坚尼、罗斯福二总统亦日收其权,崭崭起头角。岂非新式之治法又将出世耶?”

反对过分自由,注意政府的治权(不必是君权)的强化,也是有为在清末及入民国以后不变观念。

有为早就重视法国革命后80年政治不安定,他的法兰西游记用了大篇幅讲说这个教训。他在美洲十分注意中、南美许多个共和通见的军人争总统的祸乱。只有墨西哥的爹士在国家混乱中当选作总统,连任几乎近30年,造成中、南美国家不曾有的安定和进步,所以深得有为的钦佩。光绪三十三年夏季有为到墨西哥,曾谒见爹士,后来有诗记见他的事,更在补德国游记序里举他作宪政体制中用强力治国成功的一个实例。但爹士终于不能避免被武力骤逐(辛亥年,1911),墨西哥又回到爹士以前的混乱——为争总统而起的反覆变乱。因此有为更坚持他的共和国家不易得到政治安全的理论。

民国2年有为在国内发表“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表示了他竭力为民国谋政府地位安定的意思,但他承认他没有够好的贡献,同年内他发表“论中国难逃中南美之形势”,预言民国不能免于长期的混乱,后来他主谋复辟,本意是要用一个“虚君共和”代替“民主共和”,在理论上就是为了让中国避免中、南美式的争总统的变乱。

三 物质救国论大意

有为在光绪三十二年写的“物质救国论”是他以后一切关于中国改造的思考和计划的基础。这篇约3万字的论文,加上1篇短序,包含以下10

点基本见解:

(一)人的生存都不能离开形体;衣食居处是生存的必需条件。这些条件有了有余和不足,社会就有了贫富、贵贱、权势、利害,有了依仗和畏避、欲望和争夺,有了贪污、盗杀、机巧、变诈、压制、苦恼这些社会病状。中国人与欧、美各国的人的生存必需条件和种种社会病状在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欧洲是近代文明的发生之地,但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世界;欧洲的人情、风俗,事势“与中国全同合化而无有少异”。美国号称最富盛而且最好自由的国度,但美国的犯罪率甚高。社会的道德风俗优劣与物质文明的发达程度不是成正比的。中国有几千年的教化,所以社会的尊重仁让、孝弟、忠敬、气节,不重奢靡、淫佚、争竞,尽有胜过欧、美的地方,即令说不然也只能说中国与欧、美社会的风俗“互有短长”。中国的不如欧、美不是在道德方面,只在物质方面,只在近一二百年来的物质方面,只在近一二百年新发明的工艺和武器方面。欧洲人百年来“横绝大地”所靠的是工艺、武器,都是物质;工艺、武器所牵连的政治、法律以及种种科学,都是关乎物质的学问。

(二)中国人自同治时期以来谋改造的思想有一种由浅到深的趋势。曾国藩、李鸿章代表的倾向是注重模仿欧美的军队和武器;甲午对日本作战失败以后的倾向是模仿欧、美的学校;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再进一步的倾向是羡慕西方哲学的精深,要榨取他们的思想,尤其是他们争“自由”的观念。——这是许多人从日本的书受了些欧、美的“政俗”和“学说”影响的结果。但那个最初的倾向失于所得太浅,不知道欧、美武器优胜的根源。模仿欧、美的学校也作得过于浮浅,没有作到有实际的用处。羡慕西方的哲学又“求之太深”而趋向空谈,“自由”的口号只等于中国历史上讲义理的人爱说的简单的、片面的标榜。而且“自由”的口号本身是可批评的,在中国更是不适用的,因为中国早脱离了封建和宗教的压制,中国人已经过分自由。中国若模仿欧、美,法律和教化只有加密。学校的空名和自由的空谈都使中国谋改造的工作走错了道路。

(三)魏源在道光时期已说对于西方要“师其长技以制之”,就是要学欧、美物质的长处。自曾国藩、李鸿章以下若干人都追随魏源的话,但是几十年里没有人在这方面有深入的认识和尽

力的工作。

(四) 中国人不知道物质的建设每一件必须作到规模与列国相当, 标准与列强相等, 才有用处。庞大的中国只有一两个造船厂便“虽有若无”, 一个制造厂一年造枪2000枝便“须二百年乃给中国之用”。荷兰、丹麦、瑞典, 都只当中国的一府, 所以中国即使有了这几国那样的伟大船厂也还不够。枪炮只靠从外国购买, 不但随时可以遭受禁卖, 而且永远只能买得旧式的。而武器不如人, 枪炮的发射“人远我近, 人速我迟, 势必求败”, “胜负立决, 无可为言。”军船、商船的型式因各国竞争而不断变化, 任何一国用大款造的军舰若型式不如别国便是“虚糜巨帑, 如投海中。”因此凡物质的事业必须“与欧之列强相等而后可”。“不动则已, 动一事必较于万国而欲其必胜, 而复可为。”聘用外国的专家来作教习, 则应当不惜重费, 只要求得有最新方法的人才。“苟非其人, 则以旧废之法来教, 不如不学之之为愈。”

(五) 中国人不知道物质的建设事业必须是全面的, 物质建设所赖的种种科学的获得也必须是全面的。造一艘军舰所需要的大量铁板、铁钉、和转动的大炮, 都是简单的事物, 但讲求军舰的型式便是很复杂的学问, 用钢的“生熟厚薄”和制造炮的机轴的“滑敏坚久”便大有技术的高下。造船与制钢便是直接相关连的。“一物之能成, 备万物而为之用, 苟有一缺乏, 卒不能成。”单就军备而论, 便必须“合治物质种种之科学, 徧收其用, 而后兵舰, 枪炮乃可致精。”浩大的军费要倚赖财政, 财政要靠农、工、商、矿, 转运事业, 这些事业要靠物质之学。

(六) 中国人更不知道物质的事业及物质的科学的振兴所必需的一个时间要素, 因此不知道何以物质的振兴要急急进行。议院可以在1天之内成立; 官制可以在几个月内改定; 新的法律可以在1年之内大致草成; 译书可以在一二年内作到好书略备; 理财虽难, 也可以在一二年内作到使国用大致可以支付。只有物质的事业每一样都要有长期的工作才能建立。在英国、德国1艘1万吨的大舰最快要3年才能造成, 4000吨以上的最快也要19个月, 而1个厂1年只能造几艘军舰。造1座大炮要10个月。学习操纵军舰的人必须在厂4年, 在舰3年, 最快也要在厂、船各2年才能毕业。学制炮的人学炼钢要2年, 制

炮也要2年。因此物质的事业和学问绝不同于种种政治制度和空论。“凡百政制皆可吾欲之则为之, 惟物质之工业则非欲之即得之, 旋至而生效。”“空言可期月而学之, 此物质者不预蓄数年前, 而欲得之于我欲为之时, 不可得也。”

(七) 各国的强弱不系于其他条件, 只系于物质力的盛衰, 物质的盛衰系于物质学问的精进不精进。英国是发明汽机的国度, 所以居强国的领袖。比利时虽是小国, 但靠机器和制铁成为强国。荷兰海船发达, 所以先在南洋称霸。德国胜过法国, 因为能在短期间内用全力振兴工业学校。法国的学校和工厂聘请外国专门人才, 总要计较费用, 德国则不惜重金, 不多谋虑, 所以两国的成就不同, 国势也不同。美国也是用丰厚的酬报吸引欧洲人才。美国的哲学、文学还未兴起, 但工艺精进, 所以国力宏大。美、德两国在世界的地位都必将超过英国。列国的富强不靠“道德、哲学空论之说”, “一切空论之学皆无用而惟物质之为功。”

(八) 物质力不但决定国势的强弱, 也决定一个人民的“苦乐、文野。”一国的动力多少是强弱的标记, 也是人民的衣服, 饮食的程度, 享乐求学的机会多少, 健康、寿命的高下、长短的标记。一个用机器的织工比用手工的生产力多几十倍, 他的收入和衣服、饮食、享乐也多几十倍。新世界生产的货物比古时增多千万倍, 人的享受也增多千万倍。种种新发明使人的劳作减少, 闲暇增多, 食肉增多, 求知识机会增多, 精神开畅, 寿命延长, 后代康强。美国的富豪大量捐款, 建立图书馆和学校, 都是凭着机器时代的工业的财力, 不是只凭个人好施的美德。美国的工人男女“皆若有士君子之仪容”, 乡民的衣服、住宅“皆若有公侯之都丽”, 连落机山的荒僻高峻区域的贫民也是“家铺地毯, 墙表花纸, 士女服用无异都人, 童姬言动有类学士。”这全靠工艺发达, 交通便利, 收入增多, 用品价贱, 以及教育和知识的普及, 也就是全靠物质的“媒介桥梁”, 不是靠任何“空论”。

(九) 物质的发达与求得种种物质的学问是不可分的。中国最急要的就是用全国之力求得物质的知识; 这个求知识的工作处处不离开一个求物质的发达之目的。求知识有两个主要方法: 一个是“大派游学”, 是用全国各省各县的力量派大批学生——一时要派到一万人——分别到各国求

各种物质的学问。一个是“广延名匠”，是不惜重金，大量聘请外国人才来中国传授专门知识技术。派留学生要作得范围广大而目标精确。学机器要到苏格兰，学电学要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纽奥连大学，或加州大学。职业专门学校以德国最好，陶器以法国最好。图书、雕刻也是文明的实际工具，学这两门都要到意国。音乐也不可少，学音乐可到德、意两国。学造船、造炮要到英、德两国的名厂。日本也有许多种新开的实用学校，可以加派学生。在国内要普遍开实业学校，用重金请外国高等人才作教师。小学校要一律练习仿造机械缩型。学校以外，要普遍设新器物的博物院。遍收各国新器物，凡新出的随时要收入，还要请外国专家担任解说。又要设型图馆，收集各种工艺的缩型与蓝图。设立制造厂也是求

知识的工作的一部分，也要不惜重金聘请外国人才。

(十)救国的方法万绪千条，缺一不可。这些条绪互相牵连，这一条不能作到则另一条无法作到。要谋物质的学问的发达，得靠办好财政；办好财政得靠改好官制；改革官制得靠人民自治，靠地方各级成立议院。因此谋物质的学问的发达也还是一个整套的救国方法的一部分。凡是议论事理“而偏举一事者皆不全不备之道”；凡是发明一个主张必须顾到“本末、大小、精粗，完备不漏”，万不可以“举一端偏致之论”。但是建设物质的力量还可以说是最急的药方。

责任编辑：林有能

书海拾萃

新发现的梁启超致犬养毅函

陈占标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一度曾与孙中山先生商谈两党合作，为此事，曾致书日本立宪国民党领袖犬养毅（同情、援助亚洲民族主义运动的人物）冀其从中斡旋。这件信函未在文献史籍发现，原藏于日本冈山县立博物馆。现由日本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文学博士坂出祥伸先生复印，寄赠给“新会县梁启超研究室”。此信对研究梁启超与孙中山在日本期间商谈合作事件，很有参考价值。原文如下：

西政之人常谓敝邦人无爱国之性质，斯言仆几无以辨之也。然仆敢谓敝邦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因未与他人相遇，故不自知其为国也。然则观之于海外之人，则可以验其有爱国性与否矣。今内地督抚无可望，民间受压制，不敢小行其志，欲其扶危局，难矣。故今日惟求之于海外，庶几有望也。

孙逸仙近曾见先生乎？仆等之于孙，踪迹欲稍疏耳，非有他也。而横滨之人，或有与孙不睦者，其相轧之事，不知如何，而极非仆等之意矣。孙或因演人之有违言，而疑出于仆等，尤非仆所望矣。敝邦有志之人既苦希，何可更如此相仇！仆欲一见孙陈而面解之。先生有暇日，约会见于此间可乎？至仆等与彼，踪迹不得不疏之故，仆见彼当面解之也。

木堂先生有道数日不侍几杖，方思走诣，顷见柏原君始知

贵体清恙稍剧，想念之至。伏乞为大局自保重，善自调摄，不胜企祝。仆顷为康先生译人来滨，须往彼一会晤，而日内归京，更当走谒问讯一切。敬请，兴居。

梁启超再拜
四月十四日

梁启超在上述致犬养毅的信中，至少能说明如下几点问题：1.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康有为先后逃至日本，孙中山曾争取与康梁合作，受到康有为的拒绝，出现了革命派与维新派之间一些龃龉。梁启超在信中表示，此事与他无关；2. 梁启超是主动争取与孙中山商谈合作的。查康有为是在1899年3月22日被迫离开日本去加拿大的。在这之后的22天，梁启超便致函犬养毅斡旋与孙中山会晤，就是最好的明证；3. 信中也反映当时的日本政党对中国革命派、维新派的关系。

论梁启超对我国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贡献

周行易

在梁启超的学术研究中，有一个重要内容——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未为人们所重视，这是对全面评价梁启超的一大忽略。事实上，梁氏这一研究为开创我国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新学科所做出的贡献是重大的。可以说，当时的学术界，还没有谁能在比较的广度和深度上与他相颉颃。本文试从四个方面作一论述。

一、比较的专门性

早在1840年，中西文化比较就被客观地推到了中国知识分子面前，人们在探寻中华民族的出路时，已无不涉及这一内容。但是，在尔后长达60余年的时间里，它并不是作为一个科研课题被学术界所意识的，人们只是迫于亡国的惨痛，急功近利地作了一些直观的面层比较而已。而且这样的比较，也都是掺和在其他政治、经济文章之中，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那么，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作为一个正式的科研课题，究竟是什么时候被我国学术界所意识的呢？笔者认为，考察的主要依据是：何时有了这方面的“专门性”著作或论文。如果这一依据能成立的话，那末，这个“临界点”的突破，应该说是由梁启超在20世纪初完成的。

1902年前后，梁启超发表了一大批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著作和论文。这些论著和前人的有关文章相比，大都具有“专门性”的特点，有的甚至在题目上就显示出强烈的“比较”色彩，如《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加布儿与诸葛孔明》、《中西宗教家哲学家爱说之比较》、《先秦学派与希腊印度学派比较》（章节）等等；或用“连词”将两个比较客体加以联系，或直接标以“比较”二字，表现出比较研究文章外在形式上的一个明显特征。

从这些论著的内容看，也富有比较的特色。它们已不再是掺和、混杂在其他政治性文章或译著中的片言只语、诗话式点评（如严复译《天演论》中的某些评语等），而是主题单纯、结构严谨，洋洋洒洒、成千上万字的专题论文或著作。《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近4000字，“取两域数千年之历史比较而观之”，章章紧扣，节节相连，毫不旁逸斜出；《墨子之论理学》达1万字，也是专门比较培根的形式逻辑与墨氏“辩学”之异同，不曾稍涉其他内容；长至7万字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更是我国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发轫期所难得的巨著！这篇长论虽谓论中国学术的变迁趋势，实际上是比较、分析中外文化，其着眼点是“强调中外交流、中西学结合”。全论凡七章，次第而下，无处不

与西方文化相关联。其中特别将先秦文化与古希腊文化，中国“近世史时代”文化与欧洲文艺复兴文化列专段进行了较全面深入的比较。或从时间上作纵向考察，或从空间上作横向对比。探其源头，评其地位，析其特质，究其影响。以其篇幅而论，仅比较“先秦学派”与“希腊学派”的“长”处和“短”处一段文字，就有5000余字；以其成就而言，某些见解，堪与今日比肩，有较高的科研水平和学术价值。无疑，该论可以视为我国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奠基作之一。

梁启超说：“学术愈发达则分科愈精密，前此本为某学附庸，而今则蔚然成一独立科学。”^②他的上述专门性论著，正说明我国中西文化比较研究随着历史、时代的发展，已从别的学科中分离出来，摆脱了依赖于其他文章的“附庸”地位，从而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课题。

二、比较的自觉性

所谓自觉性，是“指人们认识并掌握一定客观规律时的一种活动。”^③梁启超之所以能完成我国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质的飞跃”，除了是历史、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外，与他自觉的比较意识是分不开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已经认识到“有比较才有鉴别”的认识规律。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总论》中指出：“凡天下事，必比较然后见其真，无比较则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之所长”。他认为，中国文化长期不能“发挥光大”，就因为人们缺乏“比较”，“徒为本国学术思想界所窘，而于他国者未尝一涉其樊”。因此，要复兴中国文化，非得加强比较研究，“于彼乎，于此乎，一一撮其实，咀其华，融会而贯通”不可。我们知道，只有用联系的观点，比较的方法去分析事物，才有可能把握其实质。梁启超强调“必比较然后见其真”；说明他对这个规律是有所认识的。他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正是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所进行的一种自觉的科研活动。

其次，有了开创一门比较文化学的理性要求。梁启超早就对“考据之学”深为不满，“十年来所排斥不遗余力”。^④随着民族危机的日渐加深，政治、经济局势的每况愈下，这种“不满”情绪愈加强烈。戊戌变法的流产，更迫使他在“失败的教训面前进一步反省文化机制本身”，开始进入他一生中“文化观念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重要时期。^⑤他深深地意识到建立一门比较文化学以揭示中国文化内在的落后因素的重要性，认为“至今未闻有从事于此者”是由于不知道“比较”的重要性，所以，他摆脱初时那种犹豫和旁徨状态，决心去“从事于此”。他满怀激情地写道：“吾爱我国，吾爱我国民，吾不能自己，吾姑就吾所见及之一二，杂写之以为吾将来研究此学之息壤，流布之以为吾同志研究此学者之筚路蓝缕。天如假我数十年乎，我同胞其有联袂而起者乎？伫看近世史中我中华学术思想之位置何如也！”这段文字，充分反映了梁启超从更深的层次上——中西文化结构的差异上探讨中国社会积贫积弱原因的迫切心情。实质上，它意味着中国人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两次失败后，新的民族文化观念的进一步觉醒：要“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

高尚最荣誉之位置”，便再也不能在旧有文化的框架内左冲右突，苟延时日，而应当赶快打破它，“张灯置酒，迓轮侍门”，迎接“泰西文明”的到来，积极开展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让“彼西方美人”，“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促进中国文明的复兴。

可见，梁启超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已不再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直观比附，而是自觉意识的产物，是一种“有计划的、有远大目的的活动”。

三、比较的理论性

梁启超不仅提出了开展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理性要求，而且较正确地解决了建立该学科所必须首先解决的一系列重要理论性问题。诸如为什么要开展比较研究？怎样对待、评价中外文化？未来文化发展趋势如何？以及“西学东渐”等等，都有其独到的看法，初步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理论。这是梁启超对该学科的最突出的贡献以及超越前人的地方。分述如下：

第一，积极的比较文化观。梁启超开展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不是要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恰恰相反，是要“采择补正”、“增长光大”中国文化，让中国文化重新“执牛耳于全世界”。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因素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特优于他邦者自不少”，主张对传统文化要语长言短，一分为二。“语其长，则爱国之言也；语其短，则救时之言也”。不能越比越消极，越比越虚无。他指出，“故合世界史通观之，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惟近世史时代，则相形之下，吾汗颜矣”。然而，“近史之前途，未有艾也”，又安知我们不能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呢？他认为，只要我们不妄自菲薄、自暴自弃，“汇万流而剂之，合一炉而冶之”，中国文化前途是不可估量的。基于这个积极的比较文化观，梁启超在开展中西文化比较时，总是能于羞辱中发现自豪，在悲观中看到希望，从沉痛中汲取力量，始终保持着坚定的民族自信心和高昂的爱国热情。无疑，他为我国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学科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积极的、健康的、昂扬向上的基调。

第二，对待中外文化的原则。怎样对待“本国文化”和“外国文化”，在本世纪初已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则徒为本国学术思想界所窘，而于他国者未尝一涉其樊”，“一则徒为外国学术思想所眩，而于本国者不屑一屑其意”。梁启超对这两种观点都表示不赞同。他认为中国文化“博大而深隳”，应该认真总结；外国文化“灿烂而蓬勃”，也值得很好吸收。在对待中西文化问题上，其基本原则是，既要反对“以本国固有之学而始为学”的保守思想；也要反对“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的不良倾向。特别针对当时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一些青年人从盲目排外走向民族虚无、鼓吹全盘西化的思潮，他告诫说：“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今正过渡时代苍黄不接之余，诸君如爱国也，欲唤起同胞之爱国心也，于此事必非可等闲视矣”，“且诸君皆以输

入文明自任者也，凡教人必当因其性所近而利导之，就其已知者而比较之，则事半功倍焉。不然，外国之博士鸿儒亦多矣，顾不能有裨于我国民者何也？相知不习，而势有所扞格也”。认为对西方文化不能完全照搬，而要考虑到我国的社会生活习惯和民族心理特性。这在当时不失为金石之言，在今天亦很有现实意义。

第三，衡量中外文化的标准。开展中西文化比较，是为了采撷二者之精英，这就要有一个取舍的标准。梁启超认为这个标准应当是：“以其学之可以代表当时一国之思想者为断，而不必以其学之是否本出于我为断。”这个标准的主要价值，不在于它突破了狭隘的国粹主义的束缚，而在于它的“现代性”和“广泛性”。它是从时空两个方面进行界定的。在时间上，强调必须是“当时”的，一切陈腐、僵死的东西都与之无缘，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在空间上，强调必须能代表“一国之思想”，即能代表全国人民的思想，合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当然，不同时代“一国之思想”不尽相同，但作为一个抽象的形式，这个标准是有其永恒存在的价值的。

第四，中国未来文化模式。中国未来文化究竟如何？是继承传统，还是全盘西化？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这是人们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的中国未来文化模式不同于上述观点，他有自己独到的构想，即：“合泰西各国学术思想于一炉而冶之，以造成我国特别之新文明。”这个模式有三个特点：一、它是一种“新文明”，既不是中国传统的，也不是西方近代的；二、它是“我国特别”的，即具有中国特色的；三、这种“新文明”没有机械地割裂为“体”“用”两个部分，而是择取各国文化精华“合而冶之”的有机融合体。应当承认，如果排除梁启超所憧憬的“新文明”的具体内容，这个模式是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第五，文明碰撞理论。梁启超认为，世界文化总是在两种不同质的文明相互“碰撞”后而获得更大发展的。以西方而言，古“埃及、安息藉地中海之力，两文明相遇，遂产出欧洲文明，光耀大地”，“其后阿剌伯之西渐，十字军东征，欧亚文明，再交媾一度，乃成近世震天铄地之现象”；以东方而言，“中华当战国之时，南北两文明初相接触，而古代之学术思想达于全盛。及隋唐间与印度文明相接触，而中世之学术思想放大光明”。因此，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既不会是中国文化的纵向延续，也不会是西方文化的横向兼并，而是“两文明”（“欧美”文明和“中华”文明）的相互碰撞，不断融合。根据这个理论，梁启超还预言：“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西学东渐”是历史演变之必然，是文化发展的规律。任何惊慌恐惧和闭关锁国都是不必要也是没有用的，一切爱国同胞，都应顺应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积极促进两文明再度碰撞。必须指出，梁启超这个理论不只是阐述了一种文化现象，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世界文化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从而为开展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由上可见，梁启超对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都有所接触。他的这些理论形成于我国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萌芽阶段，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今天的有关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理论，基本上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甚至于水平上，也没有高去很多。仅此一

点，亦可以看出梁启超对该学科建设的贡献有多大了。

四、比较的全面性

梁启超对我国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贡献还表现在比较的全面性上。所谓“全面性”，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从文化“整体”出发进行比较；二是对文化的各个“分支”进行广泛比较。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人主要是从军事技术上同西方的“奇技淫巧”进行比较的，其范围甚窄；60年代后冯桂芬等虽然将中西文化总起来考虑，提出了“中体西用”的理论模式，但他们的所谓“中体”，无非是封建道统，所谓“西用”，仍只是先进的科学技术而已；严复前期在译介西方著作时所作的点评，也一般只是侧重在哲学、政治方面。以上比较不仅于文化的各个分支涉及有限，更缺乏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整体思考的宏伟气魄和规模。梁启超在这一点上所表现出来的气度和胸襟是空前的。

首先，他是从中西文化“整体”出发探讨两种不同体系文化的异同，上文提到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总论》那段文字，已能说明这一点。他所说的“四库著录”、“他国文字”、“泰西文明”，以及“于彼乎，于此乎”的“彼”“此”等等，都是指文化“整体”。另外，他还多次提到要创建一种“新文明”，亦即要创建一种“新文化”。1921年，他在南开讲授“中国文化史”课时，凡谈及中西文化的地方，便不再使用“文明”这个词，而改用“文化”：“世界他部分之文化民族……其与我接触交通之迹何如？其影响于我文化者何如？我文化之影响于彼者又何如？”^⑥显然，他是一贯着眼于文化“整体”比较的。

其次，梁启超对中西文化的各个“分支”进行了广泛的比较。诸如哲学、经济、政治、道德、文学、教育、历史、地理、宗教，乃至人种、气候等等，无不囊括在他的比较研究范围之内。

在哲学上，他认为中国古代不如古希腊形式逻辑发达，“论理思想之缺乏”，“无抗论别择之风”。“希腊哲学之所以极盛，皆由彼此抗辩折衷”，“而中国殊不然，此学之所以不进也”。

在经济上，他认为西方人尚“奢”，愈奢而“货之弃于地者愈少”，用于人者愈多，因此其“国愈富”；东方人崇“俭”，愈俭而货之弃于地者愈多，用于人者愈少，故“穷蹙不可终日”。^⑦

在文学上，他认为中国长诗不及西人，“如莎士比亚、弥尔敦、田尼逊等，其诗动亦数万言。伟哉！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中国“长篇之诗，最传诵者，唯杜之《北征》、韩之《南山》”，“然其精深盘郁雄伟博丽之气，尚未足也。”^⑧

还从宗教上指出：“古代各国皆行多神教，或拜下等动物者，所在皆是。中国前古，虽亦多神，然所拜者，皆稍高尚而兼切于人事。”

从伦理上指出：“伊壁鸠鲁”的极端“利己主义”是为“邪说”，将会导致“社会灭亡”；中国墨子的“平等无差别之爱”，“实爱说中之极普遍、极高尚者”，然“实行颇多窒碍”。^⑨

象这样的论述，在《饮冰室合集》中，触目皆是，不胜枚举。当然，其中有些见解也不一定中肯和正确，亦有偏激和错误的地方，但不管怎么说，梁启超从比较文化的角度为后人提出了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为我国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全面展开展示了广阔的前景。

总之，梁启超所比较研究的中西文化，是一种全面的、系统的、完整意义上的文化。在20世纪初年，闭关锁国的樊篱还没有完全拆除之际，他能够高瞻远瞩、一马当先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这样的整体反思和全面分析，其开拓精神和伟大气魄是令人钦佩的。正如胡适在《四十初度》中所说：“梁启超的这些论著，给他于四书五经之外开辟了一个新世界”！这是毫不过分的。

① 方志钦、刘斯奋：《梁启超诗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9页。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章。

③ 《辞海·哲学分册》第86页。

④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8章。

⑤ 刘再复：《沿着鲁迅开辟的文化方向继续探索》，见《新华文摘》1987年1期。

⑥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章。

⑦ 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

⑧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

⑨ 梁启超：《墨子学说》第3章。

作者单位：湖南电大邵阳市分校

责任编辑：林有能



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学分析

乐 正

在晚清同光之际，多角度多层面的中西比较研究已经在中国一部分思想敏锐的知识分子中展开，认知空间的扩展使人们思绪跌宕，一系列新的理论形态也随之而出，诸如“中体西用”、“西学东源”等等。其中“泰西近古说”是一株引人注目的新芽，在一部分人中颇有些影响，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几种“流行色”之一。

“泰西近古说”的观点散见在晚清一些中西比较研究的文章中。1881年9月，上海《申报》刊载了一篇题为《泰西风俗近古说》的文章，对这种观点做了专门的阐述：“就富强与巧而观之，西人虽较胜于中国而中国未尝不可步武而及之，惟其风气之浑厚尚穆然有太古之风，此则尤为可羨者也。”文章还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的五个方面对此详加论证，最后指出：“总之，泰西自耶稣始开风气至今不及二千年，按之中国尚在中古以前，浑浑噩噩安安敦敦，皆与古时为近。虽制作日新，富强日盛，而古意古风究未甚远。将来日渐开辟，未知其变化若何，而就此时而论则其风俗犹近乎古。”有一篇题为《论泰西办案》的文章，第一句话就是：“泰西风俗犹近乎古。”“今泰西凡有词讼必有状师为之辨驳，此法最与古近。”^①在另一篇时论中，有人指出：“大抵今之西洋以中国年代推之，仅比秦汉，故风俗厚而人心专。厚则鲜穷而无告之民，专则无举而辄废之事。此其所以强也，此其所以能用其强也，此其所以能示强于形而下者之器也。”^②郑观应在《易言》的《论议政》一文中也认为：“考泰西开国至今，历年未久，故其人情风俗尚近敦庞，犹有上古气象。即此一事（指开议院——引者），颇与三代法度相符。”^③

从文字表述上看，“泰西近古说”给人们一个奇怪的结论，似乎西方近代的富强不是表明其社会的进步与发达，而是社会发展不足并且落后于中国的结果。持这种观点的人多是当时思想界中学习西方的积极鼓吹者，他们的真实愿望并不是想要贬低西方，而是要为人们开拓一条新的思路，使人们能顺其思路推演下去，得出两个新的结论：第一，是现实中的中国既不如泰西那么富强，也不如中国远古时代那样美好与合理，即所谓“今之不逮夫古者即中之不逮夫西者也。”^④近世中国并没有继承和发扬上古先圣们的遗业，而是早已把它们忘记、抛弃了，社会已走向了传统的反面。这样，论说者已经置当时的中国于传统与西方的双重否定之下，使其显得更不合理了。第二，是中国古老传统的余辉已经在今日西方社会中反射出来，因而今日学习西方不仅不是在割断、舍弃自己的传统，而且正是恢复、发扬传统的必要手段。正如《原俗》一文中写道的的那样：“中国凡俗自

去□古日远，遂不能复敦古处，而泰西风俗每有浑浑噩噩之处，说者或指以为野为鲁而不知此其中尚有近古之风气焉。”“刻下中外一家开千古未有之奇局，此非西法之将入我中国，实则中风将救回其从前所失传之法。”^⑤康有为在1888年也写道：“今之中国□□□先圣之法，而反令外夷近之。譬如故家子蒙祖父之荫，而悖祖父之学行，则不如自食，邻人反得以其学行挺起，虽其先世出身卑贱，反为之屈矣。故仆所欲复者，三代两汉之美政，以力追祖考之彝训，而邻人之有专门之学，高异之行，合乎吾祖考者，吾亦不能不折取之也。”^⑥从上可知“泰西近古说”的真谛是用中国的罗纱裙将西方少女打扮得更富有东方式的美感，使人们不得不赞许它、接受它。

从理论的逻辑性与事实的可证性来看，“泰西近古说”的破绽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按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来说也是如此。那么，为什么这样一种近于荒诞的观点在晚清却能堂而皇之地在思想界登台亮相，并且为许多人所悦服呢？为什么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都热衷于炮制这类不伦不类的思想产品，而且论说起来振振有词呢？如果我们用一些心态学的方法对隐匿在这一理论之后的当时思想家的某些心态做一番探测，便不难找出其必然性和某种合理性来。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心态分析：

第一，本能——理性意识的冲突与缓解。

所谓本能，是指人的心态的一种内在定势，它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然人的本能，一类是社会人的本能。社会人的本能又分为人的文化本能和人的阶级本能。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一旦人们构筑起自己的本能的定势之后，维系、巩固这种定势便又成了一种新的本能，它是人的自尊本能的延伸，是一种自我肯定、自我实现意识，其强度并不亚于被它维护的本能强度。本能的主要特征不仅为每个人所具有，而且也表露在每个民族的成长发展过程中。一个民族的文化与传统便是该民族文化本能的外在的体系化的定势（当然是动态的定势），并且和人一样，当一个民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定势之后，也就形成了维护它的本能。

一个人的思想乃至一个民族的文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本能及其张力的驱动和支配。但是，在这种本能意识的对面有一个日益强大的敌对力量——人类思维中的理性意识。在社会处于大变革的时期，理性意识往往是作为本能的一种叛逆和抑制因素出现的，两者之间经常处于矛盾与冲突的状况中。“泰西近古说”的制作者多属于晚清思想较为活跃的知识分子，他们因受到西方近代文明和中国现实的双重刺激而坐立不安，从内心迸发出一种理性的冲动，为中国落后挨打的现状鸣不平，为寻求民族自卫自强的道路而上下求索。这种理性意识的骤增，实质上是对本民族的文化本能——已形成为体系的传统——的一种挑战和否定，因而引起人们情感上的危机。特别是它导致了一部分长期受封建正统观念熏陶而又开始对其不满的知识分子的心态紊乱，造成一种分裂型心态，即所谓双重人格：理性人格和本能人格。从理性人格出发，他们呼吁中国应学习西方，变革旧制，唾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沉渣浮沫，他们以此为己重任，富有一种强烈的时代使命感。而从本能人格出发，他们又力图巩固、强化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在“我是中国

人”这种文化本能意识的支配下，无法摆脱也不想摆脱情感上已经形成的定势，念念不忘自己的民族义务感。

由于理性的力量日益猛烈地冲击着本能的定势，而维护自己传统的文化本能的存在又决定了理性的力量只能部分地改变或抑制它，而不可能完全消除它，因此，在整个近代的历史进程中，这两种人格意识一直尖锐地对立僵持着，而且都带有明显的否定对方的意向。这种人格对立反映了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深刻矛盾，这是当时每一个有识之士都无法摆脱、回避的现实问题，它给中国几代思想家带来了心理困惑和情感痛苦，也引起了人们无休止的争论。“泰西近古说”在此状态下出现，可以说有其广泛的社会心态的基础，这种基础成为其出现的必然性的依据。因为，“泰西近古说”的最大优势在于它暂时缓解了理性意识（学习西方）与本能意识（发扬传统）之间的矛盾，善意地希望分裂型心态和人格的两极能趋向弥合、统一。这一点能给许多人带来心理上的快慰。“泰西近古说”论者就是利用了这一优势，先是把颂扬西方纳入怀念古旧的范围内，使人们觉得可以接受。例如，有文章写道：“泰西之强盖以此也（指议院——引者），是于中国上古遗风犹未泯。为古者君与民近，上与下通，莅治犹一方之吏并耕，忘九重之尊，沾体涂足之伦日接于巍巍，重旃黄屋之严不隔乎攘攘。尊君卑臣而自秦制始，然强霜坚冰，其来亦渐已。子产之时郑国设有乡校，有游乡校而议国政之是非者，子产欲行其所善而改其所恶，此即泰西议院之滥觞也。”^⑦然后让“学习西方”与“宏扬传统”这两种观念联姻，使理性人格与本能人格打通关节，两者都能够在这个结合中同时获得某种满足。他们提出：“欲求外国之强，只须师中国三代古人之强，即罔与之合矣。”^⑧“学西法即所以复古制也。”^⑨在郑观应乃至孙中山晚年的论著中，“所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这类相提并论的说法总是那么为人所津津乐道。许多人在苦苦地寻找着古与今、中与西之间的结合点，寻找着理性与本能之间的“缓冲带”，寻找着新的心态均势。结果，“师夷制夷”、“西学东源”、“中体西用”、“泰西近古说”这一系列充满折中、辩证色彩的理论模式便纷纷登台亮相了。

第二，横向——纵向比较的演变与重叠。

晚清思想家与他们的前辈相比，在思维方式方面出现了一个巨大变化，即由过去注重历时性的纵向比较（将现实与历史作比较），转向注重共时性的横向比较（将中国与西方、日本进行比较）。旧的思维模式是以中国的传统为参照、借鉴的依据，而新的模式则是以近代西方和日本为参照、借鉴的楷模。通过多角度多层面的横向比较，人们的眼界大大开阔了，看到了中国的落后之处，找到了变革的方向，更坚定了学习西方，振兴中华民族的决心。但是，“认识是以认识为先决条件的；认识某物就是将其归入我们以前已知的某物，并通过以前有的知识将其区分开来。要是缺乏这样的参考（物），那我们只能面对一个谜；全新的事物是无从认识的。”^⑩晚清的许多思想家正是走了这样一条认识西方的道路。他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将西方与中国的远古盛世进行比较印证，其结果，西学与中国旧学相比较，得出了“西学东源论”，西方社会与中国古代社会相比

较，又得出了“泰西近古说”。这一认识过程的发生，说明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一，人们在进行横向比较时是在做一个双向逆反的认知运动，即以西方为参照系来认识中国的国情，又以中国为参照系来认识和评议西方。在前一个认知运动中，人们的理性意识占着上风，因而抨击时政、鼓吹西学；而在后一个认知运动中，则较多地表现出思想家本能意识的主体性，“泰西近古说”、“西学东源论”便是这一运动的产物。其二，将近代西方与古代中国相比较，实际上是将横向比较的思维模式又还原到中国传统的历时性纵向比较模式中去了，或者说是将两种模式重叠一起使用。横向比较使人们念“解放”之圣经，而纵向比较又使人们披“复古”之袈裟。两者的重叠混用，从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过渡型心态的基本特征。新的思路已经出现，而旧的模式并没有即刻消除，仍然以很强的惯性力量支配着人们的思维，于是，人们习惯地将新的认知对象纳入旧的知识框架中去加以理解、判断和再处理，形成了新事物既以驱逐旧观念为目标，而又将旧观念做为自己依存的条件这样一个怪圈。无论是洋务派的言论还是新学家的学说，几乎都在这个怪圈中打过几个转。这说明人们的思想观念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过渡时期产生过渡型心态。晚清思想界出现许多不中不西，亦新亦旧的杂交产品，正是这一过渡型心态的表现。这种心态恰是与近代中国社会新旧杂陈、中西各类社会形态并存的历史环境相吻合的。

第三，中国——西方文化的求异与认同。

人是多种因素结合的产物，他既是文化意义上的人，也是自然意义上的人。作为前者，人有求异的本能，而作为后者，人则有认同的内驱力。根据心理学家们的观察，人有一种本能的合群倾向和对孤寂、被排斥的恐惧感。自然人的这种本能是认同意识的基础。而且，合群往往是被承认的前提，不合群的人或事物在赢得公众承认方面总是会遇到麻烦的。因此，合群与认同便成为争取承认和共鸣的重要手段之一。认同还可视为对和谐感的一种追求，特别是在注重权威和秩序的传统的东方社会中，和谐简直是人的一种美的快感。打破和谐就会被视为异端，引起人们的不安并导致怨言，传统的本能人格不喜欢由异端引起的、破坏和谐的变动。基于这种东方式的认同心态，晚清许多进步思想家都把争取人们对西学的承认视为他们重要任务之一，他们不得不把社会对西方新事物的心理承受力作为自己立论的重要尺度。这种心态动机使他们选择了传统的认同思维方式，“泰西近古说”便是这种认同意识的一个杰作。具体地说，思想家们在采用认同的思维方式时，运用了求同法和移植法。所谓求同法，认为近代西方与中国存在着许多相同的、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思想家在论述这一点时更多地强调了自然人的许多共同本能和理性意识的普遍效应。在一篇题为《中西同俗而古今不同礼说》的文章中，作者就指出：“中之与西其嗜好不可同，其性情不能同，其居处饮食无一可同。而独于中国之风俗则不同而同”，如君臣之伦、父子之伦、兄弟之伦、夫妇之伦、朋友之伦等等皆同，“其它大端亦何莫不同？……”^⑩有的文章则有意去淡化中西间的差异，认为：“中西人之性情嗜好无一不同，不同者特其礼数仪节耳，而礼数仪节则不特中与西不同，中与中古、古

礼今礼亦有不同。”“中之有异乎西者实今之不逮古也。是则情性之所以不同者，非情性之不同，言之者之自见为歧也；礼仪之所以不同者，非礼仪之不同，行之者之自趋于异也。”^②

所谓移植法，类似心理学中的投射作用，即一个人把他自己的特性归属到其它人身上，总是假设他人与自己是相同的。“泰西近古说”的制作者经常将中国原有的一些特征移入到西方社会中，又将西方近代文明的一些观念嫁接到中国古圣人的言行里来，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模式，让西哲获得与先圣同样令人尊敬的地位。例如，在谈到西方近代的民主政体时，有人指出：“泰西则君民不啻一体，国家大政民人亦得而与闻焉，有一利与民同之，有一弊与民除之，所谓官者不过承上起下，更不得上下其手，以故诸弊皆无自而生，此君臣之近古者也。”^③另一篇文章则视“议院为中国盛时遗法”，认为：“古者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虽庶人亦得与议时政，而天下又命太史陈诗以观民风，使下情不致雍塞，此皆见诸经书，为三代之善制，可知中国盛时原有君民一体休戚与同之谊，非禁民以勿言也。”^④

从上述三个角度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大致揣摸到当时一些思想家们的心态轨迹。其实，“泰西近古说”的出现更本质地说也反映了当时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心态。作为社会成员的一分子，思想家们既感到了自己对社会的促发、引导的责任，但又不得不在社会心态所具备弹力范围内进行自己的理论选择，而不可能游离得太远。从更广阔的社会心态层面来看，分裂型、过渡型、认同型心态仍是当时富有典型意义的心态。由于西方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外来的既是优化又是异化的存在模式和思想势力，是中国人情感的“入侵者”，人们在对外方的新事物惊叹不已的同时，对自己的旧遗存又怀有深厚的依恋之情。因此，出现了理性与本能分离、冲突以及双重人格逆向发展的趋向。在此情形下，人们总是在寻求矛盾情感的解脱，而且一般社会心态与社会精英心态相比较，更多地保持着本能人格的自然驱动力，而较少理性意识的成分，因此，近代心态的演进不得不承受起缓解情感矛盾、重新建立心态均势和重新恢复和谐的完美感受的历史重任。寻找本能与理性的最佳结合点的欲望出现了，社会似乎不需要纯理性或理性色彩太浓的理论模式（不管它的时代意义如何），而宁愿去接受那些牵强附会的、近似荒诞的东西。人们对具有双重适应性、双重满足作用的理论产生了一种偏爱，这些理论按康有为的话说是“混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社会心态中的这种欲望与偏爱导致了一些思想家的中西认同思想模式的出现。“泰西近古说”的制作者们不无夸张地阐释着人类自然本能和理性意识的普遍性、一致性，批评近世中国已偏离、抛弃了人类自然本能中的许多合理部分，走进了偏狭的死胡同。因此，中国人应该面对远古盛世和西方现实进行历史的反省，通过学习西方来重新发现自己，发现自己传统的根基，发现人类的共同理性。这样，近代西方与古代中国的认同，逆转成为中国向进步的西方文明和人类理性的认同，从而使“复古”有了“解放”的时代意义。在这一认同中，人们的时代责任感和民族义务感都得到了部分的满足，“泰西近古说”的模式就正是这种分裂型心态、过渡型心态、认同型心态历史

组合的产物，它是心态的多种需要寻求行为的多重效应的结果。在当时那种社会氛围中，它的逻辑性、可证性方面的错误又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心态的历史演进，并不按照本能的自然发展或理性的主观愿望去开拓自己的道路，而常常是在两者的夹缝中时左时右地度着方步，它更多地是体现着心态两极的合力的样态。这便是“泰西近古说”和晚清心态探测给我们的印象。

- ①⑬ <申报>1881年12月1日、9月11日。
②⑧ <申报>1873年9月27日。
③ <郑观应集>上册，第103页。
④⑪ <申报>1884年6月6日。
⑤⑦ <申报>1887年2月10日、5月1日。
⑥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8页。
⑨⑭ <申报>1882年4月13日。
⑩ 欧文·拉兹洛：<系统·结构和经验>，第71页。
⑫ <申报>1890年11月30日。

作者单位：华中师大历史所
责任编辑：林有能



“时时”解诂

董志翘

“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它出自<战国策·齐策>，目前大学、中学语文教材均选有此篇，但是对其中一个词，历来未有确解，今特申述之。

文章写到邹忌进谏之后，接着一段是“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

其中“时时而间进”一句中的“时时”，历来注家大多未作注解，盖以常义对待。而作注者，又望文生训，以今义误解古义。如目前电大所用的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注为：“时时、经常、往往。间（jiàn）间断、间或。”这样一来，“时时而间进”就成了“经常地间或进谏”，岂非前后矛盾。其实，“时时”古代有“偶尔”“间或”的意思，现略举数例证成之：

①<汉书·高帝纪>：“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时时冠之，及贵常冠，所谓刘氏冠也。”颜师古于“时时冠之”下注：“爱珍此冠，休息之暇则冠之。”按：颜注乃演绎其义，“休息之暇冠之”即平时偶尔冠之，这正与下文“及贵常冠”相对为文。

②<太平经>甲部第一：“浮华记者、离本已远，错乱不可常用，时时可记，故名浮华记也。”按：“时时可记”即偶尔可记。

③<抱朴子·内篇>：“良久，辄有一滴，有似雨后屋之余漏，时时一落耳。”按“时时一落”即“良久，辄有一滴”乃“偶尔一落”之义。

那么“时时”为何有“偶尔”“间或”义呢？其实“时时”之前一个“时”乃“待”之假字。“时”，古音禅纽三等（上古归定纽）之韵。“待”，古音定纽，之韵。另外，“时”、“待”均从“寺”得声，故古为同音字，“时”作“待”乃古音通假之理。<论语·阳货>“孔子时其亡也。”之“时”，正当读为“待”。<潜夫论>：“则又况乎畎亩佚民，山谷隐士，因人乃达，时论乃信者乎？”彭铎笺云：时，待古通。<易·归妹>九四：“迟归有时”，隐七年<谷梁传>注引作“迟归有待。”故“时论乃信者乎”即“待论乃信者乎”“时时”即“待时”，“待时”就有间或、偶尔之义。

刘传大师与石湾陶艺

于 逢

前年我省评选工艺美术大师十余人，石湾老陶塑家刘传同志荣居榜首，他从事石湾人物陶塑至今已60年，在漫长的道路上经历了好几个时代的风雨，是石湾诸陶塑大师中硕果仅存的一人。他是一个幸存者，又是一个坚持者。解放前他已创作了人物陶塑千多件问世；解放后他无论在个人创作上，在指导选料、配釉、烧制的生产技术上，在总结石湾人物陶塑的艺术规律上，在培养年青一代的陶塑家上，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们沿着他所走过的道路，来研究石湾人物陶塑的特点和发展，将会得到极其有益的启示。

石湾人物陶塑为何如此引起海内外艺术鉴赏家的赞叹？为何如此富有艺术魅力而又雅俗共赏？为何如此成为收藏家们毕生以求的珍品？为何能够进入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博物馆？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都是事实。与其他兄弟雕塑相比，——与北京牙雕人像，天津、无锡的彩色泥人，温州的黄杨木刻，景德、龙泉、德化、枫溪的细瓷塑像相比，石湾人物陶塑也许可以说是最有特色的。你能从众多的雕塑中一眼就能把它认出来。这是由于它极富真实感，生动传神，古拙浑厚，粗犷豪放，釉彩斑斓。它来自民间，充满了乡土气息，带着生活的无限活力。

据最近当地出土文物证明，石湾窑实始于唐代，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陶瓷中算是晚辈吧，却又不会太晚。在珠江三角洲水网地带的顶端，有条湾溪河，河边有个小小的村落，名为石湾。村民以半农半渔半工为生，延续到唐代，借水土之利，开始建窑制陶，生产粗贱的日用品，例如食具、饮具、茶壶、缸瓦以至园林饰物等；经宋、元迄明，就赢得了“石湾之陶遍二广，旁及海外”（《广东新语》）和“石湾瓦，甲天下”（《明诗综》第一卷《谣谚》）的美称。明末即出现印有祖唐居、可松、杨升等底款的美术器皿；继而塑制美术人物，时已明末清初。最早出现的是一些仿舒窑和仿钧窑的人物。其后集体塑制的有“文如璧”“均玉”等的巨大瓦脊雕塑，人物组成长达二三丈的群体，所演故事是一段段戏文，可以看出人物造像与风格深受粤剧中各类角色扮相和身段的影响，但面目大都雷同。约嘉道之间，已有单个人像陆续出现，仿舒仿钧，青出于蓝，以后开始形成石湾自己的独特风格。当时名师辈出，落款的有黄炳、黄古珍、陈谓岩、刘佐朝、潘玉书、潘铁遼、温颂龄等；还有不少无名氏以其留下的珍品而成为谜一样的人，例如诨号“大难祖”的陈祖就是其中之一。清末民初，形成了一个隆盛时期，百花吐艳，粗细并存。陈谓岩、潘玉书师徒是承上启下的一代宗师，也是石湾人物陶艺的一个转折点。前此作品多粗犷而豪放，带着浪漫主义的色彩；此后作品则日趋细致，更富于现实

主义。这是大体而言，因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往往是相互结合而难于截然分开的。潘玉书是一个高峰，当时艺名风靡海内外，有人还说他到过法国参观，又有人说他曾从意大利人学艺，都是以讹传讹，并无什么依据。其实潘玉书就是潘玉书，其艺术是道道地地的石湾艺术。

石湾陶艺过去一向上不了正统的中国陶瓷史和中国艺术史，属于“其他”之列，归入“另册”。石湾窑一向是民窑，不属官窑。幸乎不幸乎？看来正好由于它从来是民窑，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官方所注目，也就不为官方所控制，所矫饰，而像野草似地恣意生长，吸取了人民的智慧，满足了人民的需要，其中美术陶塑，尤为人民所喜爱。它虽以仿各大名窑为开端，但终于深深扎根于水乡沃土之中，长成婆婆大树。仙佛罗汉、观音道士，都给人格化了；文人雅士、仕女美姬，都成为活生生的人物；过海八仙、竹林七贤，一个个像真人的写照。当时百花争艳斗妍，各师各法，都有所长，或凝重，或奔放，或稚拙，或泼辣，都恰到好处。但潘玉书特别艺高一等，其作品光芒闪耀，使其他各家风格为之失色，成为当时主要的流派，并延续影响至今。当潘玉书艺名鼎盛之日，正是刘传出身当童工之时。他初则“偷师”，继而摸索，终于自学成材，既受潘玉书的感染，又集各家的所长，创造出了个人风格，而继潘玉书之后成为一代大师。

二

刘传生于1916年，是土生土长的石湾人。其先祖原籍顺德，迁来石湾已有好几代。好几代都是当的制陶工人，干的都是重活。一向家贫如洗，生活艰辛。刘传是单传独子，为全家的希望所在。可是自小瘦骨嶙峋，体质孱弱，看来难有出息。但他在这陶镇里自小受着熏陶，也学着捏弄泥巴。十岁时候造了第一件作品，是他祖父的全身立像，高约45厘米，拙朴幼稚，却又相当形似，是对着照片和真人雕塑的。之后读了两年私塾，12岁就进了近亲开设的陶店作坊当童工。一天干16个小时的活，打扫卫生，练泥印模，晒坯上釉，装窑烧火，两手不停，劳累不堪。于是他不能不考虑，这样下去，终无了期，自己必须学会点手艺，塑出“石湾公仔”，成为师傅，才能独立干活，免于寄人篱下，摆脱困境。石湾从来是个出人材的地方。但他交不出几十元白银的学师费，如何拜师？所以他从来没有拜过师，但很会“偷师”。当时师傅塑造人像是躲起来干的，不让人家看，见有人来了，就用布把它蒙盖起来，怕给人学了去。当时潘玉书和温颂龄已有40多岁年纪，刘传还是个不引人注意的孩子。他好奇地站在旁边窥看，他们并不戒备，许多技巧都给这孩子“默记”住了。刘传所在的陶器作坊，也有师傅造石湾公仔。刘传常常假装解手，经过他身边就停住脚步看。老板发现了就骂他：“哼，你不要打死师傅下山啰！可是看你这四方木头，能学出个屁来！”这话刺伤了小童工的心，却催使他发愤图强。一天干完了16小时，深夜就点起小油灯自己练艺，有时还偷仿一些名师的人像泥坯。临近抗日战争发生，刘传才十七八岁，就已经小有名气了。温颂龄不幸早死，潘玉书也终于在贫病交迫中辞世。石湾镇沦陷后，艺人死的死，逃的逃，改行的改行；刘传无处可去，

只好留在故土。凭着自幼掌握了全套的制陶生产技术，塑造人像又得心应手，于是制出高档的艺术成品，通过古董商往外销售，以维持生活。他为势所逼，反而出个创作的旺盛期与成熟期。

刘传无师，其实也有师。他继承了石湾人物陶塑的优良传统，既受到潘玉书的很深影响，又博采当时各家所长。其作品无论造型、姿态、神韵、表情、衣纹等，都有潘玉书的影子，但也有个人的独创，二者融为一体，终于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使人远远一望便知，不必翻看底款。如果说，潘玉书属于文静型、内秀型，富有书卷味；刘传则属于豪放型、外刚型，带着劳动者的气质。另一方面，他比前人还扩大了题材领域，除仙、佛、道、文士、仕女、八仙、七贤、《三国》人物等外，还及于《水浒》和各种神话、传奇的人物。过去艺人塑造男体都是瘦骨仙之类，他却能创作出迥然不同的如李逵、读书人、木鱼演唱者等等。他刻划当代人物，已基本上摆脱了过去拍蚊、挖耳、搔痒等市井小趣味，而表现现实生活的主要方面，这就为解决传统陶塑如何反映当今人物生活提供了可贵的参考资料。他不愧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代表者。

当然，随着时代风云的变幻，刘传各个时期的作品有所变化，有所差别，但总的趋向是发展着的。他现已年逾古稀，身体欠佳，仍创作不断，并运用各种手法，无论雕塑、捏塑、贴塑都有新的表现。他自小从艺，成名很早，创作从未有间断过（除了十年动乱中的前七年），因而其创作期之长，影响石湾之深，是前此陶艺名师中所罕见的。

三

刘传自学成材之道，既会“偷师”，更会积累生活，总结经验，上升为理论。

学习雕塑，应从何处入手呢？西洋方法是写石膏像，写模特儿，造成裸体人像，然后给其“穿上”衣服。石湾传统方法，却从另一方面开始：临摹。临摹别人的作品，目的不是抄袭、仿制，而是为了研究整件陶塑成形的程序，摸清各种泥土的特性，学会捏弄泥巴和运用“批刀”的本领。但这仅仅是一种技术训练。要进行创作，还得付出更大的劳动：积累生活，独立思考，总结经验。

刘传只读了两年私塾，原来识字不多，但他善于观察和思索，善于默记和分析。他从小就爱听讲故事，听说书，看粤剧，养成随时随地观察生活、思考问题的习惯。他认为，艺术来源于生活。对于生活百态和种种人物，要观察、默记、积累、分析、归纳。他说：“我们要学习前人，但必须跳出他们的框框，自己积累生活，有所创造。”怎么积累呢？他本人平日就喜欢蹲在码头渡口，墟边茶肆，观察各式人等，活像个看相先生。认真观察，默记在心，积累多了，默记多了，各个印象和形象在脑海中有个融会贯通、分解聚合的过程，就能抓住了各种典型的特征，认识也从感性上升到理性。观察有了个目标，抓住对象的特征；那么，一般的、无甚意义的就放过去，不必样样都记住。观察，往往是从对象最突出的“形”入手的，这样就更容易抓住对象的“神”。他说：“我们所记忆的形象不是零碎的杂乱无章的东西，而是已经归纳起来的典型。”石湾陶塑人像是最讲究

形神兼备的。他说：“神为主导，是形的依据，但形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因此有形不一定有神；但神是通过形来表达的，所以形似就会反过来突出神的境界。”例如他的一件代表作《弃官寻母》，那衰老、驼背、无齿、满脸皱纹的贫苦老太婆，就是他观察了众多邻居和镇上的贫苦老太婆加以概括而塑造出来的，看那神情多逼真啊！

观察并积累生活，当然是最主要的；但也需要借鉴其他间接的生活经验，例如吸收图画中的简练笔墨，粤剧中的表现手法，以至《麻衣相法》中的某些合理经验，而排除其程式部分与神秘部分。例如他另外的两件作品《虬髯公》和《李逵》，显然是受到粤剧里“二花脸”的脸谱和造型的影响，却又加以典型化的：二人看似相同，但各有各的个性。

关于人物的面形，他经过观察分析，综合为十个汉字（繁体）：由、甲、申、田、同、王、國、目、用、風。这十字各代表一定的性格：即隐逸自在、下流鬼祟、凶险狠毒，刚劲有力，清秀英俊，横行霸道，本领高强，温文尔雅，秀丽挺拔、潇洒超脱。它们又常互相交织融汇，演变成文武忠奸、邪恶美丑各种各样的人物来。这好像是一种新程式，但却来自对生活的归纳，如能适当运用，恰到好处，常常收到意外的效果。

其次，关于人们喜、怒、哀、乐时的面部线条不同的走向，关于人体运动过程中衣纹的起、伏、聚、散的变化，虚、实的相依，厚、薄的对比，他也归纳为“平、板、直”与“圆、弯、凸”和“向上、向下”这十个字。一般地说，线面的“平、板、直”代表静和刚硬；而“圆、弯、凸”则代表动与柔和。在人物形象表情方面必须有“圆、厚”与“尖、薄”之分，相对来说，“圆、厚”显得忠耿沉着，“尖、薄”使人感到轻巧精灵。但过份了，就会走向反面：“圆、厚”就会流于愚蠢或油滑，“尖、薄”就会流于刁诈和狡猾。任何事物，一般“向上”代表动。富于朝气威武，“向下”则代表坠落、衰败和消沉。人物的内心与外表，常是“内静则外动”，“外静则内动”。我们必须适当运用动中有静，粗中有细，强中有弱，起中有伏的辩证法。有的人物，实际上是表里不一的，则可以用“十清一浊”和“十浊一清”来处理。陈世美就是“十清一浊”，钟馗就是“十浊一清”，突出这一“浊”一“清”，就把典型性抓住了。至于衣纹，则必须掌握阴与阳、聚与散的对比关系。衣纹要服从身形及其动态，显出有起有伏、有聚有散等静止和运动的规律。

再次，陶塑人物都是个体造像，或双体、三体造像，更多的甚少。因此必须以小取胜，以有限表现无限。在其情节处理上：“宜起不宜止，宜藏不宜露”。“止”，是事物的终结，其意已尽；“露”，是事物的表象，无甚看头。而“起”，则是情节趋向高潮之际，引起观众的悬念；“藏”，是人物精神境界的根底，会使观众进行深入的思索。艺术品就是这样给予人们以最高的艺术享受的。例如《虬髯公与李靖》这件作品，刻划两人下围棋，虬髯公要“英雄吃四方”，李靖却“一子定中原”。虬髯公大发脾气，表现了侠士的气概，李靖温文尔雅，显示出儒将风度：两人形成了戏剧性的冲突，确是耐人寻味。

艺术创作需要夸张。石湾陶塑一般都是案头摆设，刘传认为尤其要夸张。这样作品的性格会更强烈，思想性会更深刻，主题会更鲜明，感染力也会更强。但夸张要有一定的原则：夸张应该在写实的基础上去夸张，夸张到一定程度便要适可而止。要做到四个

服从：一要服从真实的基础，二要服从主题的需要，三要服从艺术美的观点，四要服从视觉产生错觉的需要。就是说，夸张并不是西方现代派强调的“变形”，不是强加在对象上的“扭曲”。夸张应“有的放矢”和“适可而止”。例如对于某些人物的刻画，就要“奇而不怪”，“丑而不陋”。为了夸张以达到传神，突出主题，石湾陶像往往把头颅造得较大，但看起来你并不觉得它人矮了；又往往把某处肢干有意缩短或伸长，让你看起来并不觉得它不符合尺寸比例，反而获得更强的美的享受。刘传对此一语破的地说：“我们的艺术品是一种直觉艺术，制造出来是给人欣赏的，而不是让人用尺子去量的。”

总而言之，刘传不但是个人物陶塑家，而且是个艺术理论家。这理论从创作实践中来，自成体系，不是抄袭任何艺术教科书，且某些观点还与西洋理论相左。

珠海潮涨潮落，湾溪迂迴曲折。溪边的石湾镇也几经盛衰，其最低点是沦陷时期，艺人或死或散或改行，所剩无几，镇容破旧。龙窑坍塌，陶师庙也被拆毁。

解放初石湾镇渐有起色，但著名的人物陶塑还未得到恢复。中共石湾镇委成立不久，刘传家里来了几位客人，为首的是广州市第一任市长朱光，他细细问及刘传的生活和工作，还欣赏了他的几件陶塑，邀请他有空就到广州玩玩。不久又先后来了名画家黄新波、关山月、黄笃维，雕塑家尹积昌，工艺美术家高永坚和谭畅，深谈之余，请他出来参加工作。1952年广州人民美术社成立，由刘传负责领导陶艺生产的全面工作。数年之间，人物陶塑有了大发展，重新制造各种传统产品，刘传自己也创作出《屈原》、《杜甫》、《李白》、《鲁迅》、《苏武》、《武松》、《关汉卿》，新的《弃官寻母》、《东坡爱砚》、《虬髯公》以及著名的红釉《达摩》等，釉色品种丰富，石榴红、翠毛，大冰裂相继恢复。同时还培训了一批生产技术工人，带出了一代陶艺新秀。1962年刘传曾被邀请上京在中央美术学院讲学。十年动乱中，刘传被划为“反动权威”，接连受到无情打击与非人折磨，创作生涯被迫中止。1973年他算是获得了“第二次解放”，但直到“文革”结束后，政策才得到逐步落实。1979年全国评出34位工艺美术家，刘传是其中之一。他全家年前已经迁进宽敞的新居，有了捏造陶塑的工作室。其间，中央文化部和中央美术学院负责人曾来邀请他再次上京讲学，港澳知名人士与日本、美国等专家亲自登门拜访，加拿大有关方面还发出邀请，要他去访问参观。刘传两年前应澳门贾梅士博物院邀请，携旧作新作40余件前往展出，获得很大成功。过去他培养的一代新秀都已成了今天的中坚力量，庄稼、刘泽棉、廖洪标等均已饮誉海内外；受到他的影响和帮助而成长起来的刘藕生、刘炳、刘桂乐等，也已知名于国内外工艺美术界。现在刘传可谓桃李遍石湾，又形成自己一个世家。新秀们都姹紫嫣红，竞相争春。石湾人物陶塑和微塑又迎来了又一个繁荣期，年来多次组织产品送往香港展销，受到热烈欢迎，得到很高评价。今天，当这石湾人物陶塑之花在南国土地上开得更加灿烂夺目之时，人们将不会忘记把刘传的名字载入中国陶瓷史的。

作者单位：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

责任编辑：刘斯翰

明清江南市镇的实态分析

——以苏州府嘉定县为中心

樊树志

市镇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兴起的，它的发展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及乡村的城市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试图对苏州府嘉定县的市镇实态作一个粗线条的勾画，以个别来显示一般。

一、嘉定县市镇的发展与分布

宋嘉定十年，割昆山县东安亭、春申、临江、平乐、醋塘凡五乡27都，析置为县，“纪之以年，故云嘉定”，以练祁市为县治，故嘉定县又叫练川。^①据正德《练川图记》记载，当时有5市7镇：娄塘桥市、钱门塘市、广福市、瓦浦市、真如市。罗店镇、南翔镇、安亭镇、黄浦镇、大场镇、江湾镇、清浦镇。据正德《姑苏志》记载，嘉定县有9市6镇，除上述5市7镇外，另有：州桥市、新泾市、封家浜市、纪王庙市。而将安亭镇列入昆山县。其实该镇系两县合辖，一并列入，嘉定县在明正德年间共有9市7镇。

到明万历年间，嘉定县的市镇发展进入鼎盛时代，据万历《嘉定县志》记载，当时共有3市、6行、17镇。苏松一带的“行”，实质类乎市，一并计算，共有9市17镇：练祁市、钱门塘市、封家浜市、殷家行、陆组行、刘家行、吴家行、蒋家行、赵家行、娄塘镇、新泾镇、罗店镇、月浦镇、外冈镇、广福镇、大场镇、真如镇、杨家行镇、江湾镇、清浦镇、徐家行镇、安亭镇、黄渡镇、纪王镇、葛隆镇。正德年间的真如市、娄塘市、新泾市、广福市、纪王庙市，万历年间都升为镇；此外新增了月浦、外冈、杨家行、徐家行、葛隆等镇。而且万历年间市镇的繁荣程度也超过了正德年间。

从清初到清中叶，嘉定县市镇变化不大。到清末，嘉定县及由嘉定县析置的宝山县（雍正三年析置）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市镇又有新进展。嘉定县有6市18镇：封家浜市、陆渡桥市、朱家桥市、钱门塘市、望仙桥市、吴家行、南翔镇、纪王庙镇、江桥镇、栅桥镇、诸翟镇、马陆镇、石

冈门镇、戩浜桥镇、娄塘镇、唐家行镇、外冈镇、葛隆镇、方泰镇、安亭镇、黄渡镇、陆家行镇、新泾镇、徐家行镇。宝山县有2市11镇。一并计算，共8市29镇。^②

市镇的分布密度是很大的，形成了密如蛛网般的市镇网络，在沟通村、乡、市、镇、县、府各级市场的商品交流中，显示出它特有的功能与机制。如果以嘉定县治为中心，市镇的分布大致呈现如下态势：

离嘉定县治12里左右为第一层次：有朱家桥市、吴家行、马陆镇、石冈门镇、戩浜桥镇、娄塘镇、外冈镇、新泾镇、徐家行镇。

离嘉定县治18里左右为第二层次：有陆渡桥市、望仙桥市、唐家行市、葛隆镇、方泰镇、陆家行镇、罗店镇。

离嘉定县治24里左右为第三层次：有钱门塘市、南翔镇、安亭镇、广福镇。离嘉定县治36里左右为第四层次：有封家浜市、纪王庙镇、江桥镇、栅桥镇、黄渡镇。

如果以某个繁华市镇为中心，把它与周围市镇的联系显示出来，也会呈现类似状况。以地处嘉定、青浦、上海三县之间的黄渡镇为中心，大体以12里至18里为间距形成市镇网络：东至南翔镇、东南至纪王庙镇、南至观音堂镇、西南至章堰镇、西至白鹤江镇、北至安亭镇、北至方泰镇、东北至马陆镇。^③以南翔镇为中心，形成的市镇网络也相类似：东至陈家行、西至黄渡镇、北至马陆镇、东南至大场镇、东北至广福镇、西南至纪王庙镇、西北至方泰镇。^④以方泰镇为中心，与附近市镇的间距也不超过24里：东至石冈门镇、东南至马陆镇、南至南翔镇、西南至黄渡镇、西至安亭镇、西北至望仙桥镇、北至外冈镇。^⑤

二、“银南翔”与“金罗店”

嘉定县的市镇中经济最发达的当首推南翔镇与罗店镇，这两大镇素称富饶，“有金罗店、银南

翔之名”。⑥

南翔镇位于嘉定县治南24里，宋元时已成巨镇。明代前期，南翔已成为嘉定7镇中之佼佼者。嘉靖间倭寇迭至，乡村多遭焚掠，万安寺以南民居屋宇被毁殆尽。隆庆、万历年间逐渐复兴，成为棉布业贸易中心，镇上徽商丛集，从事棉布贩卖，经济日趋繁荣。万历中，徽商受“无赖蚕食”，“稍稍徙避”，南翔镇的盛况一度受到影响。清初，南翔镇再度出现繁荣的市面，“生齿日繁，廛舍日扩，镇东新街南、黄花场北、金黄桥外，渐次成市”。⑦时人描述其盛况：“四方商贾辐辏，廛市蝉联，村落丛聚，花、豆、米、麦、百货之所骈集”。⑧

全镇东西5里、南北3里，镇中为十字港——四条水道（横沥、上槎浦、走马塘、封家浜）相交于镇中心，有太平、泰康、吉利、隆兴四桥相连，成为南来北往、货物集散之枢纽。以十字港为中心，镇中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延伸的街道密布。东有走马塘南岸街、北岸街、新街；西有封家浜南岸街、北岸街；南有白鹤寺南街、太平桥南街（西岸米巷街、东岸混堂街）、横街、黄花场街；北有横沥西岸街、东岸街、约浦街（明时为大街，直达镇北冈身路）。⑨另有与大街相贯通的小街41条，构成这个繁华的商业中心的街市。

嘉定县境内向以棉业闻名，棉花“通邑栽之，以资纺织”，所织棉布有紫花布、斜纹布、药斑布、棋花布、诸暨布、胜花纹布等，尤以药斑布、棋花布为畅销品、药斑布，“以布抹灰药染青，俟其干去之，则青白相间，有楼台、人物、花鸟之形，为帐幕衾幌颇佳”；棋花布，“以青白缕间，织如棋杆”。“商贾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⑩而嘉定棉布的集散中心，首推南翔镇。

南翔镇四乡所产刷线布，又名扣布，“光洁而厚，制衣被耐久，远方珍之，布商各字号俱在镇，鉴别尤精，故里中所织甲一邑”。⑪镇上布商字号，大多由徽州商人经营，在收购棉布之后，贩运于江淮，临清间。⑫南翔镇的棉布交易额在嘉定一县中遥遥领先，故当时人谓“布商莫盛于南翔，娄塘、纪王镇次之”，“布商南翔镇较娄塘、纪王镇为盛”。⑬

除了棉布业外，其他行业如棉花业、粮食业、百货业等也十分发达。南翔一带，“地不产

米”，“仰食外郡”一旦“商运不通，米价骤增”，⑭镇上米牙、米店、米客甚多。嘉庆九年有灾荒，米价猛涨至每升四五十文，“南翔各米铺以食户计，存粮可支三日，民心惶惶”。⑮由此可见南翔镇及其四乡成为棉纺织专业地区之后，粮食的商品化程度日益增大，对商品粮的依赖性也日益增大。由于商品粮交易额巨大，不断有外地粮食运至镇上，由脚夫卸运，“肩挑背负任彼定价，横索惟恐弗得其欢心，以致货物壅塞河干，市口遂酿成彼等骄横之习，日盛一日，而米客受其笼络，米店受其凌虐，米牙受其挟制”。⑯米客、米店、米牙与脚夫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正反映了南翔镇粮食业的经营特色。

南翔镇规模巨大，它名为镇，实具县城规模。康熙时人说：南翔镇“盖东南一都会也，市井鳞比，舟车纷繁，民殷物庶，甲于诸镇”。⑰镇中建置颇多，有分防县丞署，乃嘉定县丞分防于南翔的机构；有大中丞赵公书院（又称惠民书院）、邑侯马公讲院、槎溪小学及义塾；另有文昌阁、关帝庙、东嶽庙、州城隍庙、城隍庙、火神庙、龙王庙、土地祠、育婴堂等。

南翔镇自明以来文化昌盛，人材辈出，蜚声江南。明成化年间在太平桥北建科第坊、天恩桥西太平桥北建进士坊，万历年间在云翔寺南建两世伯坊、在方伯坊南建司马中丞坊，足见当时科第之兴旺。明清两代这个镇涌现了大批文人墨客，如贡生，明代有14人，清代有20人；举人，明代有16人，清代有19人；进士，明代有10人，清代有7人。⑱文人雅士荟萃，无不兴建园林。如李流芳在北市所建檀园，“短筑墙垣仅及肩，多穿洞壑注流泉”，为南翔胜景之一。又如通判因士籍建于东里的猗园，后归贡生李宜之，乾隆间叶锦重葺，更拓其地，改称古猗园，至今仍为南翔名胜。此外如计民园（后改名为来鹤园）、怡园、巢寄园、桐园等亦堪称江南名园。⑲

罗店镇位于苏松二府交通要道，元至元年间，本地人罗升在此构筑店铺、市街，称为罗店，逐渐由市成镇，至明万历年间与南翔街并称嘉定巨镇。万历《嘉定县志》称它“比闾殷富，今徽商湊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⑳

从万历至康熙年间，罗店镇作为一个棉布贸易中心，吸引了大批徽州商人。罗店镇四乡盛产棉花，“有金底者，每斤收衣六七两”，另产紫棉，俗呼紫花，结实大如桃，中有白棉。当地人说：

“罗店四乡土产稻七棉七，农民生计惟赖木棉”，“种田之暇惟以纱为布”，“妇女昼夜纺织，公私诸费皆赖之”。^②所产布匹品种很多，有套布、洒泾布、紫花布、斜纹布、棋花布，由徽商贩运转销各地。镇上经营棉布、棉花贸易的牙行称为布行、花行，遍布交通要道。除了布行、花行之外还有柴行、米行、猪行等。^③

在繁荣的市镇经济刺激下，罗店镇闹市区茶楼酒肆林立，成为社交与信息中心，也成为娱乐与赌博场所。

吃讲茶——牙侩、商贾们在经济事务中遇到纠纷，常至茶馆评理，俗称“吃讲茶”。《罗店镇志》说：“俗遇不平事，则往茶肆争论曲直，以凭旁人听断，理屈者则会出茶钱以为罚，谓之吃讲茶”。

赌博——“聚众博赌曰头家，道光、咸丰间此风最盛，……近日乡村开设茶馆，渐起赌博，大则荡废家产”。^④

每年棉花、稻谷登场之际，罗店镇及其四乡，“好事者以敬神为名，搭台演戏，甚有两台对峙，两班同演，名曰鸳鸯台。家家邀亲请戚，有力者宰杀猪羊，无力者亦必典质衣物，以供酒者。甲图演罢，乙图接踵而起”。^⑤这种景象从侧面反映了罗店镇经济繁荣，棉花、棉布购销两旺的盛况，同时也反映出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奢侈挥霍陋习。时人曾指出，此种敬神演戏，导致“男荒耕作，女废纺织，浪费银钱，动以千计”。^⑥此外还有斗蟋蟀，斗鹤鹑，每岁秋深，里中无赖辈开设栅场斗蟋蟀谓之秋兴。与斗者论定花数之多寡，然后赌胜负，主人则按数取头钱。至冬，开设圈场，斗鹤鹑，谓之冬兴。所赌亦如之。自他处来斗者，谓之客党；本人嫌花数过多，旁人接认者，谓之帮花；于花数外另以钱洋分胜负，谓之放彩，动以千计”。^⑦

市镇经济的兴旺发达促使节序习俗也发生了新变化，显示出市镇特有的色彩，罗店镇也不例外。正月十五上元节，各庙宴堂，庙前设立塔灯两座，游人往来不绝，田家檐前高插竹竿，竿头悬灯，谓之“照田财”。花炮齐鸣，龙灯盘绕，锣鼓通宵不绝。又有男扮女妆，游行街市，称为马灯。二十日，为棉花生日，宜晴，谚云：“雨打正月廿，棉花弗上担”。五月初五日，竞渡龙舟，镇中有龙舟五六艘，旗仗鲜明，锦彩夺目，在嘉定、宝山一带首屈一指。^⑧这一切，都给罗店镇

涂抹上一层眩目的色彩，带有商业市镇特有的生机。镇中“阗阗喧器，日睹贾舶商车之盛，街衢综错，宛成棋枰倚脉之形”。^⑨

从全镇的布局结构看，主要街道有：亭前街、南街、集贤街、东南弄、塘西街、塘东街、北街、西巷街、西西巷街、市场街和横家。此外还有南弄、唐家弄、邱家弄、邓家弄、花园弄、水果弄、韩家弄、篮巷、赵家巷、韩家巷、蒋家巷、拾琼湾、钓船厂、滩船厂等。镇中河道交错，练祁为贯穿全镇大干河，西杨泾、界泾为镇西境干河；马路塘、荻泾、潘泾、顾泾为镇东南境干河；大川沙、小川沙、大理港为镇东北境干河；界河口、墅沟、潮塘为镇北境干河。这些河道使罗店镇与四乡村庄及邻近布镇连成一体。跨越这些河道的桥梁与镇中大街小巷连接，成为闹市所在，使罗店镇具有县城的规模，而盛极一时。

镇上名流巨宅自明代以来屡见不鲜，其中较显赫的有：春阳堂——明处士黄通理读书处；玉芝堂——明职方郎中应景亮致仕后与弟景南读书处；简堂——明马调元旧宅；江楼——清初范光启筑，乾隆五十四年曾孙朝佐重建；百城楼——范洪铸筑，太仓毕沅、长洲沈德潜诸名士时相过从；默雷堂——进士施灏旧宅，后圃为毕沅读书处。^⑩

明清两代科第兴旺，人文蔚起，进士及第者六人，中举者30人，^⑪不愧为金罗店之誉。

其他市镇与上述两镇情况大致相似，不再详述。

三、市镇的运行：客商、牙行与脚夫

由于地理条件与农业经济诸因素的决定作用，嘉定县的诸市镇具有共同的特色——以棉布业及棉布交易为支柱的市镇经济，是导致市镇兴盛的重要基础。苏松一带的棉布成为“衣被天下”的名品，使棉布业市镇在明清两代盛极一时，成为万商云集的经济中心地。

在市镇经济结构的运行中，客商、牙行与脚夫是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

在嘉定县棉布业市镇中经营棉布贸易的商人集团，首推徽州商人，几乎各大市镇均可见到徽商的踪影。例如：南翔镇，“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⑫罗店镇，“今徽商湊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⑬外冈镇，“因徽商僦居钱鸣塘

(即钱门塘)收买,(外冈布)遂名钱鸣塘布”;^③钱门塘市,“明时有徽商僦居里中,收买出版,自是外冈各镇多仿之,遂俱称钱门塘布”。^④

徽商在这些棉布业市镇上进行贸易,都挟带巨额资金,正如叶梦珠所说:“富商巨贾操重而来市者,白银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⑤

牙行是市镇经济结构的中枢,操纵市镇经济的运行。“市中贸易,必经牙行,非是,市不得鬻,人不得售”。^⑥“贫民持物入市,不许私自交易,横主索值,肆意勒索,名曰佣钱”,举凡“花、布、柴、米、纱、縲,下及粪田之属,皆有牙行,类皆领帖开张”。^⑦

在棉布业市镇上最有财有势的当推布行,“牙行非藉势要之家不能立”。^⑧各地客商大多通过牙行之手收购布匹,或是“各省布商先发银于庄(按布庄即布行),徐收其布”;^⑨或挟带资金到各市镇直接向牙行购买布匹现货。^⑩

牙行一方面凭借势豪之家撑腰,另一方面自持经济实力雄厚,常常成为地方一霸,称为行霸。牙霸把持行市,花行、布行、柴行、米行、猪行均有行霸,擅自抬高或压低市价,“擅取用钱,卖者买者各有抑勒,曰内外用”。^⑪此类行霸可以说是各市镇都有,成为“市镇之民害”,他们“私立牙行,高低物价,擅取用钱,买者卖者各有除勒,名曰内用、外用,结连光棍,邀人货物,卖布者夺其布,买花者夺其花,乡人不得自由”。^⑫有的行霸为了把持行市,垄断一方,“其所用秤、斗,不与常同,故称名亦异其称,曰桥秤、桥斗”。^⑬

牙行是市镇上新兴势力与守旧势力的混合物,带有自相矛盾的两重性,一方面在助长商品经济的发展,借以从中获利;另一方面却用自己的手破坏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

与牙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脚行。脚行是市镇上从事搬运的脚夫的行帮组织,上有脚头,下有脚夫,在市镇上把持地段,肆行勒索。南翔镇上,“所以拳勇之患,脚夫为甚”,“肩挑背负任彼定价横索,惟恐弗得其欢心,以致货物壅塞河干市口,遂酿成彼等骄横之习日盛一日”。^⑭江湾镇上,脚夫“什百为群,投托势宦,结纳豪奴,私自分疆划界。凡商民货物横索脚价,稍不如意,则货抛河下,无人承挑,商贾裹足”。^⑮罗店镇上,东西南北四角乡人入市孔道,遍布脚行,各有一

块地盘,把持勒索,“一切货物出入铺户不得自行挑运”,从中勒索脚价,“甚至婚嫁、丧葬,鼓手、炮手、轿夫、脚夫私分地界,把持勒索”。月浦镇上,脚夫人等,每遇民间婚嫁丧葬,私分地段,任意抬高工价,“且以私自所分地段,父子相承,称为世业”。^⑯

清初以降,官府屡有禁令,在各市镇上勒石刻碑,但屡禁不止,反映了脚夫、脚行在市镇上的根深蒂固。其实这种现象乃是市镇经济繁荣的产物,市镇经济繁荣一日,此种现象就永远无法禁革,表明它作为市镇经济结构运转中的润滑剂,是不可或缺的。

与此相关的“打降”、“白拉”现象,其根源也在于此。《南翔镇志》载:“市井恶少无赖所谓打降、白拉者,是处有之,南翔为甚。打降逞其拳勇,凡抢亲、扛孀、抬神、扎诈诸不法事,多起于若辈。白拉聚集恶党,潜伏道侧,候村民入市,邀夺货物。或私开牙行,客商经过,百计诱致,不罄其资不止”。^⑰显然,如果没有牙侩、行霸的指使、怂恿,“打降”(或曰“打行”)、“白拉”之类恶习决不可能在市镇上横行无忌。康熙时长洲人褚人获引用《亦巢偶记》说:“打行,闻兴于万历年间,至崇祯时尤盛”,“鼎革以来,官府不知其说,而吏胥又不晓文义,改作降字”。^⑱万历年间范濂也说:“恶少打行,盛于苏州。……此风沿入松,以至万历庚辰后尤甚。又名撞六市,分列某处某班,肆行强横”。^⑲可见这种社会现象是伴随市镇经济的繁荣而出现的,入清以后愈演愈烈。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在江南任巡抚的余国柱曾严禁打降,他所公布的《严禁打降移文》指出:“照得打降之为害地方,惟三吴有其事,遂有其名。询其根由,始于游手无赖各霸一方,城镇乡村无处不有”,“倚靠势力为城社,结连衙蠹为腹心,彼既持有护身之符,尚何畏乎三尺之法”。^⑳然而,打降、白拉犹如脚夫横行一样屡禁不绝,这不仅由于他们倚仗权势,还因为他们是三位一体的。南翔镇上就有康熙二十七嘉定知县闻在上奉巡抚田批示勒石的《严禁脚夫打降碑》,^㉑从中透出脚夫与打降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直至光绪年间,嘉定县还在各市镇严禁轿夫、脚夫、吹手、炮手人等,私分地界,把持勒索,^㉒足见从康熙年间以来的各项禁令犹如一纸空文,陋习依然如故。值得注意的是,当清末民初这些市镇的经济渐趋衰微之后,此种社会现象也不禁而绝,消声

匿迹了。由此可见，打降、白拉以及行霸的操纵行市、脚夫的私分地界诸种社会现象，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市镇经济的繁荣，一旦繁荣消失，陋习也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

- ① 正德《练川图记》卷上建置。
- ② 光绪《嘉定县志》卷一建置。光绪《宝山县志》卷一市镇。
- ③ 咸丰《黄渡镇志》卷二疆域。
- ④ 嘉庆《南翔镇志》卷一疆里。
- ⑤ 嘉庆《方泰志》卷一街市。
- ⑥ 光绪《罗店镇志》卷一风俗。
- ⑦ 嘉庆《南翔镇志》卷一疆里。
- ⑧⑩④① 石崧，《公建抚宪赵公长生书院碑记》，嘉庆《南翔镇志》卷二营建。
- ⑨ 嘉庆《南翔镇志》卷二营建。
- ⑩ 万历《嘉定县志》卷六物产。正德《练川图记》卷上物产。
- ⑪ 嘉庆《南翔镇志》卷一物产。
- ⑫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十八，《例授昭勇将军成山指挥使李君墓志铭》。
- ⑬ 光绪《嘉定县志》卷八风俗。民国《嘉定县续志》卷五风俗。
- ⑭⑮ 嘉庆《南翔镇志》卷十二杂志。
- ⑰ 彭定：《留婴堂序》，嘉定《南翔镇志》卷二营建。
- ⑱ 嘉庆《南翔镇志》卷五选举。
- ⑲ 嘉庆《南翔镇志》卷十一杂志。

- ⑳㉓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市镇。
- ㉑ 光绪《罗店镇志》卷一物产、卷一风俗。康熙《嘉定县志》卷四物产。
- ㉒㉓㉔㉕㉖㉗㉘ 光绪《罗店镇志》卷一风俗。
- ㉙ 光绪《罗店镇志》卷一节序。
- ㉚ 光绪《罗店镇志》卷二街巷。
- ㉛ 光绪《罗店镇志》卷三第宅。
- ㉜ 光绪《罗店镇志》卷四选举志。
- ㉝ 康熙《嘉定县志》卷一市镇。
- ㉞ 崇祯《外冈志》卷一市镇。
- ㉟ 民国《钱门塘乡志》卷一土产。
- ㊱ 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六。
- ㊲ 嘉庆《安亭志》卷二风俗。
- ㊳ 光绪《月浦志》卷九风俗。
- ㊴㊵ 《阅世编》卷七食货五。
- ㊶ 咸丰《紫堤村志》卷二风俗。
- ㊷ 康熙《嘉定县志》卷四风俗。
- ㊸ 嘉庆《安亭志》卷二风俗。
- ㊹ 民国《江湾里志》卷三徭役。
- ㊺ 民国《月浦里志》卷四风俗。
- ㊻ 嘉庆《南翔镇志》卷十二杂志。
- ㊼ 褚人获：《坚瓠九集》卷二。
- ㊽ 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
- ㊾ 康熙《江南通志》卷六十五艺文。
- ㊿㉑ 光绪《嘉定县志》卷二十九金石。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凌峰



寻找中国纯艺术精神的根

刘绍瑾

在东西文化大碰撞的时代，王国维被认为主要是以西方美学思想来建立其超功利的纯艺术理论的。然而，这就使我们不禁疑问：难道中国没有纯艺术精神的传统吗？王国维在接受康有为、叔本华、席勒思想的同时，有没有不自觉地受到中国艺术精神的浸染？如果有，这种纯艺术精神的根又在哪里？港台学者徐复观教授认为：“老庄思想当下所成就的人生，实际是艺术地人生。而中国的纯艺术精神，实际系由此一思想系统所导出。”^①徐教授把中国纯艺术精神与人生联系起来，这是极有眼力的。中国纯艺术精神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就在于此。但是，徐教授把中国纯艺术精神的来源统归老、庄，则是我们不能赞同的。实际上，这里正表现了同为道家思想的老、庄的不同之处。老子思想总是从对立的两端出发，而以清虚、柔弱为立于不败的根本，理智、计算是其主基调。毫不奇怪，充满祸福、成败、得失的计较之心的老子思想被人当作阴柔权变之术、“君人南面之术”。与之不同，庄子则要彻底超越一切对待、计较，以达到一种自由、快乐的审美化人生境界。《庄子》的创作不是以政治功用为目的，而主要是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自快”、^②“自适”、“自娱”而已。所以司马迁指出庄子的文章“汪洋自恣以适己”。^③《庄子》正是一部摆脱了外在功利目的的娱情悦性的奇文。其书瑰玮奇特而“连犽无伤”，其辞参差错落而“淑诡可观”，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的思想“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大有迳庭，不近人情”，与现实人间有很大的距离感。因此，对《庄子》一书，以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王公大人不能器之”。^④思想的艺术色彩、人生态度的游戏性、著书目的的审美化，在庄子那里和谐地统一起来。因此，只有庄子所成就的人生，才是“艺术地人生”；中国的纯艺术精神，只是从庄子这一思想系统所导出。

庄子，正是我们所要寻找的——中国纯艺术精神的根。

—

笔者对庄子思想有一个基本的看法，那就是庄子把老子哲学发展为具有浓厚的美学味道的思想，从而虽思想源于老子，但又与老子呈现出极大的不同。具体来说，庄子思想面对大动乱时代人们的苦难、忧患和自我异化，旨在谋求一种超越苦难、忧患、消除自我异化而自由、快乐的人生境界。《庄子》是解脱的哲学，是苦闷的象征。

在“道”的本体论哲学上，庄子发挥老子的“道”这一概念，然重在“体道”的精神境

界。这也是一种自由的审美境界。

在政治观上，所谓的“无为而治”在庄子那里是一个矛盾的组合体。“治天下”在庄子看来是人生之“累”，故书中渲染了一些“不事于世，独乐其志”的狂世隐士。所谓的政治观，在庄子那里是不存在的，如果说有的话，那都被艺术化了。

剩下的只是人生哲学——求自由、超脱的思想。而庄子的人生追求一种超越世俗物欲、生死，主张与现实物质世界在精神上的距离感，这在实践上具有浓厚的悲观宿命的消极成份，然却与艺术的审美特征具有相通之处。正是这种相通之处，使庄子的哲学走进了美学的领域。后人也就很自然地把庄子那些带有美学色彩的人生哲学问题移植到艺术的审美特征的理解中，从而使庄子的哲学命题获得了新的意义。所以，庄子思想是一种“诗化哲学”，是一种人生——艺术哲学。

这一哲学——人生——美学体系的网络是由“游”、“忘”、“虚静”、“物化”这四个网结组成的。

“游”之一字，古今庄学研究者颇为注意，甚至有人把“游”作为《庄子》的通义。^⑤然而，他们大多是从哲学角度来展开论述的。实际上，庄子的“游”更多的是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是一种超越了现实人间的一切关系之后所达到的自由快适之感。它有如康德所说的那种与感官生理的快感无涉、不夹杂理性判断、没有目的的合目的性的纯粹审美快感。前人注庄，窃以为林希逸和徐复观的解释是值得注意的。林希逸认为“游”是“自乐之意”，且以一“乐”字来统摄《逍遥游》的意旨。^⑥徐复观教授认为：“无所系缚”的“游戏之游”，是庄子“所用游字之基本意义”。^⑦两解都颇合庄意，而林希逸的解释虽简单二字，却更切庄旨。《庄子》中就有“自适”、“自得”、“自娱”、“自快”之说，这些都是“游”的最好注脚。在《庄子》中，“游”常与心连用。如“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人间世》）“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应帝王》）“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于德之和”。（《德充符》）这里的“游心”即心之游。“游”不是肉体的飞升，只是精神的逍遥、心灵的容与。“养中”与“不知耳目之所宜”，都说明“游”与外界无关，只是内心的自足自乐。所谓游乎“无何有之乡”，游乎“尘垢之外”，游乎“方之外”，都只是个人没有系缚的自由的境界。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庄子并没有在空间上远游，而只是即自的超越。这种即自的超越，是以“忘”字来穷尽其趣的。所以，“忘”成为庄子人生——艺术哲学的重要一环。“忘”是“游”的必要前提，没有“忘”，也就展开不了“游”的“翅膀”。在《庄子》中，“忘”有多种同义表达，“外”、“丧”、“遗”、“遗”、“堕”、“黜”、“无”等都是这个意思，以表示对现实感官物欲和是非纷争的审美超越。

概括起来，庄子的“忘”主要有如下内容：

1) 由于当时对人的精神自由的巨大压迫来自政治，故庄子主张忘怀治天下之心以及与之相应的一系列典章、教化形式。这就是“丧天下”、（《逍遥游》）“无公朝”、（《达生》）“忘仁义”、“忘礼乐”、（《大宗师》）“忘是非”、“不敢怀庆赏爵禄”、“不敢怀非誉

巧拙”。（《达生》）

2)由于当时人们对感官生理欲望的追求使人丧失了自由，扰乱了人心灵的平静，故庄子主张人们必须“离形”、“堕肢体”、“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大宗师》）“洒形去欲”。（《山木》）

3)政治事功的纓心也好，物质欲望的追求也好，都因为有心智在运动；功名利禄造成人心的不安，都是因为“我”在作怪。因此，对人事斩草除根的超越是“无己”、（《逍遥游》）“丧我”、（《齐物论》）“无听之以心”、（《人间世》）“去知”、“黜聪明”。（《大宗师》）

这样，“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刻意》）无不忘，留下的只是一片精神的自足，得到的只是一种超越了生死之外、超越了感官物质欲望、与宇宙自然同化的“至美至乐”。（《田子方》）

哲学界广为人们所探讨的庄子的“虚静”这一术语，只有从“忘”的审美意义上，才能得到解决。最集中表现庄子“虚静”思想的，是在《庚桑楚》篇中：

彻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之道塞。富贵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

这里的“勃志”、“谬（同缪）心”、“累德”、“塞道”互文见义，而去“四六”，则从各个角度表达了对现实追求、现实分际的超越。“四六者不荡胸中”，实际上就是前面所说的“外物”、“离形”、“无己”、“去知”。去此“四六”，就进入了“虚静”的境界。这一“虚静”之心，有如叔本华所言的“纯粹的主体”心态，它是进行艺术直觉的必要前提。

从“虚静”到“物化”，这是庄子人生——艺术哲学的必然归宿。在人与物的关系中，由于不以欲念、实用之心来观物，而是采取一种非占有的审美情感态度，故能达到物我两忘、物我同一的极诣。正如王国维所说的那样：“苟吾人能忘物与我之关系而观物，则夫自然界之山明水媚、鸟飞花落，固无往而非华胥之国、极乐之土也。”^⑧这里的“忘物与我之关系”，也就是庄子的“外物”、“丧我”，也就是“虚静”。庄子认为，由于“外物”、“丧我”，故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天下》）缩短物我之间的距离，达到“与物为春”、（《德充符》）“与物有宜”、（《大宗师》）“其于物也，与之为娱”（《则阳》）的审美境界。著名的“庄生梦蝶”这一寓言故事所揭示的道理，正是以梦——幻觉的形式来表示对物欲之我的超越。他能达到“自喻（愉）适志”的极乐境界，只是因为“不知周也”（即忘我）。所以庄子说：“此之谓物化”（《齐物论》）

二

用现代美学的眼光来看，庄子的上述思想体现了一种直觉主义的纯艺术精神。“外天下”、“外物”、“外生”之后，就进入了一个大清明的“朝彻”胜境。“朝彻，而后能见独。”（《大宗师》）郭象注解道：“忘先后之所接，斯见独者也。”可见，“见独”就是超越了时

间、因果、关系之外的直观体悟独立无待的至道的境界。庄子这一“见独”与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所揭示的艺术审美活动中的直觉有相同的特征。王国维在《叔本华与尼采》一文中就运用叔本华的理论，谈到了审美直觉的特点：“捨其静观之对象而使之孤立于吾前，空间时间之形式对此而失其效，关系之法则至此而穷于用。”这一审美直觉与庄子对“道”的直观体悟的可沟通性是非常明显的。而“道”尽管被庄子说得迷离恍惚，得道之人也涂上了神仙色彩，但只要我们“知人论世”、“披文入情”，就会发现，庄子的“道”与其说是一个单一抽象的、可以下明确定义的纯粹性概念，倒不如把它看作一个含义丰富、生气勃勃的、夹带着强烈情感和直观感受的理想。在庄子看来，游心于“道”，就是“至美至乐”，“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田子方》）所谓的得道之人（“至人”），就是有一套超越人间的一切分际和烦恼的本事，不为功名利禄和生死存亡而动心、具有一种坚强深厚和一致性的主体情致的那一种人，他们大概有如叔本华所谓的具有对世界采取“纯粹的观照态度”的那种艺术天才！庄子的“道”不是悬在天上，而是安放在人间万物。它“无所不在”，甚至在“屎溺”，主要看你能否体悟到它。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只要你有“忘”的工夫，有“虚静”之心，你就能进入这一审美直觉的“见独”之中，以每一感觉世界的事物自身看出其超越的意味，从物中见美，于技中见道，在有限、短瞬之中领悟无限、永恒。

这种直觉主义体现了浓厚的纯艺术精神。如果我们以西方直觉主义、纯艺术论的集大成者克罗齐的理论对庄子的纯艺术精神进行“阐发研究”，就会发现两者有着不期然而然的汇归处。象庄子所成就的从“忘”到“游”的艺术人生一样，克罗齐也对艺术的外层联系进行了逐层的剥夺。通过剥夺，使艺术成了纯而又纯的东西。他有几个著名的对艺术的否定性定义，而且几乎每个定义都是与庄子“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首先，克罗齐主张艺术不是“物理的事实”，^⑨而这也包含着他对艺术传达媒介的作用；庄子则在言意关系中否定了语言表达“意”的可能性，因而主张“无言”、“忘言”。第二，克罗齐认为艺术“不可能是功利的活动。”“因为功利的活动总是倾向求得快感和避免痛感的，所以，考虑到艺术的本质，艺术就和‘有用’、‘快感’、‘痛感’之类的东西无缘；”而我国的庄子在谈到他的理想人生时，最反对的莫过于功名利禄、感官物欲对人心的压迫。他否定当时的音乐，就是因为它太繁滥了，只能引起一种感官的快乐。他以“离形”、“堕肢体”、“洒形去欲”等独特术语否定了感官生理欲望的追求，以“丧天下”、“无公朝”等概念表达了艺术的人生与政治是格格不入的。第三，克罗齐主张艺术不是“道德活动”，他从此出发，批评了一些人把美与善联系起来的倾向。他认为，“说艺术的目的在于引导人趋善避恶、改良风俗”，是与艺术的特征背道而驰的；这使我们马上就想到了庄子否定文化的论调。而他否定文化的主要原因，正是与文化相联系的教化使人去追求流行的典范而“殉外丧内”、“逐伪忘真”，丧失了自己内在的自由。因此，他把“忘礼乐”、“忘仁义”、“善恶两忘”作为与道合一的先决条件。第四，克罗齐主张艺术不是概念的或逻辑的活动。艺术既是直觉，直觉是不依存于概念的；而我国的庄子则与之相似。庄子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一门美学，其“至人”与“道”的关系，与其说是一种认识论的关系，毋宁说讲的是一种直觉境界，而这种境界是反对概念、名辩的参入的。“物化”即是如此。著名的“濠上之乐”（《秋水》），就写出了庄子观赏事物的艺术心态与惠子分析事物的认知心态的对立。庄子直观从容出游的儵鱼，不觉内忘己身，外忘时地，自己与游鱼化为一体，故发出了“是鱼之乐”的审美感叹。而惠子偏要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样距离物我、以我为中心来分析事物的认知性语言诘问庄子。所以他们两人显得格格不入。实际上，庄子也同样把“去知”（忘掉分解性的、概念性的知识活动）作为“体道”的人生的重要条件。

明乎此，我们就会看清庄子美学思想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对中国文艺思想产生深远影响的庄子，所以对美、对乐、对情却持否定态度。实际上他否定的只是世俗的、具有功利色彩的浅薄之美、感官之乐、物欲之情，在否定的背后却在追求一种超越世俗物欲之上、具有纯粹审美性质的“大美”、“天乐”、“至情”！因为世俗之美、之乐、之情是建筑在感官物欲的享受之上的，是“物之倘来”（《缮性》），是“为物逆旅”（《知北游》），是“物役”即为物所异化的结果。庄子之否定艺术，否定的只是人造的、功用化的艺术，而以其审美的人生态度在追求一种与造化同工的纯粹的艺术精神。庄子对美、对艺术的否定，并不如人们所说的是艺术理论的退步，而是艺术理论思维的一大进步！

三

然而，庄子的纯艺术精神又与克罗齐的纯艺术论有着重大的不同。这一不同的基点在于：克罗齐是从其思想大体系出发，把美学与逻辑学、经济学、伦理学绝然分开，从而建立起其直觉主义的纯艺术论的；而庄子则不是以美和艺术作为对象进行理性思考、体认，而只是顺着大动乱时代人生所受的象桎梏、倒悬一样的痛苦、异化中，怎样得到自由快乐这一人生问题展开的。由于这一基点的不同，就使庄子与克罗齐的纯艺术论具有如下差异：

第一，克罗齐把艺术直觉降到最低级的感性认识阶段，而庄子则在成就其艺术化人生时，把直觉当作至高的、也是唯一的达到理想的体道形式，在直觉中，宇宙、天地、自然、人生、艺术合而为一。

第二，在西方，纯艺术论总是与形式主义结下不解之缘。而庄子的纯艺术精神却是与形式主义文风无涉的。它毋宁是一种反形式主义的艺术精神。因为在庄子看来，形式的雕琢是对自然大全之美的一个极大斫伤。而中国形式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无病呻吟、模拟古人、堆砌典故、卖弄学问，在用字、对偶、音律上作文字游戏。这种形式主义文风，是与庄子的纯艺术精神背道而驰的。

与克罗齐相比，庄子的纯艺术精神由于是以其人生观中透露出来的信息（这一信息在后来的文学发展中很快引起了强烈的反馈），不象克罗齐那样以明确的概念表述出来，这是其不足；然而正是这种不足，却又成为以庄子开始的中国纯艺术精神的优势和点：中国文学的纯艺术精神正是把人生与艺术联系起来，使其具有生命色彩和宇宙情

调。普列汉诺夫指出：“艺术家和对艺术创作具有浓厚兴趣的人们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是在他们与周围的环境之间的无法解决的不协调的基础上产生的。”^⑩ 闻一多先生指出，庄子“由反抗现实而逃到象牙塔中。”^⑪ 庄子幻想建立其艺术化人生天地，正是人与社会、人与命运、理想和现实强烈对抗中找不到出路的结果，它是人世苦难、忧患的曲折反映和情感升华，是苦闷的象征。“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庄子就是这样一位独特的哲人和诗人，他有一种常人所缺少的对苦难的敏感，深刻体验到人世的痛苦和人生的“大哀”，将在生活中体验到的痛苦和忧患提升到一种形而上的、人类痛苦的高度加以艺术表现。这种人生的哀怨之声不但有别于儒家以“刺”为核心，以道德和政治为内容的具有尚用色彩的“怨”情，而且比屈原的“离忧”具有更深沉、更普遍的人生内涵。清人胡文英就说庄子之怨较之屈原，具有“在天下”、“在万世”^⑫ 的普遍性和永恒性。它不仅对统治阶级的残暴进行了深刻的抨击，而且还对人的本质被异化、人的精神被奴役表示了富有哲理深度的忧郁和哀怨。在《至乐》篇中所揭示的“死”对于人间苦难的解脱，在《达生》篇中所写的“醉”对于祸福得失的遗忘，以及《齐物论》中以“梦”的幻觉来表示对人间分际、物我对立的审美超越，无不是对人生苦闷的排遣和发散。尼采说：“受痛苦者渴求美，也产生了美。”正因为庄子深刻地体验到了人间的痛苦和忧患，使他渴求超越了痛苦和忧患的自由的审美境界。显然，庄子直觉主义的纯艺术精神就是这种超越理想的表现。

这种精神渗透到以后的中国文学的血液中，就表现为两种形态：

第一，把文学创作当作苦闷的象征。那种在现实具体环境中激发的郁结不解的愤懑之情以回肠荡气的形式表现出来。“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对人的存在的反思和忧愤之中开始走向悲观、宿命和虚无。这就摆脱了儒家诗教“止乎礼义”的桎梏，促使文人自由地、审美地抒发其对现实人生的切身感受。而在宇宙面前的悲观主义人生感叹在这一系统中占有很大的份量，这对我国文学理论上“缘情”说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第二，走向自然山水。尽管庄子的艺术精神并未在空间上远游，而只是即自的超越，但喧嚣的人间社会还是与庄子的艺术人生难以凑合的。严格来讲，他只能在自然界逍遥适性，充分实现人生的自由，保持真正的自我。而自然万物，它块然而生，没有人造作的成份；它纯而又粹，没有人间的尔虞我诈和是非纷争；它宁静和谐，不象社会那样喧嚣和混乱……它充分体现了庄子思想的“道”的理想。因此，涵融在庄子的艺术精神的客观外在世界，实际上只合于体现了自然无为之道的自然界。这，就形成了庄子开始并深刻影响到后世文人的遁世精神。“山水有清音”，文人们在与现实冲突、抵牾时，纷纷投向自然的怀抱，从中寻找精神的慰藉，平息心中的苦闷。因此，中国的山水诗、山水画以及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意识，无不流淌着庄子纯艺术精神的血液。这一山水美学对我国富有民族特色的“意境”说，清淡自然的审美趣味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四

话说回本文开头提到的王国维。王氏除接受叔本华、康德、席勒的美学思想外，亦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在传统之中。王国维自言“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⑧《十三经》主要是儒家的经典，儒家文艺思想对王国维没有多大影响。对王国维美学思想影响最大的，应该说是道家，特别是庄子。综观王氏的美学思想，至少以下几个方面与庄子有继承关系：1)、悲观主义的人生观及其艺术解脱人生痛苦的作用；2)、艺术与政治、伦理、欲念无关的超功利的纯艺术论；3)、艺术达到物我两忘、物我同一的直觉主义审美观；4)、在文学批评中所贯彻的自然率真的批评标准。而且这四个方而，包括了王氏美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在王国维的美学论著中，所谓的“无我”、“以物观物”、“自然之眼”、“赤子之心”^⑨等等，归根到底，无非说的是一个主体心灵高度自由、自然的状态，它们都语源于《庄子》书中的“虚静”思想。至于称赞元剧之“以自然胜”、“以自娱娱人”^⑩崇尚“人惟于静中得之”的“无我之境”^⑪无不与庄子的纯艺术精神一脉相承。王国维所受的影响说明，中国也有纯艺术精神，而庄子则是其根。王国维融合中西思想也说明，庄子的纯艺术精神与西方的纯艺术理论具有某种可沟通性。

①⑦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第二章，台湾学生书局出版。

②③④ 司马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⑤ 王叔岷《庄子通论》，载《学原》一卷九、十期。

⑥ 林希逸《南华真经口义》。

⑧⑬⑭⑮⑯ 分别见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红楼梦评论》、《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人间词话》、《元剧之文章》。

⑨ 文中所引克罗齐语，见克罗齐《美学纲要》第一章。

⑩ 普列汉诺夫《艺术与社会生活》。

⑪ 闻一多《新文艺和文学遗产》，见《闻一多全集》三。

⑫ 胡文英《庄子独见·庄子总论》。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刘斯翰

诗 与 苦 闷

陶东风

一

文艺活动似乎与苦闷有不解之缘，要不然中西文论何以不约而同地大谈文艺与苦闷的关系？虽未有反过来说欢乐的人不会创作的，但“愤怒出诗人”这句千古名言却无人置否。《诗经》中早有为表达“忧”“哀”的吟唱：“心之忧矣，我歌且谣”^①“君子作歌，维以告哀”^②的表白。司马迁更明确指出《诗》三百篇“皆意有所郁积”，“发愤之所为作也”^③。此后，“发愤著书”就成为一个极有影响的创作心理学的命题，绵延不绝。虽也有反面的论点，如元代黄潜说：“非诗之所能穷达，而其诗亦不俟穷而后工也”^④，但影响极小。

谈诗与创作主体的苦闷，从创作动力学角度谈得最多。如司马迁借屈原的《离骚》大发感慨：“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⑤。陆游说：“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⑥。这话有些绝对，将快乐的情感宣布了“死刑”。明王慎中说：“不得志于时，而寄于诗，以宣其怨忿而道其不平之思。盖多有其人矣”^⑦。汤显祖：“语云，士不穷愁不能著书，天亦穷子云以发其声”^⑧，语气之决绝不下于陆游。清代的尤侗也在重复着：“古之人，不得志于时，往往发为诗歌，以鸣其不平”^⑨。这些都与“发愤著书”一脉相承。不论是“怨忿”、“穷愁”还是“不平”，均为苦闷的内涵，创作的动因。西方也有此论。叔本华认为人类因有了痛苦，这才从事艺术以求解脱^⑩。尼采有个绝妙的比喻：“痛苦使母鸡和诗人咯咯”^⑪。弗洛伊德十分自信地说：“我们可以断言：一个幸福的人绝不会幻想，幻想的动力是未得满足的愿望”，他还把诗人比作白日梦者，创作和作梦的动因都是未被满足的愿望——痛苦。^⑫

苦闷，不仅是创作的动力，而且被认为是决定作品优势的原因。陆游认为：苏轼、李陵、陶潜、谢灵运、杜甫、李白等的诗之所以能“为百代法”，是因为他们“激于不能自己”^⑬。韩愈说得更绝对：“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⑭。这里明确指出对创作的作用，苦闷优于欢愉，可惜只是作为一个自明之理（truism）提出的。欧阳修不仅有“诗穷而后工”的看法，而且还加上一句“愈穷则愈工”^⑮。又，宋王微《与从弟僧绰书》：“文词不怨思抑扬、则流淡无味”^⑯。清费锡璜以汉诗《垓下歌》、《悲愁歌》、《白头吟》等为例，认为“皆到发愤处为诗，所以成绝调，亦不论词之工拙，而自足感人”^⑰。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二评杜甫诗时说：“子美不遭天宝之乱，何以发忠愤之气，成百代之宗。”明胡震亨也说：“夫贫老愁病，流窜滞留，人所谓不

谓佳者也，然而入诗则佳；富贵荣显，人所谓佳者也，然而入诗则不佳”^⑧，这话实在深刻，道出作家的生活道路与艺术道路的不平衡关系。但实际上也都没有超出自明之理而进一步论证何以穷愁苦闷才可达“诗工”的佳境。

西洋人也有类似的论调。法国史达尔夫人在比较南北文学的差异时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忧郁的诗歌是和哲学最为调和的诗歌。”^⑨雪莱：“真正的诗歌只出于深切苦恼所炽燃着的人心”，“最美丽的诗歌就是最绝望的。”^⑩再看歌德创作的切身体会：“在我遇到幸运、心情愉快的时候，我的诗才的火焰非常微弱，相反的，当我被灾祸所威胁时，诗的火焰炎炎燃烧——优美的诗文，像彩虹一样只在雨后阴暗的地方出现，唯其如此，文学的天才都喜好忧郁的成素？”^⑪他的创作体验道出苦闷比愉快更利于创作的原因。难怪伟大的文学家大都忧郁成性，优秀的作品或产自痛苦，或表现痛苦。

此外，中西文化中都有将创作活动与人的病态或变态联系起来谈论的，而这种病态或变态又都与主体的苦闷有关。如刘昼《刘子·激通》：“梗枿郁蹙以成缠绵之瘤，蚌蛤结痂而衔明月之珠，鸟激则能翔青云之际，矢惊则能逾白雪之岭，斯皆仍瘁以成明文之珍，因激以致高远之势”^⑫苏轼《答李端叔书》：“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⑬。如此等等，说明美丽贵重之物往往产生于变态或病态。西方相似的言论也不少。莎士比亚将诗人、情人与疯子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是“满脑子结结实实的幻想。”^⑭格里巴尔泽说，诗好比害病的不作声的贝壳动物所产生的珠子；福楼拜以为珠子是牡蛎生病所结成，作者的风格是痛苦的流飘（注意：这几个比喻与刘昼的完全一样）。精神分析学派，则更为深入细致地从性变态的角度把艺术家与精神病人相提并论，弗洛伊德从两性同体的人格（bisexuality）谈论艺术家的人格，认为它“解决了艺术家与精神病之间的一致。强化了的两性同体引起矛盾心理和犯罪感，这样就引起内心的冲突，——它很容易引起精神病”^⑮。

总之，中西文论都一致肯定了苦闷对文艺创作的积极作用，肯定了痛苦之于文艺的神益远非欢乐等别的情感可比。

然而，诗与苦闷之说，中西有别，尚有值得深究之处：一、中西谈苦闷，其内涵与侧重有何不同？二、苦闷或主体的痛苦与创作的关系究竟如何？

二

在比较中西关于苦闷与文艺的关系的理论时，关键的一点是要抓住“苦闷”的实质性内容：苦闷是由什么引起的？不同内容的苦闷与文艺的关系以及它们的表现方式往往大相径庭。

中国古代有关苦闷的言论具有极强的社会政治内涵，表现出苦闷文人的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而诗人的苦闷正是由于这种抱负不得实现而滋生的。司马迁提出“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可谓从文艺学的角度将“富贵者”一棍子打死。又举西伯、仲尼、屈原、吕不韦、韩非以及《诗经》、左丘明、孙子

等为例。说明不朽的作品，都是不如意事的产物，所谓“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②6}。这里谈到的西伯、屈原等人的遭遇都是政治上的不如意，都是仕途失意的苦闷。

沿“发愤著书”而下，有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他把“不平”当作一种激发媒介，正象草木、河水、金石之鸣要以风、以敲击作为激发媒介一样。^{②7}这“不平”的实际内容主要还是政治的、时代的、社会的内容，如“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屈原哀楚等等，而不是一己之风花雪月、感伤哀鸣。

韩愈以后的欧阳修否认诗能穷人，但认为优秀的诗只有陷于穷途末路的人才创作得出。他说：“非诗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②8}。而所谓“穷”，亦即士大夫的“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②9}如梅圣俞“年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③0}，这正是仕途失意，效忠王室而不得的苦闷。

从个体的穷达来谈文人的苦闷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方孝孺这样界定穷达的内涵：“人之穷达，在心志之屈伸，不在贵贱贫富，富贵而于道无所闻，于业无所传，谓之穷可也，非达也。贱贫而沛然有以自乐，生有以激乎人，没有以传诸后，谓之达可也，非穷也”^{③1}。可见所谓穷达不是物质上的享受或贫贱，而是一种内心体验，穷者，主体痛苦之体验也。而“道”、“业”等亦关乎家国的而非个人的。明谢榛说杜甫因遭天宝之乱而发忠愤之气，把杜甫的个人穷达与国家时代人民疾苦紧相联系。黄漳〔明代人〕谈到陆游杜甫的诗时说“盖翁为南渡诗人，遭时之艰，其忠君爱国之心，愤郁不平之气，恢复宇宙之念，往往发之于声诗。昔人称老杜为诗之史，老杜遭天宝之乱，居蜀数载，凡其所作，无非发泄忠义而已。”^{③2}放翁子美的苦闷可谓十分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文人苦闷的实质，忠君报国、关心社会人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他们的苦闷和不平的核心内容。李贽认为《水浒》也是“发愤”之作：“《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盖自宋室不竞，冠履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③3}

总之，中国古代文人的苦闷、不平使人深深地感受到其中以身报国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苦闷之说是中国文论的一个优良传统。

但中国古代文论的苦闷观亦有其糟粕和缺失，有些造成了创作以及文艺观念上的严重偏颇。首先就是中国古代之大夫的报国往往和忠君相联系，具有较为浓厚的封建伦常观念。王逸《楚辞章句》言屈原“履忠被谮”，所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依道径以讽谏君也”^{③4}。就是把忠君和报国视为同义的。由于封建专制的专横和礼教等级的森严，讽谏怨刺还须讲究“温柔敦厚”，所以，中国文人的苦闷和牢骚极少有如大海波澜、狂风暴雨式的，这实际上也是在创作上导致了缺少西方式的震撼人心的悲剧作品的重要原因之一。清纪昀说：“斯真穷而后工，又能不累于穷，不以酸恻激烈为工者，温柔敦厚之教，其是之谓乎？三古以来，放逐之臣，黄馘黜下之士，不知其凡几，其托诗以抒哀怨者，亦不知其凡几。平心而论，要当以不涉怨尤之怀，不伤忠孝之旨为诗之正轨。昌黎《送孟东野序》称‘不得其平则鸣’，乃一时有激之言，非笃论也”^{③5}。伟大的作品往往

离不开激荡如狂澜的感情力量，而一味的温柔敦厚是不利于这类作品的产生的。

三

西方文论的苦闷说是另一番模样。

叔本华在谈到悲剧的意义时说过：“悲剧的真正意义是一种深刻的认识，认识到（悲剧）主角所赎的不是他个人特有的罪，而是原罪，亦即生存本身之罪。加尔德隆率直地说：‘人的最大罪恶，就是：他诞生了。’”^⑧。基督教认为人一降生就是有罪的，人生不过是一个赎罪的过程而已，是无比痛苦的。这种原罪观念在西方根深蒂固，它直接或间接地对各种关于人的学说发生影响，也对文论史上有关文艺与苦闷的观点产生影响。达·芬奇说过：“美的吸引力愈大，痛苦的感受性也愈大；艺术家的成就大，就因为他受苦多。”这种观点是以他下列人生观为基础的：“我们老是期望未来，但未来只为我们确实确实准备着一点——一切希望的破灭”^⑨。这种彻底的悲观苦闷似乎不象中国人的苦闷观那样关乎政治社会国家，而是基于对人生（从普遍人性的角度）的哲理反思：人是渺小的，人生是虚无的。

叔本华把他的整个文艺观建筑在其悲观哲学的基础上，他认为生存意志（欲望）是人生的痛苦之源，而这种欲望（首先是性欲）是根植于人性深处、与生俱来的。文艺活动就是要人们忘却欲求，求得暂时解脱。显然，叔本华着眼的亦不是国家和人民的盛衰疾苦，而且具有了生理学的因素。他在分析艺术家的悲剧性格、悲剧命运时，没有谈艺术家在政治上的升沉，以及他们处于社会动荡中的苦闷感受，而是着眼于艺术家的异乎常人的性格。在《论天才》一文中，他转引亚理士多德的话说：“在哲学、政治、诗歌或艺术方面超群出众的人，似乎都是性情忧郁的。”还引西塞罗的话说：“所有的天才都是忧郁的”^⑩。叔本华分析道，文艺的天才本身，从生理心理的角度看，有强烈的感受性、异乎寻常的情绪波动，并为强烈的欲念所苦，因此他才寻求摆脱这种痛苦的艺术作品的创造^⑪。（这可与司马迁将生理苦闷作政治学、社会学解释对比）。叔本华感慨地说“天才的内在苦闷是不朽之作的源泉，他们有时陷于梦幻般的沉郁，有时又显得激烈的兴奋，和才智正常的人相形之下，后者是多么理智、沉着、平静，并且他们的行为是多么确实和平衡”^⑫。

叔本华的苦闷观不仅不象中国古代文人谈苦闷那样从个体的政治得失，从治国平天下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出发把个体紧紧地联系于社会时代，而是采取了普遍人性论的角度；而且更多地注意到了艺术家的心理特征和生理特征。

弗洛伊德及精神分析学派对苦闷的解释是从属于他们的心理学体系的。他们用精神分析理论解释文艺活动，认为文艺创作和欣赏都是人的被压抑的无意识欲望的一种象征性的满足，正如梦。而被压抑的欲望就是苦闷，所以只有痛苦的人才创作：“我们可以断言：一个幸福的人绝不会幻想。只有一个愿望未满足的人才会。幻想的动力是未得到满足的愿望。每一次幻想就是一个愿望的履行。它与使人不能得到满足的现实有关联。这

些激发幻想的愿望，根据幻想者的性别、性格和环境而各不相同；但是它们很自然地可以分成两大类，或者是野心的欲望，患者要出人头地；或者是性欲的愿望”^④尤其是性欲的愿望，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无视人的阶级性、社会性的观点认为：无论富贵还是贫贱，是政治上的骄子还是仕途的失意者，性的苦闷与生俱来，并不因人的国籍、民族、社会、性别等属性的不同而不同。如果说中国的苦闷仍强调文艺活动的理性性质、作家是高度理性的人，那么精神分析学派的苦闷理论则有明显的非理性倾向，把艺术家当作精神病人看待是精神分析学派的普遍倾向。亨利·劳温菲尔德(Hery Lowenfeld)认为：“艺术家的精神病之多可以用他们强烈的两性同体人格加以解释。通过艺术的升华，他们成功地克服了他们的内心冲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家的精神病是一种无害的精神病”，“艺术成就的动力基础是强化了的两性同体人格，它促使艺术家寻求并克服持续积累的创伤，从潜伏的挫折发展成为艺术的幻想。”^⑤两性同体是精神病的主要原因，因此艺术家即使不是精神病人也只与之一纸相隔。“在真正的创伤性精神病中，刺激防卫是通过外在创伤所进行的犯罪活动”，“而在艺术活动中，创伤可以通过艺术活动得以升华。”在弗洛伊德学说中，忽视了阶级、民族、政治等因素而力图探寻人类的共同本性，基督教原罪说的幽灵仍在游荡。

日本文论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与弗洛伊德的理论一脉相承，专论文艺与苦闷之关系。其中心观点乃是：“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⑥这苦闷生自人的欲望，亦即人的生命力，它在现实中得不到自由的实现，因而借了文艺的形式予以象征的表现。他强调了政治活动与艺术活动的不同，认为只有艺术活动才具备“从生命的根柢里发动出来的个性的力。”这种观点也忽略了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这一基本事实。如果我们把生命力，把人性理解为社会阶级因素和人的生理本能的合力，就可以较为全面而深刻地触及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苦闷的本质。文艺活动是与人的整个生命活动相关的，深入到整体的生命层次，也就是更深刻地把握了艺术活动的本质。

不过，从心理学角度谈苦闷，如上所说，似乎比从政治学、社会学角度更加符合对象的特性，因为苦闷毕竟是一种心理体验，社会政治时代等只是苦闷的诱因、内容，但作为心理体验，它的具体生理心理机制、它对创作心理的具体影响，它通过什么形式影响创作等，都是必须从心理学或生理学角度才能解释的。在这方面，西方人（特别是叔本华和精神分析学派）的方法确有优越于中国文论的地方。

四

中国古代文人谈不平，说苦闷，往往离不了兼谈“怨刺”、“讽喻”、“规谏”。怨刺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极古老的创作手法，《诗经·魏风·葛屣》就有“维是偏心，是以为刺”的说法。班固和郑玄从政治的角度谈过怨刺诗的起源。班固：“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⑦，郑玄认为周室到了厉幽两王时，“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

《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⑤中国的这个“怨刺”传统，固然有积极的社会意义，而且也的确诞生了不少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如屈原、杜甫、陆游、辛弃疾等。但过分强调文学的讽喻作用，而不顾及文学的审美功能，容易使文学变成政治教化的附属品。比如陈子昂《感遇》诗中有大量作品，就因直接批评武则天的政策（如佞佛）以至后人诟之为“质木无文”。另外，讽谏怨刺也大受“温柔敦厚”的诗教的束缚，这点在班固对屈原的微辞里可以见得分明。班固说屈原“露才扬己”，不过是个“狂狷”之士，而且“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⑥。这种诗教的束缚，使诗人只能“怨而不怒”，思想情感都陷入到以怨诗为怨的桎梏之中，不敢越雷池一步。

相反，西方文论把苦闷之源归结于普遍人性和人的生理本能、生命的痛苦的表现，因此其外在形态是游戏而非“讽谏怨刺”。弗洛伊德是这样理解文艺即游戏的，他说：“作家所做的就象游戏中的孩子一样。他以非常认真的态度——也就是说，怀着很大的热情——来创造一个幻想的世界，同时又明显地把它与现实世界分割开来”^⑦。

游戏的本质是自由。这一点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说得很清楚。在区别艺术与手工艺时，康德说：“艺术还有别于手工艺，艺术是自由的，手工艺也可以叫做挣报酬的艺术。”^⑧艺术为游戏乃是因为艺术和游戏的精神都是自由。这里讲的自由是精神对现实的超越，审美对实用的超越，艺术不是为它的效果（如报酬），而是本身就给人愉悦。弗洛伊德其实也着眼于游戏的自由本质，不过他是从无意识的本我欲望通过游戏可以避开意识超我的检查而得到满足这个角度说的。游戏的另一特点是它直接关乎人的生命力。朱光潜先生在解释康德的游戏说时认为：“笑，诙谐、游戏和艺术，依康德的看法，都有相通之处，它们都是标志着活动的自由和生命力的畅通”^⑨，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认为：“……动物如果以缺乏（需要）为它的活动的主要推动力，它就是在工作（劳动）；如果以精神的充沛为它的主要推动力，如果是绰有余裕的生命力在刺激它活动，它就是在游戏。”^⑩并以此来解释艺术活动的游戏性质。

从游戏的这两个特点，可以发现：由于西方人说的苦闷是根植于普遍人性论上的，是人的生命力引发的，因而以干预国家政治为核心的“怨刺”说自然不足以表现这种苦闷，所以要借助于自由的游戏。这游戏关乎人的生命力，它或则出于生命力的过剩（席勒），或则因为生命力的受阻（厨川白村）。说游戏导致精神的一种自由，这是西方文论的一大长处，但它忽视文艺活动的社会政治方面的积极作用则又陷入了另一种偏颇。

五

苦闷与文艺创作之间到底有什么内在联系？为什么苦闷的情感比欢愉的情感更有利于文艺创作？

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分析道：“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慨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他深入到了“内”、“外”两方面来看苦闷与创作的关系。从“外”看，失意苦闷之人“自放于山巅水涯”，对自然有深入细致的体察；从“内”看，“忧思感愤”的积累通过怨刺写作出优秀的作品。人在郁闷时往往对情感的体验也更加深入细致，所以能写出细微幽深的情绪。这里的文艺心理学思想是丰富的，但却未能展开。明代李祯从创作可以释放人的情感的角度谈到这个问题。“……余两涉忧患，饱食之日少，且性不好博奕，非藉楮墨吟弄，则何以豁怀抱，宣郁闷乎？虽知其近于滑稽谐谑，而不遑卹者，亦犹疾痛不免于呻吟耳，庸何讳哉？”^⑧苦闷时的创作犹如疾病时的呻吟，可以释放情感以维持内心的平衡，这与西方渲泄说有相通之处。但总的说来，中国古代对苦闷与创作关系的心理分析流于感悟式，且由于政治学社会学角度的解释先入为主而导致对苦闷的心理分析的薄弱。

西方对苦闷和创作关系的认识也只是到了精神分析学派似乎才有了较大进步。主要是找到了幻想这个连接苦闷与创作心理的中介环节。弗洛伊德认为艺术活动即白日梦——成人的幻想，而幻想的动因又是未被满足的欲望，这样，欲望越不得满足（也即苦闷越甚），幻想（艺术的根本）也越丰富强烈，苦闷压抑的心态自然也就成了幻想的最佳心态。亨利·劳温菲尔德认为，艺术家的自恋会形成他的特殊的敏感性，“内心冲突和紧张永远不会在现实生活中彻底消除，它以某种方式产生一种不可避免的情况——一种内在的挫折。它是艺术家的幻想的来源，并驱使他一次又一次地摒弃令人失望的现实，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⑨但由挫折带来的幻想在一般受创伤的人尤其是精神病人身上同样存在，因而仅仅幻想本身不足以成为艺术家，“艺术家的特点正在于：他并不只是满足于幻想，而是渴求赋幻想以形式，渴望作品的诞生，作品的诞生带来了暂时的满足，并使之从紧张中解脱出来”^⑩。一种心理上的补偿和调节，作者由此达到心理平衡。而这种调节的前提则恰好是失衡，是痛苦。

欢愉的情感则刚好相反，心满意足的心态很难成为幻想的动力，成为创作的欲望。这里要区别欢乐的心态和在作品中追求、歌颂欢乐这样两种不同的情况。艺术家歌颂欢乐往往正因为苦闷，这时的欢乐是彼岸世界，带有理想的成分，它正是苦闷压抑的现实世界的一种曲折反映。欢乐的深刻性及其感人的原因正在于此，创伤、苦闷的超越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表现为拜伦式的对现实世界的恨，也可以表现为舒伯特式的对幻想世界的爱。而真正的欢乐的心境往往难引发强烈的艺术冲动。

苦闷压抑之所以更能成为幻想和艺术活动的动力，原因恐怕是它的积郁内指性质。

创伤经验的郁积和内指转向心理底层，不易释放，时间一久，引起变态。对于艺术家，艺术创作而言，郁积的创伤苦闷形成强大的心理势能，使艺术家不得不写，不吐不快。当然，对于没有赋形能力的人，冲动再强烈亦不能成为艺术家，其创伤经验的郁积更可能导致精神病。而富于幻想力的艺术家往往能在形式技巧方面也富于独创性。

- ① 《诗经·魏风·园有桃》。
- ② 《诗经·小雅·四月》。
- ③②⑦ 《报任安书》，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卷一，第82页。
- ④ 黄滔《蕙山愁吟后序》，《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八，四部丛刊本。
- ⑤ 《史记·屈原列传》。
- ⑥⑬ 《澹斋居士诗序》，《中国历代文论选》卷一，84页。
- ⑦ 王慎中《碧梧轩诗集序》，《王遵岩集》卷二，清康熙郢雪书林刊本。
- ⑧ 《王生借山斋诗帙序》，《汤显祖集》诗文集卷三十二，上海人民出版社。
- ⑨ 《叶九来乐府序》，《西堂杂俎二集》卷三，康熙刊本。
- ⑩ 参阅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 ⑪ 尼采：《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1986年版，269页。
- ⑫④④⑦ 《创作家与白日梦》，《西方现代文论选》，上海译文，1983年版，141—142页。
- ⑭ 《荆潭唱和诗序》，《中国历代文论选》卷二，129页。
- ⑮③① 《梅圣俞诗集序》，《中国历代文论选》卷二，130页。
- ⑯⑰⑱⑲ 均转自钱钟书《诗可以怨》。
- ⑳ 中华书局，《清诗话》下，947页。
- ㉑ 《唐音癸签》卷二十八，古典文学出版社。
- ㉒ 史达尔夫人：《论文学》，《西方文论选》下，125页。
- ㉓ 转自叔本华《论天才》，《叔本华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52页。
- ㉔ 参见《哈姆莱特》。
- ㉕②②②③ 转自亨利·劳温菲尔德：《精神创伤与艺术家的创造性体验》（*Psychic Trauma and Productive Experience in the Artist*）见《Literature and Psychoanalysis》，Edith Kurzweil和William Phillips编，New York 1983。
- ㉖⑲ 《梅圣俞诗集序》，《中国历代文论选》，卷二，第130页。
- ㉗ 《书夷山稿序后》，《逊志斋集》卷十八，四部备要本。
- ㉘ 《书陆放翁先生诗卷后》，《古典文学研究资料·陆游集》，中华书局，128页。
- ㉙ 《忠义水浒传序》，《焚书》卷三，中华书局。
- ㉚ 《中国历代文论选》卷一，154、149页。
- ㉛ 《月山诗集序》，《纪文达公遗集》卷九，清嘉庆刊本。
- ㉜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352页。
- ㉝ 《大画家论》。
- ㉞⑳⑳④① 《论天才》。
- ㉟ 《鲁迅全集》卷十。

- ④④ <汉书·礼乐志>。
 ④⑤ <诗谱序>，<中国历代文论选>卷一，70页。
 ④⑥ <离骚序>，同上，89页。
 ④⑧ 译文用朱光潜<西方文论选>下，383页。
 ④⑨⑤⑩ 同上，384页，454—455页。
 ⑤① <剪灯余话序>，<剪灯余话>卷首，古典文学出版社。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陶原珂



《中国历代年号考》补考

官大梁

李崇智<中国历代年号考>(中华书局1981年6月第1版)汇录年号800余个，注明出处，并有考辨。然是书间有阙考之处，今为补之。

一、王斌

<中国历代年号考>第186页：“天绣，按，王斌汉中农民起义领袖。此号见<辞海·历史分册>所据未详。”

王斌建号天绣，见<明英宗实录>277天顺元年4月戊午条：“府军前卫军余王斌……为妖言诱流民作乱，制斧钺及五方日月旗号，所居为钱龙川八宝台，建国曰极乐，改年号曰天绣……正月元旦衣黄朝众号令之，斩男子一人祭旗，即率以攻掠傍近诸县，得众数千人。令其先锋刘英持书入汉中府约战，行至梳洗桥，猝遇官军，斌等及其党数百俱被擒。至是狱具，上命诛斌及同谋者四人。”据此，王斌建号时间在天顺元年(1457年)。

二、张丙 黄诚

<中国历代年号考>第203页：张丙，天运1832年11月——1833年正月(笔者按，月份为中历)。黄诚，大明1832年12月——1833年正月。<中国历代年号考>此两条据连横<台湾通史>，后一条又据<辞海·历史分册>且云：“所据未详，待考。”

张丙、黄诚等起义，沈汝翰<戎马风涛集>卷4<除氛录·张丙倡乱始末>有记载。道光12年(1832年)，张丙等起义，清廷命福州将军瑚松额、闽浙总督程祖洛率兵镇压。沈汝翰是程祖洛的随员，身历其事，集中<张丙倡乱始末>述此事颇详。

<张丙倡乱始末>说：“计张丙起事于十二年闰九月，就擒于十二月，全功告竣则在十三年五月。”张丙用天运年号，见于<张丙倡乱始末>、<台湾通史·张丙列传>10月纪事中。<中国历代年号考>作11月，误。

黄诚，<张丙倡乱始末>作黄诚。黄诚用大明年号，<中国历代年号考>作12月，不确，应为10月。<张丙倡乱始末>说：“黄诚者，彰化人。于十月十二日在嘉、彰交界之林杞埔起事，伪称兴汉大元帅，用大明主年号。”<台湾通史·张丙列传>：“彰化人黄成受丙约，亦以十二日竖旗于林杞埔，称兴汉大元帅，用故明正朔。”黄诚是“用故明正朔”，是否即以“大明”名年号，似未可认定。黄诚被擒杀，是在12月。<张丙列传>说：12月，黄诚被获，剖其心以祭斗六诸人。参见<戎马风涛集>卷4<除氛录·斗六文武员弁遇害始末>。<中国历代年号考>作次年正月，不确。

三、未收年号

张丙、黄诚起义时，还有起义者自建年号，有顺天、奉天、天运等。<中国历代年号考>未收录，当补。<张丙倡乱始末>：道光12年10月“梁辨先称天运，后与吴扁、陈委皆称顺天；刘仲、蔡恭皆称奉天。”“又有南路贼许成者，凤山县人。十月初十日在凤山观音山竖旗起事，亦伪号天运。”

艺术地掌握历史

——《白门柳》在历史文学意识上的创新

吴 观 澜

公元一六四四年，李自成的农民军攻进北京城，随后，清贵族乘机入关，打败农民军和明王朝，逐步统一了中国。这是一个风雨如晦的历史巨变的时代，汉民族人民，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饱蘸自己的血泪，写下了历史上悲怆而壮烈的一页。作家刘斯奋的三部曲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形象地展现了明末清初这一历史巨变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灵的历程，比较真实深刻地再现了这一时期充满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的历史生活，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生动的知识分子以及其它阶层人物的形象。

《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出版后，即获得了严格的批评家和热情的读者们的青睐。它的成功，自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不少评论家已就此作过中肯的分析。不过，我认为《白门柳》之所以能在近年来众多的历史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归根到底，关键是作者在总体上具有自觉的创新意识和独特的美学追求。本文试图从创新意识入手，讨论它对艺术手法和形式的内在制约与影响。

一、对历史进行美学思考

《白门柳》的创新意识，首先体现在其创作的立意上。这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力图按历史的原貌去反映历史，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在我国古代，历史文学有其特殊的地位和深厚的传统。从流传至今的大量的历史小说或戏剧作品来看，有两种比较典型的创作倾向。一种创作是为了“羽翼信史”，作“正史之补”，把历史文学当作历史知识的普及读本，讲究依据史籍，避免虚构和想象，忽视文学特性，其美学价值不高。另一种创作却意在“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垒块”，用古史古人来寄托自己的思想，抒发自己的感情。这类作品虽或有寄托深远词旨微茫之妙，但又往往不重视历史真实性。“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包括解放后）中历史文学创作也颇繁富，就继承方面看，受第二种创作倾向影响尤大。“古为今用”的创作意识得到进一步发展，借古讽今或借古颂今之风得到强化。在激烈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之中，作家运用历史题材来讽刺黑暗腐朽的社会，歌颂进步的革命理想，其社会作用应予肯定。但这种借古讽（颂）今的传统有一定流弊，除却那些目的不尽纯正的“影射文学”外，还有些“古为今用”的历史文学作品，往往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目的，为了某种政治的现实的利益而不顾历史真实性，甚至对历

史随意涂抹，这种作品自然丧失了作为历史文学所特有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白门柳》的作者自觉地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既不用自己掌握的丰富史料加以推演，写成一部明末清初历史的通俗演义；也无意把它写成一部借古讽今之作。作者的目的是明确的，他要历史，也要艺术，他用“艺术的掌握世界的方式”，对历史进行美学的思考。具体地说，就是把历史看作一种客观事物，一种科学研究的对象，进行冷静的思考和观照，在此基础上，运用现实主义的笔墨，形象地描绘出在明末清初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夹击下，各阶层的知识分子纷纭复杂的心态，给读者提供了一部中国封建主义社会知识分子心灵形象演化的历史，应当说，这一自觉的创作追求和创新意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特别是在历史文学创作方面，是有一定意义的。

近人王国维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人间词话》）历史文学的创作也一样，作家要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首先就要“入乎其内”熟悉历史，这是历史题材创作的基本功。《白门柳》作者对所写的这段历史已有多年“入乎其内”的功夫，曾对明末清初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文物、典章制度、语言、民俗等方面做过一番扎实的研究，如数家珍，了然于心。“对于那些东林党人，复社名士都象对自己的老朋友那样熟悉。”（《人民日报》85.5.20黄秋耘《真且雅》）正因为作者能够“入乎其内”，其作品“故有生气”，故能使形象须发毕现地呈露笔端，把几百年前的历史场景富有生气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也随之“入乎其内。”另一方面，在这个基础上，作者还必须能“出乎其外”，不为琐碎的史料所眩惑，整体、宏观、准确地认识历史的“庐山真面目”，找出历史发展（尤其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思想发展）的内在联系。

在第一卷《夕阳芳草》里，描写了以复社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和以阮大铖为代表的阉党余孽及以钱谦益为代表的政治投机分子的斗争，作者有分明的爱憎，但他既不是从现代人的需要出发去歌颂或批判古人；也不是站在当时斗争一方的立场来叙述和评价历史的。相反，作者是用历史的批判的眼光，把历史事件和人物放在历史的整体进程进行冷静的审视和思考，而不是以一时一事的得失去评价个体的功过善恶。作者的笔调异常清醒冷峻。在他看来，无论是进步的、正义的，或是腐朽的、邪恶的，都是这个特定历史阶段里产生的“历史现象”，更重要的是，各种现象的出现都有其必然性和内在联系。正如恩格斯说的，“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实。”（《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因此，一切都必须放在历史发展环环相扣的链索上，才能得到裁决。《白门柳》对历史不是用一般的道德观去评价善恶忠邪，而是冷静地分析构成历史变化的“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从而非常形象地描绘出古代启蒙主义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正因为这样，《白门柳》显示了一种宽厚和冷静的历史理性。这是《白门柳》自觉追求的新意，也是它成功的关键因素。以下论述的《白门柳》的几方面艺术特色，都是受到这种历史理性

的制约和影响而形成的。

二、历史感与个性化

因为《白门柳》以历史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所以在创作过程中十分注重“历史感”。所谓历史感，不仅指作品在表现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文物、典章制度等细节的准确，也不仅指作品对湖光山色、民情风俗描写的逼真。另有两方面更为重要，一是真实地反映当时历史全局总情势的特点，一是描绘出在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中所折射出来的时代精神。《白门柳》描写复社与阮大铖的斗争，就并非仅仅局限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内部的争斗，而是常常用十分经济和巧妙的笔墨展开更广阔的社会背景，诸如民族之间的矛盾、农民阶级与统治阶级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的矛盾、以至高利贷者与工商业者的矛盾等等都得到直接或间接的表现。尽管故事情节简单，却呈现出较深厚的历史感。

作者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物把握和表现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也是颇为成功的。在小说中，无论是官僚也好，中下层的知识分子也好，都普遍有一种悲观与不安的“时代病”。有的是敏锐而清醒地感受到，有的则是隐约模糊地感受到末世即将来临，任何努力都无济于事，就象大堤崩溃的一刻，无论是固堤的勇夫，还是毁堤的蝼蚁，同样将随着洪水冲决而荡然无存。所以《白门柳》中表面的平静生活，实在隐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此外，由于作家注重历史感，《白门柳》的人物没有“现代化”的味道，而且细心的读者也可以体会到这些人物与其它朝代甚至与明初明中期的古人比较，有自己的历史风采。比如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逐步走向批判立场，就是他对明末黑暗的社会现实思考的结果。不过作者并没有拔高他，而是让他按照他所处时代所应有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和行动。第十一章写黄宗羲遇上起义军的“细作”，十分惊慌与仇恨，准备向巡捕营报告，让他们派人来抓。这种真实描写，让我们看到，黄宗羲尽管是先进的知识分子，但对“流寇”和“建虏”同样有深刻的仇恨，这是他的历史局限。这很符合黄宗羲的个性，很有历史真实感。

另一方面，《白门柳》作者从人的观点出发，追求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作者在塑造形象时，没有让阶级性去淹没人物的个性，也避免象恩格斯所批评的那样，“把人类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分为人性的人和兽性的人，分为善人和恶人，绵羊和山羊”，（《反杜林论》）单一化类型化地刻划人物。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作者总是把他作为活生生的复杂的“现实的人”来写的。如黄宗羲后来成为启蒙主义思想家，但作者很注重描写其性格与思想的发展过程和他的一些弱点。如写他认真时又近于单纯，执着时又过于固执，有强烈的爱憎，但对复杂的政治、社会现象有些天真；有学者的明晰头脑，没有政治家的应变能力和手腕。《白门柳》在刻划正反面人物时，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中“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刘知几《史通》）的传统。钱谦益是刻划得最为成功的形象之一。在小说中，他是一个文学巨匠，又是一个势利庸人。既自私卑俗，又风流儒雅。时时屈于权势，但偶尔又有救弱抗暴的豪举。阮大铖是阉党余孽，但作者也照样描

写出其杰出的艺术才能。其次，同一社会阶层，同一类型的人物，作者也努力刻划其个性差异，力图做到“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金圣叹《水浒传序三》）如复社四公子冒、陈、侯、方；如妓女中的顾眉与李十娘，陈圆圆与董小宛；钱谦益族亲陈在竹与钱养斋，门徒钱曾与冯班；阉党阮大铖与马士英，这些人虽然社会地位相同，文化修养相近，但面目各异，不容混淆。这显示了作者构思的匠心，也可见出作者出色的艺术表现力。

处理历史真实和艺术想象的关系是历史文学创作一个基本的美学问题。《白门柳》在这方面的努力予人以一定的启发。它的故事有一定的史料依据，但虚构的成分很大。作者往往根据史料所提供的结局或梗概以及它们的内在联系去寻找事件发展的必然趋势；按照人物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性格发展的逻辑，用丰富的艺术想象来补充或设置细节，使艺术虚构具有一种自然之势，成为事件和人物有机的必要的部分。所以读《白门柳》后有一个感觉：艺术虚构，又不失历史感与个性的真实感；故事的发展似乎没有既定的流向，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举冒襄和董小宛的故事为例。《白门柳》大致以冒襄自传《影梅庵忆语》为蓝本。《忆语》很简单，《白门柳》往往根据它的只言片语大胆而合理地虚构发挥。如《忆语》写冒襄参加科举考试有“场事既竣，余妄意必第”九字，而《白门柳》则以第五章的五、六节、第十二章的四节万余字细细叙写。文字绝大部分是想象，但反映了当时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以及一些士子们复杂的心理状况，虽是虚构，却很有历史真实感。又如钱谦益为董小宛处理赎身债务一节，《忆语》只寥寥数语：“虞山宗伯（即钱谦益）闻之，亲到半塘”，“三日为之区画立尽，索券盈尺”，而《白门柳》则洋洋洒洒数万字，笔法细腻而曲折，极有情致，象钱谦益与讼师郝治平一场口才、智慧、与气势的较量，更是有声有色。

三、对传奇性的突破

《白门柳》艺术构思的创新意识，使之突破了某些传统的审美趣味和表现手法。具体地说，就是以“传真”代替“传奇”，把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引入到历史文学的创作中。

传奇性，是中国古代历史小说的传统审美倾向，所谓“以文章之奇传世之奇”，（金圣叹《第一才子书序》）内容所反映的是“世之奇”——不平凡的社会生活；表现形式则要求奇特曲折。《三国演义》最有代表性，其内容是在动乱历史时期中的复杂和巨大的历史事件，表现一批王侯将相尔诈我虞争权夺利以及惊心动魄的战争故事。其形式上的特点是情节密度较大，人物行动性强，而情节总以跌宕腾挪的生动形式，使读者不断处于紧张和期待之中。不过，“传奇性”的作品往往过份理想化而削弱了现实主义的力量。《三国演义》为了追求传奇性也付出了某些失真的代价。比如写人有荒诞不经之处，如孔明和关羽的神化，就给人颇不真实的感觉。

《白门柳》则有意识摒弃传奇化的艺术手法，以历史的真实性当作审美的重要对象。就其取材来看，它不直接表现农民战争的风卷云涌，异族入侵的刀光剑影或朝廷内部的

激烈斗争——这些也许更容易写得曲折激烈，惊心动魄。作者偏偏选取了当时仍处于相对平静的江南一批在野文人的生活为题材，把文人日常生活、感情生活、思想历程等作为小说的审美对象，以真实性取代传奇性。在形式的构思上，作者不追求情节的密度，而着力于情节丰富的内涵；不追求情节的离奇曲折，而着力于情节发展的必然趋势；不追求故事的完整性，而着力于人物情绪的完整性。在艺术表现上，作者也总是把“真实”作为首要的审美要求，因此所叙述的历史事件和所塑造的历史人物，使人感到真实可信。

当然，平凡的生活内容和朴素的传真方式，需要作者在艺术构思方面付出更为艰巨的劳动，作品才不致流于平庸和板滞，才能获得引人入胜的艺术力量。这方面，《白门柳》也是成功的。它把平凡的，甚至枯燥琐碎的生活题材，如文人们的谈笑雅谑、论诗评文、考证字画、讥讽时政等有声有色富有情趣地表现出来。作者在人物内心世界、细节、场面等都善于设置尖锐的冲突和强烈的戏剧性（这在某些程度上也是对中国小说传统的继承）所以能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和平和舒展的形式里，寓含着细致复杂的生活内容和矛盾冲突，时时出人意料地掀起情节的波澜，于平易之中见“奇趣”。

首先，作者很善于在平凡之中发现和挖掘深刻的意蕴和新鲜的趣味。如《白门柳》第二章第四节，写冒襄准备到李十娘家和社友聚会，遇上一大群乞讨的难民的故事，用冒襄由对第一批乞讨者的施舍到对第二批乞讨者的拒绝以至招骂这件小事，反映出两个阶级的对立情绪，说明开明、进步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下层人民也是无法互相理解的。这就赋予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故事以丰富的意蕴，读后回味无穷。其次，一波三折的描写手法在《白门柳》中是不胜枚举的。作者的笔锋如流风回云，一个场面，一件小事，总是着力渲染，如笋去壳，如茧抽丝，使情节内涵的深刻性和表现的生动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钱谦益家庭中的妻妾勃谿，复社的虎丘之会，冒襄的考试以及和董小宛的纠葛，黄宗羲京中上书等等情节，都很能表现出作者的艺术个性和功力。

《白门柳》排斥传奇性，追求真实性，所以作者笔墨的重点，往往不是情节的曲折或事件的结果，而是人物在事件发展中的心理过程。但作者描写人物复杂的心理，并不有意追求“二重性格”，而是将人看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把知识分子的心理看成是社会性、人性以及历史文化的积淀。如写冒襄为其父调离前线，上下奔走，甚至向朝廷上救父万言书，终于使其父调任。作者并不满足于把这种行为简单地写成一种贪生怕死自私自利之举，而是更进一层描写冒襄作为士林表率复社四君子，在“救父”过程中，内心“忠”与“孝”两种传统意识的冲突。真正写出了他的深层心理结构，从而在人物日常的心理活动中就揭示了某种深沉的社会意蕴。这正是《白门柳》的心理描写耐人寻味之处。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中国武侠小说在印尼

许友年

中国二、三十年代，武侠小说多达160余家，其中创作武侠小说在10部以上的作家，如顾明道、向恺然（平江不肖生）、赵焕亭、陆士谔、汪景星、还珠楼主、张箇依、徐哲身、柯一峰等人的作品，大都有马来文译本。当时鼎足而三的顾明道、向恺然与赵焕亭的代表作，如写郑昭与上暹罗国国王（1768）的《海外争霸记》，1937年由何希久翻译成马来文出版，全书七卷557页。《荒江女侠》的初、续集，有两种译本，一是由陆羽生于1937—1939年翻译出版，另一是由詹于1948—1949年翻译出版，全书分三册，239页。描写郑成功的《海上英雄》正、续集，1937年由谢热翻译出版，全书分十四卷，1119页。向恺然的《火烧红莲寺》，1938年由梦中离翻译出版。赵焕亭的《飞娘喋血记》、《江湖侠客》分别在1934年和1935年由人人知翻译出版。此外，还珠楼主的代表作《蜀山剑侠》也在1940—1953年由陆羽生翻译出版。

中国武侠小说之传入印尼，大体经历过两次高潮。第一次从3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主要翻译中国大陆的武侠小说。第二次在印尼独立之后，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主要翻译港台的武侠小说。据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廖建裕博士说，①香港的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被译成印尼文的有28部，台湾武侠小说家古龙的作品，被译成印尼语的有16部（有不少是在70年代以后军人掌权时译出的）。此时的译文质量较之早期的已有很大提高，译文已不再是华人马来语，而是地道流畅的印尼语了。而且，不仅华人办的华文和印尼文报刊（左派的或右派的），都大量刊登中国武侠小说，甚至连印尼土著办的报纸，如右翼社会党人的雅加达《指南报》（Pedoman），也争相连载中国武侠小说的译文。武侠小说的单行本和后来港台工夫片和录相带的大量上市，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65年“九卅事件”后，印尼单方面冻结了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封闭了国内所有华文报刊、华人学校及社团，禁止出售中文书报，切断当地华人与中国文化的各种联系，强迫华人改名换姓、异族通婚及改变宗教。曾在印尼流传100年之久的土生华人文学几无法生存，唯独武侠小说还有发展趋势。这种现象十分奇特，有必要深入研究。

从中国（包括港台）武侠小说传入印尼的两次高潮看，第一次出现在荷兰殖民者实行高压政策，民族主义思想的书籍被列为禁书之时。第二次出现在印尼刚从卷土重来的荷兰侵略者手中移交主权，帝国主义企图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使印尼内忧外患不断的时期。特别是七、八十年代，军人掌权，仍为武侠小说大开绿灯，考其原因，除了象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那样利用武侠小说作为安抚百姓的“迷魂汤”外，它成了统治阶级掌握弄权术的生动的教科书。例如，香港根据古龙小说《流星蝴蝶剑》改编拍摄的同名片，就很受印尼军人集团欣赏，苏哈托总统曾看过7遍。这主要是因为影片反映黑社会帮派之间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所使用的权术和手段，对他们大有用场。联系他上台前后发生的重大事件来看，不难发现，他在推翻苏加诺总统、打击和消灭共产党以及他在对待亲信、政敌，对待自己精心改造过的国民党和伊斯兰教政党所联合组成的“反对派”时的所作所为，无不留下中国武侠小说的影子。

另一方面，可以从印尼武侠小说之王许平和的创作看到武侠小说今天在印尼的另一种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共创作96部武侠小说，其中以印尼为背景的有29部，其他均以中国为背景。他以爪哇历史为背景的著名武侠小说，如《南海风暴》、《罗罗威利斯》、尤其是《血溅婆罗浮屠》中的主人公，甚至成了爪哇地方戏的神话式人物，多次被搬上舞台、电台，他的《私生子的仇恨》、

《骨肉情》、《爱情的荡漾》等还被拍成电影。在他的武侠小说中，往往可以看到金庸、梁羽生、倪匡以及古龙的影子。

据1980年3月2日的《战争》月刊说，他创作的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故事完全是虚构的，但尽量使之与印尼的方式结合起来，使印尼人民容易接受，以满足广大读者“雪不平，除强暴”的“悬盼”和要求，同时还保存武侠小说的韵味和特色，这大概也是中国武侠小说能在印尼生根发芽的一个奥秘吧！

廖建裕《印尼武侠小说概论》^②分析得好，“印尼文武侠小说对印尼通俗文学与社会有深刻长远的影响”。在战后，印尼文版武侠小说也刺激了印尼原住民武侠小说的产生。如爪哇通俗文学作家明达尔查（Singgih Hadi Mintardja）的《爪哇宝剑》和《礁石上的花朵》等，以及土著武侠小说家韩达瓦里（Handawarih）在椰城《时代》（Zaman）周刊连载的《青光剑》，都有中国武侠小说的色彩。

概而言之，印尼文武侠小说从1883年翻译出版中国公案侠义小说《海公小红袍全传》算起已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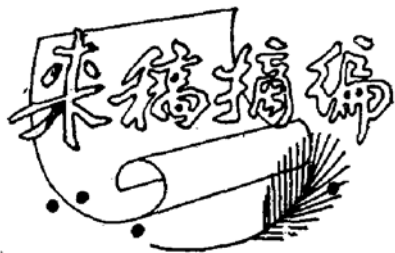
百年历史了。最初它属于移民文学，后逐渐变成了土生华人文学的一个环节。随着土生华人文学的印尼化，武侠小说也有愈加印尼化的趋向。不过，与其他土生华人文学有点不同，印尼文武侠小说的精神与故事多数还带有颇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但是，其语言与表达方式已是印尼化了。

- ① 廖建裕（笔名谷衣）著：《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印尼》，载1984年11月3日《联合早报》；《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在印尼》，载1984年12月18日《联合早报》《星云》副刊；《古龙的小说在印尼》，载1985年3月14日《联合早报》《星云》副刊。
- ② 载《南洋与中国》——南洋学会四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李励图、陈荣照主编，南洋学会丛书第廿八种，南洋学会出版，1987年3月新加坡第一版，141—162页。

作者单位：广州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陶原珂





新时期岭南文学的“城市化”趋向

柯 可

如何把握新时期岭南文学的趋向？首先要从近10年来广东在改革开放走在全国前列这一时代特点来考虑。对外开放所带来的现代工业文明及西方文化的冲击，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城乡经济生活的大调整和新建构，体制改革中“市带县”的社会区域的结构方式的重新组合等等，使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田园式生活急剧向城市化转变，思想文化也由封闭转向开放更新。岭南文学在反映这一历史变革进程时，也实现着自身的蜕变。它集中体现在反映的生活对象上，是把视点愈来愈集中到“城市”。不论是写乡村题材还是其它题材，岭南文学都有一种“城市化”或“都市化”的趋向，这种趋向的直接影响，就是文学作品中人物关系的复杂化、多层次化，审美趣味上的趋时性、商品化、平民化。并涌现出孔捷生、陈国凯、吕雷、林经嘉、贺朗等一批擅长描绘城市现代生活的作家。而在岭南文学“城市化”的过程中，最为显著的先潮，可以说是“特区文学”的兴起和初步定型。

尽管人们对岭南文学的“城市化”有各种各样的理解或解释，但归根结底，要从审美意识上的时代性转变这点上去作出深层的解释。“城市化”不仅是一个题材、内容上的概念而且应视为文学审美意识由旧向新，由封闭向开放的潜动。它是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而引起的，但往往又敏锐地意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风尚的到来。当然，就目前而言，中西文化、新旧文化的撞击还

要经历相当长的曲折的历史历程，因此，很难说岭南文学的“城市化”已经定型或已经完全取得了主导的地位，只能说是一种带先导性的时代潮流，它的生命力是大可乐观的。

既然如此，广东的文学界要有意识地把握这个新趋向，对尚不成熟的新文学形态进行进一步的开拓和发展。第一，要更深入地反映以城市改革为中心的整个改革的复杂性、长期性，多层次、多角度地表现出城乡变革过程的各种社会关系的错综复杂的矛盾；第二，要从城市生活的表层向深层开掘，着力于城市人的心态的表现，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冲击波给人们所带来的观念、情感、心理上的种种震撼、冲击和变革。第三，要着力于表现现代社会的新观念、新文明，并努力以我国特殊的国情出发，将这些新观念、新文明的表现扎根于现实的民族土壤之中。第四，在开拓城市文学的新视野、新领域方面，还可以更加丰富多彩、五光十色。第五，广东作家必须增强对创造岭南文学新特色的自觉意识，既把岭南文学中的优良传统的养分最大限度地吸收过来，也要不断吸取中西方新文化的养分，以提高创新能力。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
责任编辑：张硕城



宏观经济调节理论的新建构

——读王琢《宏观经济调节论》

袁耀文

经济学家王琢的新著：《宏观经济调节论》，最近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专题学术论文集，收入文章共24篇，分三个部分：（一）计划经济模式与宏观调节机制理论；（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宏观调节机制模式；（三）国民收入分配与宏观调节机制。反映了王琢从1980年到1986年上半年对宏观经济调节理论的主要论点和改革主张。

王琢关于宏观经济调节理论的主要论点和改革主张大体如下：

——坚持计划经济制度，改革计划经济模式。王琢认为，计划经济是人类在生产社会化的基础上自觉地调节社会经济运行的机制。社会主义社会由于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因此必须实行商品生产的计划经济，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才能实行产品生产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调节制度，必须坚持，但要把原来的产品生产的计划经济模式改为商品生产的计划经济模式。发展商品经济要求改革计划经济模式而不是排斥计划经济，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目标。

——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调节和价值规律的调节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再生产规律的两个实现形式。王琢认为，“在实行商品经济的计划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再生产规

律的实现形式，不是单打一，不能只承认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而排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或者相反，只承认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而否定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调节作用。”（第119—120页）价值规律的调节，主要是通过调节国家、企业、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引导企业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同国民经济计划方向是基本一致的。

——以宏观调节机制为中心的配套改革是我国新旧体制模式更替的战略突破口。王琢通过对经济体制三个层次：宏观层次（社会）、微观层次（企业）、中介层次（市场）的内在联系的分析，并联系到1984年第四季度出现的经济生活中的不稳定因素和1985年被迫实行以行政手段为主的宏观控制的情况，论证了我国经济体制要有一种新的宏观调节机制。这种新的宏观调节机制，既要能调节宏观经济的平衡和比例，又要能制约宏观决策的失误，还要能为增强企业活力创造外部条件。王琢认为，要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必须逐步完善在宏观调节下的市场机制。这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王琢认为，更重要的是创立新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的宏观调节机制。这种宏观机制“以价值平衡为基础，并通过价值平衡来组织实物平衡，即以国民经济宏观价值平衡为中心，通过运用指令性价值指标

划和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调节市场需求的总量和结构，从而实现对商品经济运行的自觉调节。”（第187页）王琢提出，这种宏观调节机制有两个基本职能：第一，“是控制国民收入分配的平衡，防止制订国民收入超分配的计划盘子。这是治需求膨胀、商品短缺的根本措施”；（第188页）第二，“是调节产业结构比例，包括商品结构比例，确保商品结构和消费结构比例相协调。消费，包括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第190页）王琢认为，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与宏观调节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构成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统一的经济体制模式。

——国家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必须坚持直接调节为主。“宏观经济管理必须坚持直接控制为主，譬如控制国民收入不能超额分配，就要直接控制国民收入的分配体系和货币信贷体系，才能从价值量上确保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当然，直接控制也不等于全用行政手段，主要发挥宏观调节机制的作用。”（第251—252页）

——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原则。王琢根据我国财政工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认为如果财政收支失衡必然牵动国民经济的全局。这是因为，“财政资金分配是组织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砝码’。……就是说财政资金分配在组织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制约全局的作用”。王琢指出：“这种作用主要是两点：一、财政收支平衡，从价值量上制约着经济建设规模同国力（财力、物力）之间的协调，并在价值量上制约着生产同消费的平衡，使物资和商品的供应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大体上平衡；二、根据生产结构的客观要求，调节财政资金的分配结构，而财政资金结构又起着调节生产结构的作用，制约着生产结构同消费结构的协调平衡。”（第265页）王琢指出财政收支失衡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财政结余过多，企业商品销售困难，有一部分商品的价值不能实现，好象生产有点过剩了；另一种是财政赤字，随之而来的是商品供应和物资供应都紧张，推动通货膨胀，国民经济出现了失调现象。王琢反对“财政赤字无害论”，主张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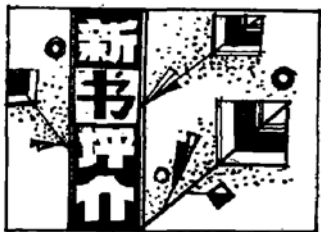
——堵住国民收入超分配的口子是控制宏观经济平衡的治本办法。“市场稳不稳，物价稳不稳，经济稳不稳，人心稳不稳，从一个年度来说，决定于国民收入分配的平衡。如果为了追求高速度而突破国民收入分配的平衡，安排了国民收入超分配的计划盘子，则必然导致国民经济的全面紧张。所以，控制通货膨胀和信用膨胀，必须从经济全局出发，采取治本的办法。所谓治本的办法，就是堵住国民收入超分配的口子。”（第302页）王琢于1985年写的《“截流”不是收紧银根的好办法》一文，就曾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在财政分配、利用外资、企业工资奖金的发放、货币发行、银行信贷及其用途等六方面要采取有效调节措施的主张，他特别强调必须控制没有资金来源的货币投放的几个口子。

实践呼唤理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科学结论，成为我国8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然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国家在宏观方面怎样进行调节、在微观方面怎样搞活，都要求从理论上给予回答。只有理论问题解决了，改革才能顺利地进行，社会生产力才能进一步协调发展。

宏观经济调节理论是一门新的学问。近年来，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开展，宏观经济管理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日益普遍深入，各种论点和主张相继出台，呈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各种论点和主张是从各个不同侧面反映了经济改革实践经验，并将随着改革的深化而逐步深化。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时间不长，经济改革正处于新旧体制并存阶段，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性的认识难免受到局限。《宏观经济调节论》作为前一个时期的研究成果，也有不足之处，如对经济体制模式与宏观调节机制模式的联系和区别问题，财政调节职能与金融调节职能的划分和运用问题，宏观调节中的直接控制与间接控制的联系和区别问题，就论述得不够。我们期望王琢新的研究成果问世。

作者单位：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黄振荣



老牛拓荒喜新获，近代文学终有史

——读陈则光《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册）

吴定宇

在中国文学史这门学科中，对近代文学的研究是薄弱的一环。近几年一些研究者在发掘近代文学史料上作了大量的工作，对某些在近代文坛上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作家、作品、社团流派以及对近代文学分期等问题的研究，有所进展，但却缺乏从宏观审视，以史为系统的论著，尤其是在高等学校近代文学的教学中，尚无一部材料翔实、见解深刻、阐述全面的通用教材。陈则光教授致力于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多年，他的新著《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册）（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填补了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的空白，刚一问世，便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早在五、六十年前，鲁迅、胡适、阿英（钱杏邨）等人就对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作过拓荒工作。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虽非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专著，但书中对近代小说所作的精辟分析和科学总结，至今仍有指导意义。不过，《中国小说史略》和阿英的《晚清小说史》所论述的是小说，未涉及到近代的诗文、戏曲。而且在当时近代文学资料未曾得到充分发掘和整理的条件下，鲁迅和阿英很可能没有接触到尹湛纳希的小说《一层楼》、《泣红亭》，因此，对这两部蒙古族的《红楼梦》式作品未作论述。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虽然对近代诗文、小说的名篇进行了分析，但论述的时间界限是从1872年到1922年，不可

能勾勒出近代文学的总的轮廓，同时对近代戏曲未着笔墨，对当时卓有影响的南社亦未加介绍。陈则光教授披阅了大量的第一手近代文学史料，对近代文学中的诗文、小说、戏曲，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以及旧文学的三大流派：桐城派的“中兴”，宋诗派和常州词派等，分门别类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拂去时间蒙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诗人、作家名字上的尘埃，使一些佚散的作品如贝青乔、朱琦等人的诗文，和长期为人们所忽视的黄燮清的《倚晴楼七种曲》、杨恩寿的《坦园六种曲》、陈焘的《玉狮堂十种曲》等近代戏曲作品，重现光华。可见，资料丰富是陈书的一个特点。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复杂的文学现象进行具体分析，对一些颇有争议的诗人和作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是陈书的第二个特点。作者在第二章充分肯定太平天国的文学成就，“在文学方面，提倡文学思想、写作方法和文体、文学语言的革新，尤有进步意义。可说是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文学最早的一次文学革命”，但同时又指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革命的中途夭折，太平天国对文学的改革，不能说是很全面、很彻底，他们的作品，还是半新半旧的，并没有取得较高的成就。”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与太平天国进步文学相对立的是桐城派“中兴”文学。

作者深入地探讨了桐城派由衰落走向“中兴”的原因，一是这个派别内部的有识之士如梅曾亮等人在社会处在巨变时期，主张文章有反映时代的必要，不应囿于古而失其真。尔后曾国藩主张向各家学习，扩展了桐城派抱残守阙的狭小圈子，纠正了桐城派空疏的弊病。二是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使桐城派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某些变化。应该指出，作者的这种探讨，力破文学史研究中那种从某种概念出发的贴标签的陈规，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不少近代作家，如张际亮、张维屏、林昌彝、金和、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郭嵩焘、黎庶昌等在政治上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仇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一定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或向西方寻找真理，探索中国出路，主张实行社会改革；或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揭露满清政权的腐败无能，写下颂扬抗击外来侵略的爱国诗篇和倡导变革的时务文章。陈则光教授既指出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又给予他们所抒写的反帝爱国诗文以肯定的评价。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是一个反动人物。在评述曾国藩在近代文学中的作用时，陈则光教授不沿袭前人的论调，对曾国藩的诗文简单化地一概否定，而是对曾国藩的文学思想、诗文、奏议、书札和以他为核心的“湘乡派”文学集团的活动与影响，作了缜密细致的考察，从而形成自己的观点。书中指出，曾国藩的文风“固然因袭桐城派的笔法和气味，但阐明问题，层次分明，颇有条理，有一定的说服力。比起不善于说理的桐城派古文来，不能不说是稍胜一筹。”而他在近代文坛上的地位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得以领袖群伦。”并对曾国藩的诗文在写作上的长

处，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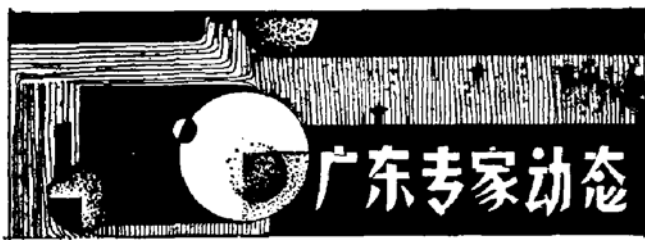
陈书的第三个特点是，作者把近代诗人、作家放进文学史的长河中，既注重对他们的创作进行概括性的描述和总结，又善于运用思辩的方法对其创作特点加以评析，因此立论公允，见解深刻。龚自珍、魏源是中国近代文学开风气之先的诗人和散文家，林则徐是著名爱国诗人，“清朝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洪仁玕是太平天国的代表作家，陈则光教授在评析他们的文学活动和诗文特色时，并非单纯的溢美。他充分肯定他们的文学成就及其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又指出他们的诗文的不足之处。例如他认为龚自珍的某些诗文因喜用拗句、险韵和难字而艰深晦涩、难以索解，“不足为法”；魏源有的作品“形式拘谨，格调陈旧，显得板滞晦涩，缺乏艺术魅力”；林则徐“还没有摆脱传统诗教的束缚”；洪仁玕“把基督教义视为天下至理，仍未摆脱唯心主义的羁绊”；这些看法，切中肯綮。

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对近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进行深入的探讨，是陈书的第四个特点。陈则光教授对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的小说《一层楼》、《泣红亭》和满族作家文康的小说《儿女英雄传》不同的思想倾向、迥异的艺术风格，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使兄弟民族的作家和作品，在近代文学史上占有应有的地位。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册）是一部学术水平较高的文学史，对阅读和研究中国近代文学作品，有指路的作用。我们殷切等待它的下册早日面世。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刘斯瀚



新种葱茏竹万竿

——王季思教授近况

“旧传萧瑟诗千首，新种葱茏竹万竿”，是王季思教授自题“玉轮轩”绝句中的句子，寄托了先生对新一代的殷切期望。王季思教授今年已82高龄，他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戏曲史家，今天仍在为培养古代戏曲研究人才孜孜不倦地工作着。

王教授一名王起。他从小喜爱戏曲。1925年，就读于南京东南大学中文系，是近代著名戏曲家吴梅的入室弟子。大学毕业后，先生在浙、皖、苏三省中学及浙江大学等校长期从事语文教学和戏曲研究。他治学严谨、勤奋刻苦，对古代戏曲，特别是元杂剧有很深的造诣，其早年著作《西厢五剧注》出版后，受到国内学术界和日本学者的重视。1948年至今，他一直在中山大学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努力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方法来研究和整理古代戏曲。他对古代戏曲作家作品的研究，除注意作细致的艺术分析外，尤其注重时代背景的联系和思想意义的阐发。他撰写的有关关汉卿、王实甫、高明、汤显祖、孔尚任等戏曲作品的论文，都有这一特点。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其他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60年代

初期，他与游国恩教授等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多年来被作为高等院校中文系教材。先生著述丰富，主要著作有《西厢五剧注》（1944）、《西厢记校注》（1954）、《桃花扇校注》（1958，与他人合作）、《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1982，均与他人合作）、《玉轮轩曲论》（1980）、《玉轮轩曲论新编》（1983）、《中国戏曲选》（1982，与他人合作）等；文学方面有《王季思诗词录》（1981）、《玉轮轩古典文学集》（1982）等。先生在学术上的杰出成就和诚恳待人、热心扶掖后学的品德，赢得了学术界同行的尊重，被推为中国古代戏曲研究学会会长，中国韵文学学会副会长。

先生近年来教学和科研任务仍相当繁重。他是博士生导师，又担任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在教学上，先生积数10年的经验，明确地提出教学生要注意培养能力和发展智力的教学原则，要求“学习上记性与悟性、记忆力与理解力、知识的掌握与智力的培养并重”的方法。他说，学生要掌握各科基础知识，就用得着记性和记忆力。记住了这些基础知识还必须找出其中一些有

本质意义的东西，还得联系跟它有关的事物加以推论、想象，这就用得着悟性和理解力。要使生不但知其然，还必须知其所以然。先生有针对性地指出当前大学讲坛上的流弊，学生“上课记笔记，下课背笔记，考试默笔记，过后就忘记”。认为这不是单纯的学习方法问题，而是教学思想原则问题。他主张教师要把科学的思想方法传授给学生，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本领。对研究古典文学的问题，先生提出要充分占有材料，分清主次，有所侧重。行文时要“略人之所详，详人之所略”。要从旧的思想领域跨过来，就要在世界观方面努力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明确指出研究古典文学的方向和方法，要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作为研究所所长，先生是全所人员中科研任务最重的一人，担负国家古籍整理研究重点项目《全元戏曲》的主编工作。元代的杂剧和南戏，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代表了一个时代中国文学发展的高峰。先生几十年从事古代戏曲的研究，深感古代戏曲资料零散、版本文字错讹，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巨大困难。为了给后人提供一个最完善的元人戏曲的全本，并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些研究的线索和启示，先生愿以其数十年研究的功力，去主持完成《全元戏曲》这一浩大工程。在这一工程中，首先是名副其实的主编，又是循循善诱的导师。在《全元戏曲》的编纂过程中，从底本的选择、体例的确定、出校的标准以至异体字的统一，先生都与大家共同商量讨论，直至得出比较满意的方案。先生对大家写出的稿子，起码都看过两遍，有的甚至看三、四遍，连标点符号都注意改正过来。先生常告诫说：聪明人要肯下笨工夫，要想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做出成就来，就必须老老实实地从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功夫做起。先生常说：“与青年人合作我感到很愉快，这一则

可以从他们身上感受到青春的气息，二则通过合作，可以培养出人才，使我们的学术事业后继有人。”他从50年代起就与中青年学者合作著书，30年来不曾间断，带出了一批又一批学术骨干。中山大学古代戏曲专业在全国保持着领先的地位，与先生的辛劳是分不开的。“人生有限而无限，历史无情还有情。薪尽火传光不绝，长留双眼看春星。”从先生的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经历了几十年人世沧桑变幻，时代风涛起伏的老学者豁达的胸怀和殷切的期望。

先生在学术界长期耕耘，他的不少学生已经成为著名的学者、教授，但他并没有以此自矜。每当谈起他的学术成就，他总是谦逊地说：“并不是我真有什么成就，而是因为我的同辈谢世渐多，学生有成就的却不少，水涨船高，才将我浮上来了。名声大得与实际不符，并不是好事情。近年来介绍我的文章，总是只看到我的优点，看不到我的缺点；只愿写我重视知识更新，较少思想僵化的一面，不愿写我因此而产生过随风俯仰的另一面。这是不够客观的。”这番发自内心的话，是先生对自己严厉的自我解剖。

先生现在的工作，已不是82高龄的人所能承受得了的，他太累了！可喜的是《全元戏曲》的第一卷可望年内出书，其余九卷的大部分工作也在顺利进行。谈到今后的打算，先生不无感慨地说：“到我85岁，这届博士生就毕业了，《全元戏曲》也已完稿。那时若我还有幸活着，我想过一过清闲的日子。情致来时，写写诗，写写散文，好好回顾一下这几十年的道路。”我们衷心祝愿先生健康长寿，过一个幸福、安闲的晚年。

（林建 叶猷高）



我国人类学的现状与未来

——梁钊韬教授临终前的采访

获悉我国人类学家梁钊韬教授患病住院，笔者前往探望。梁老出于对我国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的关心和强烈的责任心，在弥留之际，还谈及我国人类学的一些情况。遗憾和心痛的是，这次谈话成了梁老的终言。

梁老1916年出生于广州。1935年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两年后转学到中山大学，1939年考入中山大学研究生院人类学部攻读人类学，1941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在华西大学任博物馆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兼民族学部主任，1944年在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任讲师，1948年任人类学系副教授，解放后任副教授、教授、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1981年任人类学系第一届系主任、中山大学第一批博士导师之一，1985年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

梁老从事人类学的教学和研究已经整整47年，以中国南方民族文化为研究重点，自30年代起，先后发表论文近百篇，编写了《中国考古学通论》、《原始社会史》等教材，出版了《中国民族学概论》(合著)，以及即将出版《梁钊韬人类学论文

集》(暂名)。这些成果对中国人类学的理论体系的建立有着重大意义。梁老学识广博，他是名扬中外的“马坝人”的最早鉴定者，著有马坝人的论文多篇。自1979年起，他先后指导了4名博士生、16名硕士生，为我国培养出藏族第一位博士(也是我国文化人类学第一位博士、解放后广东省第一位文科博士)。梁老以其渊博的学术造诣和出色的领导才能赢得海内外学术界的敬重。他曾任中国人类学会、社会学学会、民族学会、考古学会、人口学会、太平洋历史学会等学术团体的领导职务，并被选为国际当代人类学会委员。几年来他多次应邀前往香港、美国、墨西哥等地讲学、访问，1987年他被收入《国际出色领导人物人选》一书。他是广东省政协委员，去年10月他实现了自己数十年的心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谈话中，梁老一如既往，强调人类学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他认为，100多年来人类学的学派和观点始终贯穿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这是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门

学科尤为重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两部名著是代表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类学理论著作。因此,无论在过去还是将来,作为我国人类学的指导思想还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我国人类学者应该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贴在商品上面的商标,也不是一种封闭的思想教条,它本身是发展的,因而每一位人类学研究者都有责任去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

在对待西方人类学的态度上,梁老认为必须坚持“两点论”:一方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西方人类学各派的唯心主义成分,首先要警惕西方人类学某些观点打着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而实质是反对马克思主义。这种现象在今天所谓“马克思主义回归”的思潮下是不乏其例的;其次要注意西方某些人类学家以学术研究之名而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等服务。诚然,也要把他们从事学术的主观愿望与其学术成果的失败区分开来。另一方面,人类学在西方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中国早期的人类学与西方人类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现在和将来的我国的人类学无论在现在还是未来,都不可能全部摒弃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应该在和西方人类学的交往中锻炼自己,从其他学派中吸收各种有用的成分,包括思想资料、具体研究方法和有价值的意见。

在中国人类学的体系方面,梁老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尽管西方人类学有英美派和欧洲大陆派之别,解放前我国人类学家也受这些流派的影响,但他们都没有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切实可行的人类学体系。人类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自身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人类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的边缘学科,其体系应该是由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部分组成,后者又包含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等部分。这种体系既适合我国人类学研究的客观条件,又符合当代跨学科研究的要求。诚然,这仅是人类学体系的架构,在研究具体问题时,人类学家就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上述的分支学科,而是博各学科之所长,以丰富人类学研究的成果,这是这门学科当前的一个主要趋向。譬如,研究古代社会和文

化,可以从考古、历史文献和民族调查资料三方面入手,这是梁老早年研究的成功的秘诀。此外,随着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人类学也应该从理论、方法和成果三方面吸取自然科学的营养,如把系统理论应用于区域文化和文化结构的研究,以地理和生态的手段复原古代社会的社会和自然的环境等等。梁老正是以这个体系为基础,于1981年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影响,美国等地的人类学会通讯作了专题报道,我国成立了中国人类学会,厦门大学也办起了人类学系。

在谈到当前人类学的具体研究时,梁老指出,人类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但不排斥各分支学科的具体研究。人类学研究也不存在分两步走的问题,应该是微观和宏观相结合,既要进行各学科的细微研究,在具备条件下又要着眼于人类学的综合研究和人类学理论方面的建树。近年来,梁老正是从这两方面入手,从事我国南方文化的研究,而以区域文化、文化结构和文化关系作为研究的重点,把他的几名博士生分别置于东南沿海、中南、西南等文化区域的研究,从而真正达到“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目的。

梁老最后谈到,经过6年来的努力,我国的人类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距离人类学成为一门普及性的基础学科还有一段路途,其中的困难不少。西方人类学的发展也经历过这个阶段。“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不应落后”。人类学虽然不是一门立杆见影的应用科学,但它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学说,发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传统,既分析各族文化的差异,承认少数民族的存在,又综合认识各族文化的共同特性,阐明各族人民团结的历史,并运用我国人类学理论,为党的民族政策、为现代城乡人民生活、生产服务,为我国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梁老谈吐谦逊,他再三强调他的思想体系不是他个人智慧的结晶,而是几代人不断摸索的结果,而且现有的人类学体系也不是终极的真理,今后仍需要不断破立、充实。他经常勉励他的博士生要“青出于蓝,胜于蓝”,担负起振兴我国人类学的使命。这是梁老寄予我们的最后任务和希望。安息吧,梁老。

(张超)

华东、中南、西南地区省（区）、市社科联 第三次协作会议纪要

（1987年11月14日）

华东、中南、西南地区省（区）、市社科联第三次协作会议于1987年11月7日至14日在海口市举行。会议的主题是讨论研究社科联工作如何贯彻党的十三大精神，以及交流社科联的工作经验。北京、天津、黑龙江、辽宁、陕西、新疆等省（区）、市社科联的特邀代表也参加了会议。出席会议的共21个省（区）市的代表50多人，提交经验交流材料30篇。

海南建省筹备组、海南行政区党委领导同志，和区政府、区党委宣传部的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开幕式，并介绍了海南的经济社会概况和改革开放的发展前景，使与会同志深受启发和鼓舞。

会议认真学习了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作作的《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等重要文件，以及中央宣传部1987年11月发出的关于全国各省（区）、市宣传部长会议纪要，密切联系社会科学战线和社科联工作的实际，对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交流了经验，提高了认识，研究了措施。

一、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党的十三大文件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丰富经验进行了创造性的理论概括，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提出了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依据这个理论和路线制定了全面改革的基本方针和行动纲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

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同时，十三大还从“争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胜利”的高度，鲜明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是现时代的大趋势，明确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这样，就为我们社会科学战线和社科联工作指明了根本的指导思想和重大的战略任务。同志们一致认为，必须把这个根本的指导思想和战略任务贯彻到我们的全部工作中去。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们必须首先以最大的热情和努力，组织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大力开展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以及对改革开放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并把上述内容充分体现在社科联的工作和社会科学研究“七五”规划及比较长远的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规划之中。

二、与会同志回顾和总结了近几年来社科联的工作，一致认为，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科学战线的工作和社科联的工作，与其他战线、部门工作一样，有了一个新的发展。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在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在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不少的成绩，特别在某些重要问题上，比如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关于生产力标准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为创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一些萌芽的重要观点和见解。对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理论上的作用应该给予足够的估计和肯定。与此同时，也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当前，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状况，同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相比，是很不相称的，改革开放已进行多年，改革开放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仍然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我们要适应马克思主义必须有新的大发展这个现时代的大趋势，尽最大努力改变理论落后于实际的状况。这就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概括。为此，各级社科联都要认真组织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学习领会十三大精神，大力推动理论工作者同实际工作者紧密结合，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下功夫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及时发现和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加强理论概括、科学预测和对策研究，使他们把主要精力和聪明才智真正转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特别是要充分发挥社会科学工作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今后，在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奖中，要进一步贯彻体现这个精神，更多地鼓励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问题研究的好成果。对有突出贡献的，还应给予重奖。各级社科联办的刊物，也要着重地反映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以推动理论研究与实际相结合。

三、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十三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在实际工作中鼓励探索和开拓，在理论研究上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没有探索，没有创新，没有不同试验的比较和不同意见的讨论，我们的事业就没有生气。努力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活力，振奋起全民族探索创新的勇气，是我们的理论和事业不断发展的希望所在。”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实践中多年来的正反经验进行科学总结而得到的非常深刻的认识。这样一个方针，对于社会科学事业和社科联的工作，有着特殊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各级社科联的工作中，必须坚定不移地、长期稳定地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努力创造团结、民主、融洽的环境，振奋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探索创新的勇

气。为此，必须继续排除僵化和自由化两个方面，尤其是僵化方面的干扰和影响，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双百”方针的关系。各级社科联要特别注意维护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探索创新的勇气，正确对待学术理论上的不同意见、不同观点和不同学派，使社科联真正成为“学术界之家”。

四、与会同志认为，十三大提出要“建设一支包括大批新生力量的富有创造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重要任务，其意义是非常重大和深远的。马克思主义要有新的大发展，就必须依靠一支队伍。这不是一般的队伍，而是包括大批新生力量和富有创造精神的队伍。因此，着力加强对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培养工作，应该是各级社科联的重要任务。要进一步增加和扩大这支队伍的数量，提高它的质量和水平，逐步改变目前仍然存在着的“老、少、弱、散”的状况。

五、与会同志还一致恳切地盼望和请求党中央和中央宣传部加强对社科联的领导，重视关切各级社科联的建设，特别是渴望尽快成立全国社科联。

同志们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事实充分表明，各地社科联的工作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科联已成为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之家，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它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为各级领导决策咨询服务，为社会科学界服务，为社会服务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和贡献。受到了党政部门和社会人士的赞赏。为了更好地发挥各级社科联的作用，很需要有一个全国性社科联组织，以加强对这方面工作的统筹指导和协调。与会同志一致同意向中宣部并报中央宣传小组呈报一份《关于请求尽快成立全国社会科学联合会的建议》。

会议在学习领会十三大精神的基础上，还进行了有关社科联在改革开放中的工作经验交流，互相间得到很好的学习和启发，增强了搞好社科联工作的信心。

会议还经协商研究决定，华东、中南、西南地区社科联第四次协作会议于1988年在上海市举行，由上海市社科联负责筹办；第五次协作会议于1989年在贵州省举行，由贵州省社科联负责筹办。



广东比较文学研究会首届年会侧记

广东比较文学研究会首届年会于1987年11月3日至4日在江门召开。本省比较文学专家学者40多人参加了会议。

这次提交会议的论文有29篇，其中约86%是平行研究——多为文学现象的平行比较；14%为影响研究；没有科际研究。反映了年轻的广东比较文学研究队伍的可喜势头。

会议回顾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在我国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认为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先是不自觉的导入。1919年章锡琛译日本文艺理论家木间欠雄的《新文学概论》，输入了比较文学许多名词术语。1920年吴宓在《留美学生季刊》上发表《论新文化运动》，首次介绍了法国学派的主张及基本观点。从20年代初起，清华大学、中国公学等校便陆续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进入30年代，外国比较文学的论著得到了更全面的译介，如傅东华译（法）洛里哀《比较文学史》，戴望舒译（法）梵·第根《比较文学》。此时，比较文学在中国曾初步确立。但后来由于抗战的原因，没能继续发展。

遗憾的是，解放以后，比较文学在我国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受到应有的重视，长期受苏联那一套学术观点的影响，基本上与西方隔绝。只有冯雪峰、戈宝权等的少量论文面世，更无人倡导。

文革以后，进入自觉倡导时期。随着对外开放，老学者们旧文重提，留学生回国倡导，使比较文学重新崛起。开始一段时间，是以影响研究为主的，也有一些平行研究；较有系统地再版了一批比较文学译著；先后有17所大学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出版了比较文学年鉴；1984年在深圳成立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这些都说明，比较文学在中国的教育界和学术界业已发展成一个独立的学科。

与会代表说，季羨林先生在1981年曾提出，要为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而奋斗。6年过去了，我国的比较文学又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已经可以而且很有必要从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中生发出理论，以争取实现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这个目标。

会议认为，人有交替的远方崇拜的特性，并有求新探索的想往。比较文学的再度导入，确实打破了长期以来文学研究的固定模式和思想的封闭状态，培养起了一种所谓“不作比较，何谓文学”的文学比较意识，使我们树立了一种更为广博的文学观。但是，会议也充分认识到，我国目前的比较文学，微观研究较多，宏观研究较少；浅度的平行比较较多，能够揭示规律的判断较少；文学现象的比较成果较多，比较诗学的成果较少。为此，许多学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比较文学的领域界线，拓展比较文学的研究范畴，调整平行研究、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这些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就比较文学的历史来看，在法国学派之后出现美国学派，这不是偶然的。要建立中国学派，把比较文学推向新的阶段，有必要把比较文学扩展到比较文化的范畴。要有文化的自觉感，透过文化背景审视比较文学。民族的心理素质、思维形式、伦理观念以及语言、音乐、建筑、绘画等等所构成的文化背景，都是比较文学所应考虑的因素。换句话说，我们的比较文学应该是涉及到文化圈层的国与国之间、不同语种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学比较的研究。

与会学者认识到，比较文学扩大到文化的范畴，首先应该注意文化影响中的“本土意识”问题。所谓本土意识，是以民族文化意识为核心的，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的人身上，表现为不同的时代意识和主体意识。一方面，凝合潮流的作用，是由国内的潮流决定的，如俄国18、19世纪吸收法国文学的

影响就有赖于俄国本身的农奴制改革。另一方面，一个作家对于外来文化的影响，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根据自己所具备的时代意识和主体意识决定取舍。比如，惠特曼能对郭沫若发生巨大影响，就与当时“狂飙突进”的五四精神有关，也与他曾受庄子的影响有关。我国许多现代作家都是喝外国文学的乳汁长大的，但到了晚年，这种本土意识都表现得特别明显。然而，在我们目前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本土文学和本土文化的主体意识是很薄弱的。

不少代表还强调指出，我们的比较文学要发展自己的特色，很应该注意到比较文学的当代性。当代文学的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不仅是一块较大的空白，而且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从文学是人学的观点来看，按苏联文艺理论家贝罗娃的总结，各民族文学似乎不约而同地经历着一个总的发展进程，就是从写想象中的人（神话）开始→写人的活动情节→塑造人物性格→情节和性格的淡化，揭示人的内心世界，向主观性发展。有人认为，现代派已成为当代世界文学的主潮，它先于法国，我们很可以把法国文学当作当代世界文学的折射窗。当代各国各民族文学的可比范围是很广泛的。比如我国新时期文学和日本“战后派文学”，作为一场浩劫和一场战争之后产生的两国文学，在以反映给人们留下的精神上的“内伤”和对人生价值的探求为主题方面以及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的一些世界性的共同追求方面，就都有不少可作比较的价值。

在探讨比较文学当代性问题时，会议更为强调要看到现实的需要。应该意识到，近代以来，岭南就是得开放改革风气之先的地区，在港台和海外的（祖籍岭南的）华人又特别多，随着台湾同胞的回归探亲 and 港澳今后的回归主权，很可能会出现“回归文学”。另外，世界的华文文学是一个很广阔的领域，在东方文学中，华文文学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它们又都深受大陆本土文化的影响。因此，不少代表指出，广东的比较文学也可以有自己的特色，可以把海外华文文学和港、台文学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这有利于通过比较确认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和东方文学中的历史地位，也有利于在自己民族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

（陶 关）





全国第三届青年工作理论研讨会简述

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广州市团校联合主办的“全国第三届青年工作理论研讨会”于1987年11月9—14日在广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共122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收到论文96篇。与会同志就下列问题进行了探讨。

1. 创建青年研究的系列学科。多数同志认为青年研究可以形成一个学科群。有的代表提出，青年工作理论应分为主干学科和旁系学科两大门类：主干学科包括青年学、青年思想教育学、青年组织学、青年工作方法论、青年工作者素质与修养、中外青年比较等；旁系学科包括青年心理学、青年社会学、青年伦理学、青年美育、青年犯罪学、青年行为学、青年未来学等。还有代表提出，应按三个辐射面建立青年学科群：一个辐射面是青年从个体自身到社会关系的扩展，如青年生理学、青年心理学、青年社会学等；另一个辐射面是青年各个活动领域的扩展，如青年文化学、青年美学、青年伦理学等；再一个辐射面是青年服务系统的扩展，如青年教育学、青年组织学、青年管理学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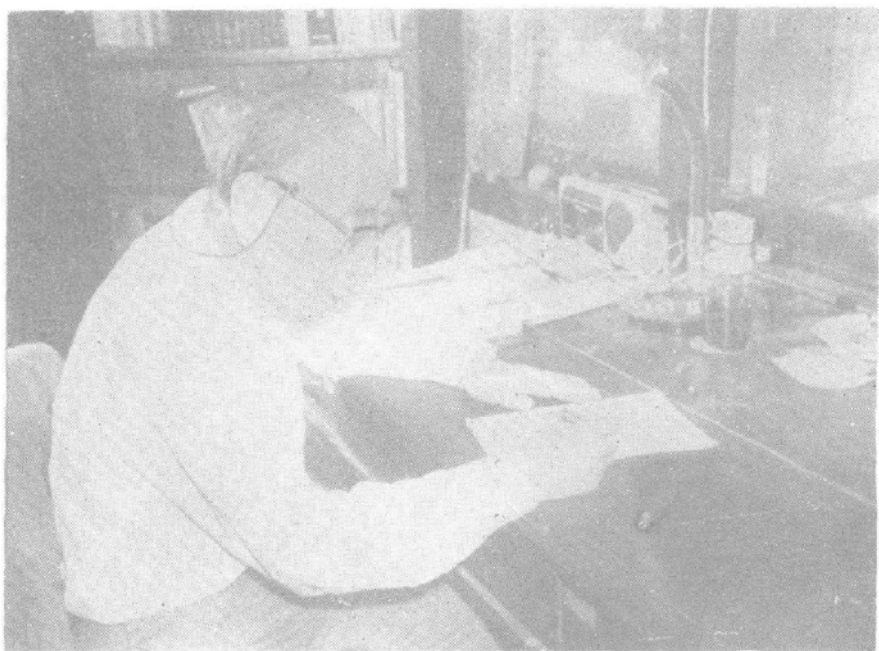
2. 确立青年研究的新方向。多数同志认为，青年研究主要为团结、教育、培养新一代人服务。其目的是：为全面认识青年提供科学依据，使党政部门、各级干部正确理解和对待青年；为发挥青年作用提供科学依据，以利于最大程度地调动青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为关心青年利益提供科学依据，以便共青团及其它组织更好地支

持、保护青年成长；为塑造“四有”新人提供科学依据，使青年成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建设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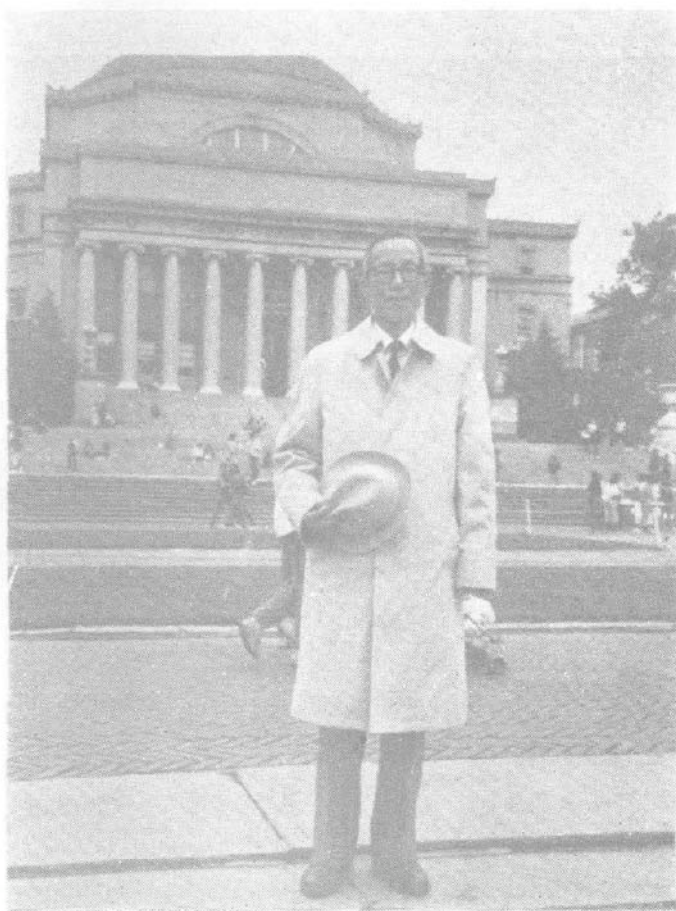
3. 端正青年研究的态度。一些同志认为，青年研究者必须提高理论水平，重视打好基本功。目前，少数人急功近利、仓促出成果，学风轻浮，使青年工作理论徘徊于低水平。今后，应提倡“全面地看问题，扎实地干事情”，并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观点和现代科学知识，促使青年研究向深度发展。还有一些同志提出，青年研究者要有集体主义精神，妥善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中青年学者应摒弃小生产式的狭隘心理、封闭心理，善于在开放、交流、协作之中积极竞争，使青年研究具有整体效益。

4. 更新青年研究的方法。首先，是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既要继承和改造我国青年工作、青年研究的传统方法，又要与现代方法相结合；既要运用专门的现代技术考察青年微观活动，又要采用综合的现代方法探讨青年整体特征。其次，不少同志就定性与定量方法及其关系发表了意见，认为：一方面，运用两种方法都应具有相应知识基础，真正掌握其理论依据和技术手段，这样才不至于造成定性研究庸俗化和定量研究失误大。另一方面，采用定量研究的前提，是要有正确思想的指导。若违背马列主义，再精确的技术亦可能导致错误认识。因此，青年研究者应善于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现代科学方法相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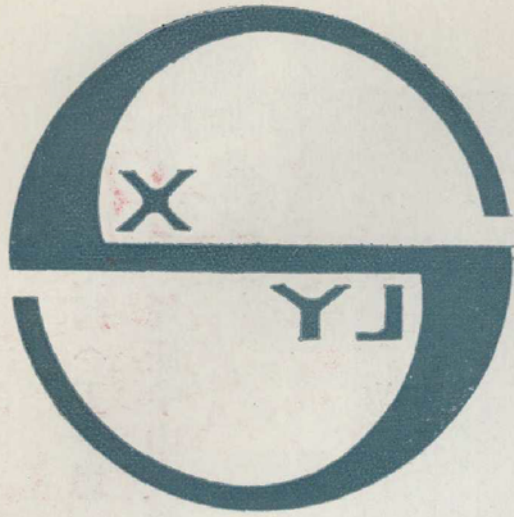
（谭建光）



王起（王季思），文学史家，现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梁钊韬，人类学家，生前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学术研宄

一九八八年第一期

总第八十六期

ISSN 1000-7826

编辑者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越秀北路222号

邮政编码：510050

出版者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 广东新华印刷厂

发行者 广州市邮局

订阅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BM268

北京2820信箱

代号：46-64

国内定价：每册0.5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44-1070

本刊每逢双月二十五日出版